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曙光

SHU GUANG

第四期 2026年
重制版 7月19日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发行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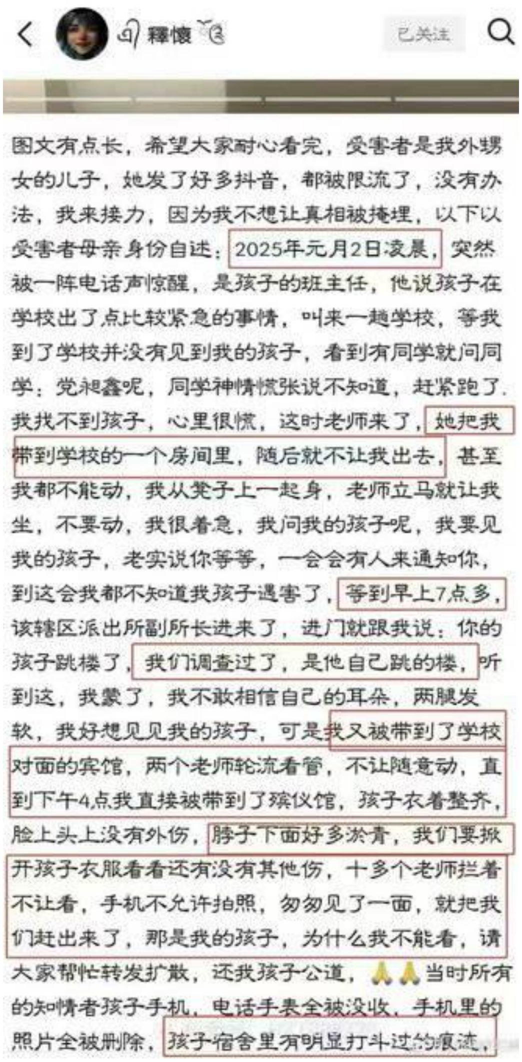
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家组织！——评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事件 2
如今缅甸黑地狱，何时太阳照山河 11
没有计划的“计划生育”——批判资本主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19
中修为何翻来覆去反对“躺平”？——兼评裴頠的“崇有论” 29
劝君少骂雅各宾——论雅各宾派的历史地位 36
向魔童开战，给人民和平！——彻底批判反动沙文主义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 61
批判《让子弹飞》——兼评资产阶级导演姜文及其反动作品 71
革命还是反动？——什么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6
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论坛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94
联系我们 96

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家组织！——评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事件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党昶鑫之死与群众抗议

2025 年 1 月 2 日凌晨，陕西省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党昶鑫从宿舍楼坠落身亡。事发后，学校立刻切断寝室电源，并于清晨对全体学生进行四轮搜身，没收他们的通讯设备，销毁其中所有关于党昶鑫坠楼的录音或视频，严禁学生在网上传播任何相关信息。学生家属被要求来到学校，却遭到学校教师的拘禁看管，不准随意走动，并被禁止接触孩子遗体。早上七点，当地公安通知家属孩子系“自杀身亡”，学校以“监控损坏”为名阻止家属查看监控。下午四点，学校突然将家属送往殡仪馆见孩子最后一面。他们发现，孩子的衣物被重新穿戴整齐，但未被遮住的脖子下方却暴露出大片淤青，这显示他在生前遭到了毒打。而当家属试图掀开衣服检查并拍照取证时，十几名学校教师突然一哄而上将其拦下。随后，党昶鑫的遗体被紧急火化，其电子设备中的信息也被全部清除。至此，事发还不到一天，有关党昶鑫死亡原因的全部证据就被销毁得一干二净！党昶鑫家属难忍丧子之痛，于 1 月 4 日来到学校门口拉起横幅，抱着孩子的遗像控诉学校隐瞒真相、草菅人命的罪行。党昶鑫及其家属的悲惨遭遇很快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和同情。1 月 5 日晚，上千名群众来到学校门口支持党昶鑫家属，要求进校调查，为受害者讨一个公道。然而，一伙早有预谋的警察很快冲入抗议人群，将党昶鑫的舅舅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试图将其强行带走。警察的暴行使群众的怒火到达了顶点，他们立刻将警察团团围住，高喊：“放人！”见状，丧心病狂的警察立即转而殴打和拘捕群众。但是，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群众反而越聚越多，他们众志成城，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警察的去路。可鄙的警察眼见自身势单力薄，被迫将人释放。然而，一当群众散去，狡猾的中修便立即炮制出一纸掩盖真相、缩小事态的通告。该通告称，党昶鑫于 2 日晚 22 时许同高一学生郭某因休息发生口角。在政教处副主任介入调解后不久，党昶鑫通过宿舍阳台的窗户坠楼身亡，并且，“公安机关经现场调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已经“排除”事件系刑事案件的可能。通告最后还要求群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图文有点长，希望大家耐心看完，受害者是我外甥女的儿子，她发了好多抖音，都被限流了，没有办法，我来接力，因为我不想让真相被掩埋，以下以受害者母亲身份自述：2025年元月2日凌晨，突然被一阵电话声惊醒，是孩子的班主任，他说孩子在学校出了点比较紧急的事情，叫来一趟学校，等我到了学校并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看到有同学就问同学：党昶鑫呢，同学神情慌张说不知道，赶紧跑了．我找不到孩子，心里很慌，这时老师来了，她把我带到学校的一个房间里，随后就不让我出去，甚至我都不能动，我从凳子上一起身，老师立马就让我坐，不要动，我很着急，我问我的孩子呢，我要见我的孩子，老实说你等等，一会会有人来通知你，到这会我都不知道我孩子遇害了，等到早上7点多，该辖区派出所副所长进来了，进门就跟我说：你的孩子跳楼了，我们调查过了，是他自己跳的楼，听到这，我蒙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腿发软，我好想见见我的孩子，可是我又被带到了学校对面的宾馆，两个老师轮流看管，不让随意动，直到下午4点我直接被带到了殡仪馆，孩子衣着整齐，脸上头上没有外伤，脖子下面好多淤青，我们要掀开孩子衣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伤，十多个老师拦着不让看，手机不允许拍照，匆匆见了一面，就把我们赶出来了，那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看，请大家帮忙转发扩散，还我孩子公道，🙏🙏当时所有的知情者孩子手机，电话手表全被没收，手机里的照片全被删除，孩子宿舍里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

党昶鑫家属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中修要求群众不信“谣言”，那么他们的所谓 “真相”又有多大说服力呢？首先，按

照通告的说法，导致党昶鑫最终“自杀”的原因是其与他人发生的“肢体冲突”。但是，什么样的“肢体冲突”，竟能逼得人绝望自杀？又是什么样的“肢体冲突”能够使人身受重伤，以至于其遗体在百般遮掩之下仍能看见大片淤青？其次，这场所谓的“肢体冲突”不是得到了政教处主任的“调解”吗？但凡它能够对加害者造成某种最起码的震慑，使其不敢再犯，也不至于使党昶鑫最终绝望自杀。那么，这场“调解”和这名政教处主任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再次，所谓“自杀”一事本身更是扑朔迷离。为什么身受重伤的党昶鑫却仍能卸下金刚纱窗？为什么他拆窗和坠搂的巨响不会惊醒舍友？相比于这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的“真相”，来自于学生的“谣言”反而更加符合逻辑：在最初发生争执后，党昶鑫很快便遭到高一学生郭某等数人围殴，而学校教师介入“调解”时又对后者十分偏袒，这使得霸凌者的气焰更加嚣张。于是，郭某一众随后又闯入党昶鑫宿舍，再次对他进行残酷的围殴，作为对其“报官”行为的报复，这成为了压垮党昶鑫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有其他“谣言”说，党昶鑫根本没有自杀，而是霸凌者在他们的施暴现场就地拆下窗户，直接将奄奄一息的党昶鑫丢出了窗外。还有“谣言”指出，霸凌者的家长是当地政府的实权领导，学校根本不敢得罪……总之，不论如何，种种“谣言”恐怕都比中修的官样文章更加贴近真相。

并且，软禁家属、隐藏监控、压制学生、管制网络、销毁遗体、镇压抗议……这一系列举动，恰恰证明中修和学校根本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光明磊落，而是欲盖弥彰、极力地掩盖党昶鑫的真正死因！在中修法西斯统治之下，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了对一切社会事件的解释权，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百般捏造、信口开河，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没有一点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在中国社会上，惨遭杀害却始终得不到公道的“党昶鑫”早已不计其数：2022年10月，江西学生胡鑫宇在学校内“意外失踪”，他的遗体在为时超过三个月的“搜寻”后终于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但警方却依然草草判定其为“自杀身亡”；2024年1月，在山东连云港学生张新伟的遗体在失联37天后在河中被发现，在他的遗书明确提到自己多次遭到辱骂和殴打的情况下，警方依旧判定其为“自杀身亡”；2024年10月，湖南湘阴学生曾偲赫在遭到老师戴卫东打骂后以后仰姿势坠楼身亡，仍被警方判定为“自杀”……这些案件，无一不是受害者白白冤死，而杀人者却仍然逍遥法外，更不必提它们还是侥幸突破中修的重重封锁、得见天日的极少数！



从左上至右下依次为：群众愤怒地掀翻围栏、群众突破学校围墙、学生捣毁摄像头、群众向警察投掷武器

因此，中修挑衅般的通告彻底点燃了群众心中郁积已久的怒火。通告仅发布一日（1月6日），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蒲城职教中心，他们举行抗议，要求中修公布事件真相，并使杀人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这场抗议涵盖了从工人到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级和阶层，其中不乏从外地远道来援的群众，更有老人高举自己多年前去世的孩子的遗像，控诉中修用同样的借口搪塞他孩子的惨死。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警察起初试图组建人墙堵住校门。然而，群众马上手挽着手将警察的人墙逼向后退，附近的民工则找来大锤等工具突破学校的围墙，学生们也一齐推翻校门口的围栏冲进校园，砸烂紧盯着他们的监控，接着还一马当先地砸开教学楼大门，发现了全部完好但录像早已被删除的监控设备。愤怒的群众

将副校长揪出质问，随后又几乎推翻了他所藏匿的救护车。眼见事态急速升级，中修急忙从蒲城、渭南县地两级警局甚至陕西省内其他城市调来大量警力赶来镇压。丧心病狂的警察试图冲散群众队伍，疯狂地殴打和逮捕落单者，尤其是妇女与学生。然而，面对警察的暴行，人民群众丝毫没有退缩，而是顶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他们结成人墙，一步步将警察逼退；他们愤怒地揭露警察土匪、走狗的本质，控诉他们镇压群众的暴行，并以水瓶、砖块和棍棒等进行回击。深受群众鼓舞的学生也加入了战斗：没有武器，他们就用灭火器喷射警察、就拆下围栏上的铁杆向警察掷去，并接连挫败了警察的数次进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警察的增多，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抗议队伍最终被逼出学校。当晚，在中修的威逼利诱之下，党昶鑫母亲发布视频，要求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聚集”，给她和孩子一个“清净”。7 日，中修派出大量武警部队“清场”，他们赶走全部群众、封锁周边区域、盘查来往车辆。并且，参与抗议的群众还遭到了警察疯狂的报复。当被驱散的群众陆续回家、正陷于分散和孤立之时，早有预谋的警察便马上上门对他们实行殴打和逮捕。一时间，条条街巷遍是警车、各个村落岗哨林立，蒲城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总之，在中修毒辣的反革命两手——家属的屈膝投降与警察的暴力镇压下，蒲城人民的斗争暂时失败了。

学校为何极力掩盖党昶鑫的死因？中修为何血腥镇压蒲城人民的抗议？

由党昶鑫之死引发的蒲城人民抗议，无论在人数规模、激烈程度还是社会影响方面都可谓是当地空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学校和中修不选择向群众实行“让步”以平息事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能使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力掩盖党昶鑫的死因和血腥镇压群众抗议呢？



被网友戏称为“黑社会大姐”、“黑龙江军阀”的张美玉于 2022 年专升本成功“上岸”，进入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

学校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校园霸凌事件的传播一定会败坏学校的名声。特别是对于蒲城职业教育中心这样的“国家级重点、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这更是会极大地威胁他们的招生——而学生、家长正是他们的财源。然而，蒲城职教中心之所以要拼命掩盖这样一起极端恶劣的霸凌事件，其原因还不止于此。在校园霸凌中，施暴者往往不是官僚或资产阶级子弟、就是因成绩优异而有望跃升为资产阶级的右翼小资产阶级，抑或是这些人的鹰犬。他们因为深受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影响，在学习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技巧或进行资产阶级学业投机的活动中，养成了残忍阴刻、极端利己、以压迫他人为乐的思想。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优越的经济政治地位不但能方便他们摆平霸凌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还能使资本主义学校拼命地巴结他们。并且，许多霸凌者本就是教师收买的走狗，他们代教师对学生进行管卡压，或是行使一些教师不便于亲自行使的“惩戒权”，例如臭名昭著的黑龙江职业学院学生会会长张美玉。对于他们，教师自然不会真的施以颜色。可见，校园霸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压迫在学校内的反映，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补充，根本不可能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被消灭。群众要求惩戒霸凌者，实际上等于要求剥夺教师与资产阶级子弟在校园内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是为资本主义学校所不能允许的。

对于中修而言，情况也是类似的。尽管群众在抗议中还没有提出任何变革现存制度的要求，但他们的怒火却并不仅仅是针对霸凌事件本身，而从根本上是向着中修的反动统治的。

在中国社会上，劳动人民毫无权利，被资产阶级肆意剥削、欺压，还根本无处伸冤的情况早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虽然中修在法律上规定人民群众对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等政府机关工作拥有“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权利”完全都是虚无缥缈的。正如在蒲城事件中，警察封锁了全部的消息、销毁了全部的证据，而劳动人民却无权要求他们公示调查过程。更不必说，在中修的威逼利诱和强力镇压之下，这起命案根本没有上报到法院、检察院的可能。中修通过它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确信它的周围布满了易燃的物品，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足以酿成一场火灾。”**[①]他们知道，如果使示威抗议取得哪怕一点成果、如果向蒲城人民做出哪怕一点让步，都会对其他无数受到冤屈的学生和群众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届时，各地都要起来效仿蒲城。因此，色厉内荏的中修企图恐吓群众：谁要是胆敢要求哪怕是最小的改良，都要受到暴力机器的镇压、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除此之外，蒲城事件还有它的特别之处——其动员起来的群众之广、抗议的激烈程度之高，都是类似事件所未有过的。这正说明，中修过去化解此类事件的手段不奏效了，于是便只能将刺刀提上日程。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中修对于家长/学生运动往往只需要封锁消息和实行恐吓，便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因为学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个典型，虽然饱受资本主义学校的压迫，却还需要学历这样一纸资产阶级赐予的“检疫合格证明”，以换取他们所幻想的未来“少干活、多拿钱”的剥削阶级生活；需要维护他们目前在学校不事劳动、肆意淫乐的寄生生活。总之，他们需要保护的个人利益的坛坛罐罐太多。因此，当学校以学业相威胁时，学生便已两腿发软，一旦中修出动警力，他们更是一哄而散。但是，在蒲城的斗争中，与群众一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也是学生——职校生。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职校生虽然同为学生，但他们同学生的其他阶层不同，大部分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除极少数资产阶级子弟或有严重投机思想的分子以外，未来都要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其经济地位类似于即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下层。实际上，绝大多数职校生在他们学业的最后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中，都要受到名为“实习”、实为雇佣劳动的残酷剥削。职业学校往往与工厂勾结，强迫学生接受个位数的时薪和毫无劳动保障、时长超过十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这种劳动严重地摧残着尚未成年的职校生的身心——2020 年 11 月，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学生因不堪超过 12 小时的长期夜班自杀；2021 年 2 月，湖南省临武县职业中学学生右手被卷入机器长达一个小时，造成五级伤残，被迫截去食指和中指。根据中修教育部显然极力粉饰过的统计数据，2013 年，每 10 万名职校实习学生中发生一般性伤害的约为 78.65 人，其中导致死亡的约为 4.69 人，达到工矿企业伤亡率的三倍[②]。

正是在这样沉重的压迫下，职校生与工人阶级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中修统治的黑暗腐朽看得更为分明。即便是尚未参加“实习”的学生，往往也能从更高年级的同学那里了解倒自身未来的处境。同时，由于职校学生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唯一要求便是成为掌握最基本劳动技能的驯服的雇佣奴隶。在这里，资本主义教育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的实质——**“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③]。为了“驯服”学生，职业学校不惜使用最野蛮的方式——“棍棒教育”：2024 年 6 月，山东省莱西市一名职校教师长期使用木棍、铁器等体罚、侮辱学生，甚至强迫学生叼沾上尿液的香烟[④]。2023 年 3 月，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中山职业技术学校被爆出对学生进行

① 列宁：《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② 中国教育报：《职校实习风险多：制度执行之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5/c_127546411.htm。
③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④ 张佳鑫：《职校班主任把烟沾上尿让学生吸 虐待殴打多名学生被刑拘》，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40605/46646722.html。



鹤壁技师学院霸凌事件（下方被遮盖部分为血迹）

殴打辱骂，甚至与法西斯“特训学校”勾结，将最不服从“管教”的学生送入进行非人虐待①。并且，除了教师的虐待外，学生往往还要受到其他学生同样残酷的霸凌：2023 年 6 月，北京市政法职业学院学生李敬言试图制止霸凌却遭到施暴者辱骂，事后被学校逼迫退学②；2024 年 9 月，河南省鹤壁市技师学院学生崔某被学生魏某用板凳猛砸头部、背部③；2024 年 11 月，鹤壁市科技中等专业学校一女学生被强迫跪地自扇耳光，遭到脱衣服、脚踹胸部、用筷子侵害下体等非人迫害④……种种霸凌事件之多数不胜数。在社会的歧视、企业的剥削、教师的虐待和学生的霸凌下，职校生的处境在学生中最为恶劣，因而也最为迫切地要求改变自身的处境、最能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最富有顽强的斗争性。在蒲城事件中，职校学生们正是用自己的勇敢行动，回击了所谓 “职校生低贱”论的污蔑、证明了他们是学生中最具有革命希望的阶层！并且，蒲城事件正是由于职校生相比于一般学生而言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较为深刻的联系，才没有变为一场“独唱”、一场“孤鸿哀鸣”、一场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学生运动。至于深受中修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最为其他受压迫者鸣不平。他们将一个学生的冤屈看作自己的冤屈，不远万里从各地赶来支援蒲城群众的斗争——学生和人民群众正是这样自发地结合在了一起，使示威抗议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运动，这就是中修不惜向蒲城这样一个小县城调集大量警力实行残酷镇压的真正原因！

运动失败的原因

但是，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最终遭到了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贯穿运动始终的矛盾，由此确定运动的性质，最终找出运动失败的原因。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复杂的事物包含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样一种矛盾——主要矛盾，在蒲城事件中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中修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主要矛盾表现为党昶鑫家属与学校及中修政府之间的矛盾——党昶鑫家属无法接受学校与中修政府的蛮横做法，他们到学校门口拉起横幅，要求公道、要求真相。然而，相比于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学校与掌握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关的中修，家属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弱小的。此时，前者占据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党昶鑫家属的抗议活动一经开始，便得到了痛恨中修腐朽统治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同情。于是，支援他们的力量急速扩大，并推动着示威抗议在 5 日至 6 日间达到高潮。此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学校及中修一边，转到力量极大地增强了的党昶鑫家属与人民群众一边。

---

① 兽楼处：《变形记》，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94057.html。
② 大川说说：《最终是批评教育和解？李敬言退学后抓螃蟹，网友：有“钳”横着走》，https://www.163.com/dy/article/IAMN7C850534R48K.html。
③ 深圳新闻网：《河南一职校学生被人多次用板凳砸头？官方：无人员死亡》，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29A09O9700。
④ 澎湃新闻：《鹤壁 16 岁女生遭霸凌续：校长等多人被处理，涉案学生被开除》，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2-11/23/content_36p8mtz9P.html。

然而，由于同情、支援党昶鑫家属的群众主要为小资产阶级①，由于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或政党的领导，尽管群众的斗争是英勇的，但蒲城运动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特点，并且因此最终遭致失败：首先，运动缺乏统一的领导，因而也不能建立起坚强的组织，群众在抗议爆发时是自发聚集、在警察“清场”后也是各自散去，这使得群众在运动高潮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在遭到镇压后也不能实行有组织的退却以重新组织抗议或至少保持某些联系。其次，运动也没有能提出明确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因而能够团结更多阶级或阶层的纲领或口号，而只是把要求停留在“讨公道”、“要真相”的水平上，从而使抗议的目标仍被束缚在校园和现存制度的范围内，这是蒲城运动的没有得到其他各地支持的重要原因。总之，上述原因导致了蒲城人民的抗议最终成为了一场“秘密”的、“孤立”的运动。而随着中修的实行反革命两手，蒲城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被镇压的阶段。



1 月 6 日，党母发布视频称：“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对我的质疑陆续予以解答，希望大家不要轻信谣言到学校聚集，请给我孩子和学校孩子留一片清净。”

中修眼见蒲城的烈火越烧越旺，于是急忙抓住示威抗议的影响尚未扩大的时机，全力开动反革命的暴力机器，调动局部的优势力量开入蒲城扑灭运动，同时不忘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党昶鑫家属屈膝投降。在党昶鑫家属身上，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②虽然党昶鑫家属得到了群众的无私帮助，但前者的眼睛实际上仍是向上看的。他们不充分相信人民的力量，一旦中修施以压力，便拜倒在“权威”和“强力”的脚下，害怕运动的继续发展会为自己引来“更大的祸患”。于是，在 6 日的高潮中，在群众与警察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反而不见了踪影，最终在当晚发出了表明自己彻底向中修屈服的“投降书”。并且，党昶鑫家属对运动的叛卖，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更是由于他们在私有家庭中作为家长所处的压迫者地位。在中国的儒教社会中，孩子对于有产阶级家长而言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投机的工具，是为延续家产与为他们争取人前的

① 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我们仍能根据已有的信息判断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1）运动重要参与者职校生是小资产阶级；（2）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 年）结果，蒲城县城镇人口为 290,039 人，占常住人口的 43.77%；而农村人口为 372,564 人，占常住人口的 56.23%。由此可见，农村小生产者在蒲城县占据多数，同时在城镇中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营户”；（3）尽管蒲城县工业在近年来有所发展，“第二产业”在全县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提升，但许多受雇佣劳动者很可能系直接由农民转化而来，他们的小生产者思想依旧顽固。

②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面子”与养老的“里子”的“活财产”。党昶鑫家属在得知其意外死亡时固然是悲愤的，然而这种感情从根本上仍是“一出于私”。因此，当中修对他们进行恐吓、或许同时还向他们承诺“赔款”（一说学校或中修提出以二百万元“私下了结”此事）时，孩子的冤死同自身的“安宁”和可能得到的钱款相比，便更加不值一提。党昶鑫家属忘记了无数为他们讨要公道而豁出身家性命、甚至还因此遭到警察的殴打和监禁的人民群众，流着虚伪的眼泪（大概还数着温热的钞票），可耻地屈膝投降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党昶鑫家属的行为正是从背后对运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既然死者家属都已经表示对此事不再追究，那么群众继续为他们讨还真相和公理的斗争岂不是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吗？这样岂不是为中修毫无顾忌地镇压群众运动提供了口实吗？

通过对蒲城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矛盾的分析，我们知道：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场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体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领导的自发运动，在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那么，与之相对，无产阶级运动、哪怕是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2022 年 11 月，河南郑州富士康爆发抗议。面对着手执武器的警察，富士康工人沉着冷静、团结一致、各司其职——在前的，如巨浪般一次又一次地向警察的防线发起冲击，迫使警察步步后退；较远的，抄起一切他们所能获得的武器向警察丢去，掩护他们的阶级弟兄；两侧的，拿起手机实时记录斗争的情况，通过一切渠道扩大事件的影响。富士康工人的团结战斗，最终冲破了中修的法西斯封锁，并且配合着全国人民此起彼伏的斗争，推动了国民经济疫情化政策的瓦解。然而，自发运动总是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在冲破警察包围圈后，工人们便急于各自返乡，他们因没有充分估计到斗争的长期性、反复性而对敌人放松了警惕，在扫码领取中修提供的所谓“路费”时遭到锁定，结果便在力量分散时遭到了反攻倒算——不仅被冻结“路费”、还被赋予“红码”，许多人最终因此被关押进“方舱医院”！并且，富士康工人也未能通过斗争建立起比较持久的组织。



富士康工人与“大白”——手执武器、身着防护服的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可见，无论是蒲城事件还是郑州富士康事件，它们所反映出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中国革命目前存在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壮大的群众自发革命力量同革命知识分子及革命组织发展严重落后之间的矛盾”**[①]。列宁指出：**“自发的运动……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

①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①]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克服运动的自发性，就必须有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在运动发起前，共产党人能够进行政治揭露，指出杀死党昶鑫的真凶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指出学生在校园中所受到的压迫只是中国人民在中修法西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压迫中的沧海一粟；在运动开始时，共产党人能够进行周密的计划，将群众组织成为有纪律的队伍，使得警察难以镇压；在警察施暴时，共产党人能够以此深刻地揭露中修的反动面目，使全国人民看见蒲城群众的英勇斗争，从而引起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抗议；对于党昶鑫家属，共产党人能够对其实行团结，同时教育群众警惕他们的妥协倾向，一旦他们果真投降，便立即指出他们已经滚到了敌人方面且这正是中修所玩弄的反革命手段，就算党昶鑫的家属已不再要求真相，我们也依旧要为千万个冤死的"党昶鑫"要求真相，只有继续斗争，才能真正消灭这种冤屈产生的土壤；即便运动因遭到敌人的沉重打击而不得不实行退却，共产党人仍能设法保留运动中建立起的群众联系，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对斗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积极地准备将来的斗争。

使运动由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使运动从自发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变为自觉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否意味着要将学生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呢？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不断破产，其中倾向于无产阶级的部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更是有机会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一员。同时也应当指出，**"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既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不平和愤恨，又对资本主义旧观念保留着眷恋和不舍，于是在不断吸食精神鸦片的生活中消遣自己的不平和愤恨"**[②]，而这种矛盾的状态正是在职校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学生进行残酷压迫的同时，职校教师往往又给他们以吸食精神鸦片的"自由"。许多职校学生从早到晚、从上课到下课，无时无刻不在刷视频、打游戏，浸淫在精神鸦片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毒计——由于职校学生是工人阶级的预备队，资本主义学校不遗余力地使用精神鸦片毒害他们，向他们灌输各色反动思想，企图将他们转化为流氓无产者，进而通过他们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入工人队伍当中。在许多职校内往往流氓帮派横行、嫖娼斗殴成风，一些无产阶级子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也成为了可耻的嫖客和霸凌者，日后更是会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可见，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职校学生思想中反对压迫的部分，也会转变为只反对自己受到压迫、而不反对自己压迫别人的唯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谓"反抗"，只能是"抽刃向更弱者"的法西斯主义暴行，江苏宜兴高校杀人案中的凶手徐加金正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遭到了实习公司的残酷剥削与学校扣留毕业证的管卡压后，不是奋起与压迫者抗争，而是假借什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向八名无辜的女学生举起了屠刀！他极端蔑视女性的法西斯男权思想正是在平日吸食大量精神鸦片、沉迷于色情影像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中明确指出：**"小资产阶级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阶级，必须要把自己从道德败坏中解放出来。"**[③]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劳动改造和阶级斗争的过程，就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参与革命集体活动、改变腐朽生活作风、逐渐抛弃精神鸦片的过程，就是积极主动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坚持思想改造成功所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们十分了解各类精神鸦片与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在转变阶级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便能对其进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②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③ 同上。

行透彻的分析，便能帮助其他还受精神鸦片之害的人。在如今的帝国主义中国，学生的数量极为庞大——2023 年，中国在校学生数量高达 2.91 亿人[①]，与中国职工数量相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终将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果学生们能够在集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周围，真正做到**“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②]，学生运动便会真正自觉地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汇合成一股冲垮中修法西斯统治的洪流！

蒲城的明天与中国的明天

随着中修的残酷镇压，阴霾似乎又笼罩了蒲城。然而，蒲城的明天与整个中国的明天却一定是光明无比的。蒲城事件再一次证实了《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中的论断——**“人民群众已经日益地被中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专横暴虐而激发起来，因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激动起来”**[③]。同时，它也又一次说明：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是一支具有强大力量的革命队伍。他们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因此，在群众的自发运动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安于现状，而应该加快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行无产阶级化的步伐，以便迅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在下一个“党昶鑫”的悲剧发生时站出来领导群众，将他们的怒火变为先锋队领导下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最终推翻中修的反动统治。如今，发布了通告、封锁了网络、镇压了群众，中修政府自以为万事大吉，蒲城的“秩序”与“安宁”已经恢复。然而，这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④]

① 教育在线：《教育部：2023 年全国在校生共 2.91 亿人，比上年减少 151.26 万人》，https://news.eol.cn/meeting/202403/t20240301_2560903.shtml。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③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④ 罗莎·卢森堡：《柏林秩序井然》。

如今缅甸黑地狱，何时太阳照山河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平地惊雷，缅甸电诈重回大众视线

2023 年底，关于中修政府围剿缅甸“电诈四大家族”报道铺天盖地，一度使“中国边境上正横行着大帮犯罪团伙”这一事实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热点资讯。据各大媒体以及群众的曝光，大量“电信诈骗集团”以缅甸北部果敢、佤邦等地区为据点，从事着人口拐卖等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武装和钱财在中缅边境上建立起大量“电信诈骗园区”，通过各种花言巧语诱骗受害者前往园区，而受害者在被拐进园区后就即刻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拘禁起来痛打、侮辱，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这帮人口贩子又会以切断饮食供应为要挟，强迫受害者入伙从事电信诈骗工作，而只要受害者的业绩不达标，先前的侮辱、拘禁和折磨则会立刻重新出现。不仅如此，人口贩子们还将折磨受害者的血腥视频发给其家属，告诉家属只有付出一笔巨额赎金，才能“救回”自己的家人。但哪怕受害者家属砸锅卖铁，出卖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并向电诈团伙支付了天价的赎金，也往往不能赎回亲人的生命，甚至见不到自己亲人的全尸。组成电信诈骗集团的残忍刽子手即使眼见受害者身上已经无利可图，也不愿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常常将受害者殴打虐待至死，还要将其抽干鲜血、摘下内脏变卖，甚至进行活体摘取。这些园区像曾经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一样，不仅拼命榨取受害者的每一滴血，还要从他们的家属身上敲骨吸髓，足足扒下来“几张皮”。

面对如此恐怖的罪行，中修中央和地方政府打出了“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的口号，派出了大量军警进行“中缅联合执法”。这场所谓的联合执法行动持续到 2024 年，共抓捕了数万名涉案人员，逮捕了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四大家族”的数个重要头目。随后，中修官方号称“缅北诈骗园区全部被铲除”，网络上缅北电诈相关信息也即刻销声匿迹，只留下了大量赞美中修政府实行跨国执法的凯歌。而到了一年之后的 2024 年 12 月 30 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更是向缅北“四大家族”之一的明氏集团头目提起了公诉，准备用一场盛大的开庭审理宣告这一次打击电诈行动的彻底胜利。然而，正当中修政府准备在日记本记下“今日无事”，用“公诉”来打消本国群众对于电信诈骗的忧虑与怀疑时，一起被揭露出来的“缅甸诈骗”新案件，却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2025 年 1 月 5 日，演员王星的女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求助，称男友王星赴泰国进组拍戏，但却于北京时间 1 月 3 日中午 12 时许在泰缅边境失联。许多演员转发了这篇求助，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本来，中修政府对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因追求荣华富贵而上当受骗被拐卖到诈骗园区的案件毫不关心。然而，许多电信诈骗受害者家属在看到消息后，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电诈团伙的愤恨，纷纷站出来声援王星女友，揭露缅甸电诈的罪恶。于是，在短短的四天内，王星被骗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全网的相关舆情达到了 1,347,282 条，在 1 月 8 日发出的相关微博推文更是高达 502,461 篇。[①]

转瞬间，中修政府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它还没清理好缅北的战场，“妙瓦底电诈”就又被推上了热搜。接连发生的事件重新点燃了“缅甸电诈”的火药桶。网友们和受害者家属们都意识到，原来电信诈骗非但不像中修政府所说已经被根除，甚至连中缅边境的电诈团伙也从未停止过罪恶活动。接连几次把电诈相关讨论撤下媒体热搜后，中修政府发现自己根本堵不住群众的悠悠众口，压不下群众的滔天怒火。于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中修政

① 广州舆情监控系统：《演员王星在泰缅边境失联事件网络舆情监测分析报告》，http://www.jiayuyuqing.com/?p=2202#page-content。



王星被释放后的惊惧神色

府不得不与泰国警方展开合作去营救王星。1 月 7 日，妙瓦底诈骗园区释放了王星，此时距离他被骗入诈骗园区仅仅经过了四天时间。王星公开露面时惊惧的脸色、布满伤痕的双腿以及胡乱剃光的头发，提醒了人们——此次被曝光的盘踞在泰缅边境的诈骗园区，同先前缅北地区的诈骗园区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另一方面，王星获救之“神速”也使许多人意识到，对于众多毫无背景和钱财的被拐卖者们，中修政府并非“不能救”，而是“不愿救”。

然而，有些受害者家属却被中修政府营救王星的表面功夫所欺骗——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丝来自国家的、虚假的希望。于是就在王星被放出来的第二天，他们自发地创建了“星星回家计划”文档，统计被困缅甸的受害者信息。仅仅两天多的时间，就有 1500 多名受害者的信息登录在文档中。无数人在抖音发布短视频、在微博发帖，希望中修政府再次展开雷霆行动，用武力捍卫人民的生命安全，帮助他们的家人脱离苦海。然而，然而，中修政府给他们的回答却是——查封制作文档的 QQ 群、封禁文档、压低事件热度，力求将他们的呼声扼杀在咽喉之中。王星留下一句“泰国很安全，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后，便登上安全的专机回到了祖国。可是至今仍在苦海中遭受酷刑的广大受害者们还是杳无音讯。中修政府一面发布“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通报，一面又把黑手伸向苦心求援的人们，用实际行动告诉被害人家属：你们的呼声，我们不予回应！而他们之所以决不会落实口头上的演说、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因为中修统治集团自己，便是推动缅甸电诈集团出现和发展壮大至今的最大幕后黑手。



I1233

	A	B	C	D	E	F	G	H	I
1	行动由来（大家别写名字了！）	演员星星获救的消息大快人心的同时，也给予全国众多埋灭在角落中、具有同样遭遇的家属一丝丝希望。据悉24年以来，仍有源源不断的无知中青年乃至未成年被诱骗出境。我们无意挑起任何对立，只想切实引起国家重视，尽快加强打击力度和速度。他们是子女！是父兄！是叔侄！是子孙！是同学！是朋友！我们深切期盼家人回国接受应有后果				填表说明	务必注意隐秘填写！不需细致暴露亲人信息！！只需大致方位 1、本表为在线表格任何人可填写自己亲朋的遭遇，扩大数据库！拉到最后新占领一行进行填写！ 2、大家按顺序抢占表格，每填写一行可自动锁定，他人无权更改内容 3、【特殊身份】可写军人/学生/未成年等等，【立案事由】如未立案则写未立案 4、本表未收集受害人的具体信息姓名和肖像，也请家属放心！可适当隐藏容易暴露的信息保护家人，也会同步各大媒体进行收集曝光这个群体之大，也许下一次大规模解救就有你的功德🙏		
2	【序号】	【受害人性别】	【受害人年龄】	【特殊身份】	【失踪时间】	【立案事由】	【简要轨迹】	【当前位置】	【大致经过、简要简要！！！进展与诉求】
445		男	17	农	2024.7.19	未立案	成都至西双版纳至云县至佤邦	当阳南散物业众鑫集团	
446	531	男	29	农	2024年10月18号	已报案	天津飞到西双版纳最后失恋杳无音讯	最后给我们说的是西双版纳，我们怀疑被骗到缅甸了	11月17号下午在微信上说去西双版纳工作，发过视频和机票，到18号打电话不接，感觉不太对劲，一直打电话没人接，发过天气预报的照片地址是景洪市，我们怀疑是被人骗到缅甸了，联系不上
447		男	33	农	2024.8.14	已报案，警察说是失踪立案。	扬州飞到昆明，最后定位显示缅北。	疑似缅北，具体位置不详，一直未和家人联系。	最后给家人发信息说感觉被骗了，自己会找机会逃出来。然后就和家人失联了，至今未联系。
448		男	38	农	2024年7月6日	已报案	浙江飞到景洪最后失联，云南普洱市公安局告知在佤邦邦康	佤邦邦康	7月6号从浙江杭州去云南景洪，发给杭州的朋友定位在打洛森林公园附近，最后失去消息，直到现在有6个月了，没有跟家人联系过，我们已报警，云南普洱市公安局告知他出境了在佤邦邦康。
449		女	37		2018年10月	没有报案	北京飞到曼谷	疑被骗缅甸	2018年去曼谷旅游，随后说去缅北赚大钱，然后失踪了。曾经发过一张满脸鲜血人事不省照片。
450		男	25	农	2024年10月16日	已报警，但没有立案	只知道到飞机飞到泰国曼谷，叔叔说连回来的机票都买好了	缅甸妙瓦底，每周可联系一次，不敢说在哪里，代号，公司，园区	缅甸妙瓦底，每周可联系一次，不敢说在哪里、代号、公司、园区，曾经谈过赔付。之前可以每天拿手机半小时，谈过赔付后只能一周报一次平安。确定在妙瓦底，电话一直关机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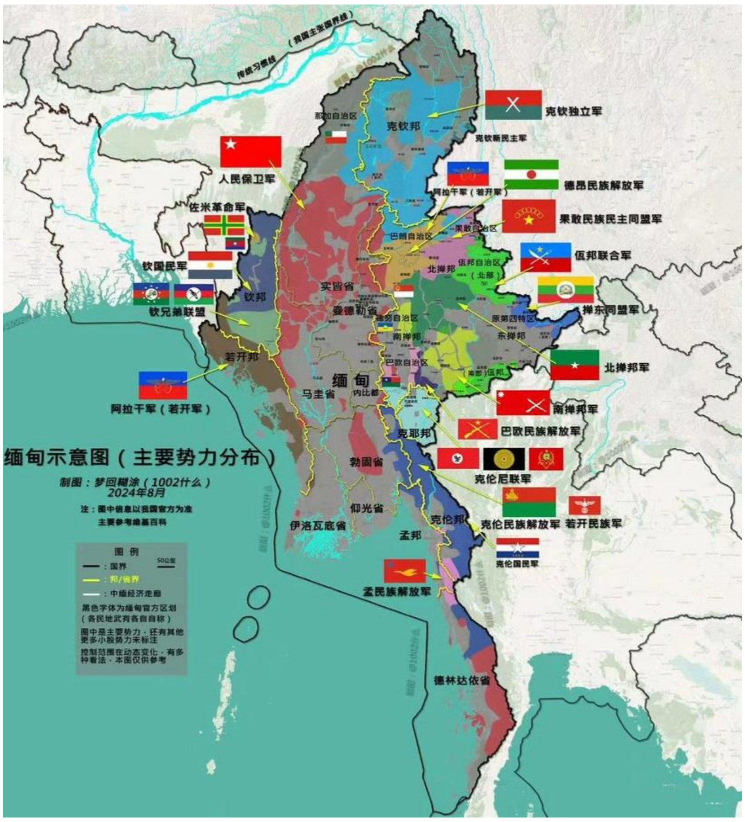
受害者自发制作的“星星回家计划”文档

剖开伪装，见帝国主义侵略真凶

“跨境电诈”实际上是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殖民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催生出的血腥犯罪活动。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固有的混乱现象和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但它不能消除竞争，反而使得竞争更加剧烈。在垄断组织内部、垄断集团之间、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们为争夺商品市场、原料来源，扩大自己的垄断实力以及控制某个经济部门或地区，都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同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群众斗争此伏彼起。因此，能够掠夺廉价原材料、榨取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商品倾销、转移国内人民斗争视线的殖民地

成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复辟接近 50 年后，中修已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强的帝国主义大国，各项矛盾的激化，使得中修争夺殖民地的野心急剧膨胀。以“一带一路”作为幌子之一，中修于全世界寻觅起属于自己的殖民地。而物产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的缅甸则是中修在东南亚盯上的目标之一。

缅甸有着丰富的锡、钨、金、银等稀有金属，还有相当多的石油、天然气、橡胶等战略资源。其地理位置更是令中修垂涎三尺。缅甸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若是拿下了缅甸，则通向印度洋的门户顷刻洞开。此外，缅甸五千四百万的庞大人口规模也成了中修扩大商品倾销的重要目的地。早在本世纪初，中修就注重起了对缅甸的商品、资本输出，其每年对缅甸的贸易顺差几乎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涨。中修以“罂粟替代种植”为借口在农业领域对缅甸扩大资本输出，力图将缅甸变为自己提供廉价农产品的场所。而中修自 2013 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更是在缅甸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打着“援建”之名修筑了“中缅油气管道”等一系列设施，建设起了许多交通要道，为未来的商品、资本输入打下了基础，加深对缅殖民程度。



缅甸混乱的政治局势

同时，缅甸还有着特殊的政治特点。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缅甸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各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者以 “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人为地限制缅甸各民族经济、政治上的联系，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以维持在缅甸的统治。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立武装，大搞分裂，缅甸的无产阶级又始终没有在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缅甸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长期呈现出一种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在地方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买办势力拥兵自重，割据混战；在中央政府，欧美派（“全国民主联盟”，以昂山素季为代表）与中俄派（缅甸国防军，现以敏昂莱为首）争权夺势、倾轧不休。缅甸中央政府买办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矛盾、缅甸中央政府同各民地武的矛盾、各民地武之间的矛盾、侵略缅甸的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复杂的内外矛盾汇聚于缅甸之内，使得缅甸内部的政治分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缅甸单单在明面上就分裂成了十几个政权。极端混乱的政治局势就使得缅甸各割据政权内部以及缅甸与泰国、中国的边境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三不管地带”，中修正好乘虚而入。

于是，许多原先就依靠着开办赌博场所、贩毒、拐卖人口等最卑劣行为起家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修的号召和创造的有利条件下①开始蠢蠢欲动，当起了中国殖民缅甸的急先锋——

① 2017 年，中修政府在北京举办了所谓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快了扩大侵略的步伐。4

他们同控制着边境地区的军阀联系，出重金贿赂这些军阀，以换取进行电诈活动的场所和用于镇压被害者及当地群众的武装。他们在中修的默许和支持下肆意妄为、横行霸道。最早进入泰缅边境并建立世界上最大诈骗园区的黑产商人佘智江就是这群中修殖民走狗中的代表人物。佘智江靠开办网络赌博网站起家，曾因开设赌场获利 22 亿元遭到中修打击，他缺席定罪，随后成为“逃犯”。但很快，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中修国安部招募的外勤（之后他甚至当上了有中修官方背景的中国侨商联合会的副会长）。在 2017 年，他眼见参与“中缅经济走廊”有利可图，就改名换姓，以“唐伦凯”的假名入籍柬埔寨。随后，他进入缅甸，很快就用 30 万美元重金贿赂了当地军阀头目苏奇督，获得了“水沟谷特区”的开发权，预备建设电诈园区。相似的还有澳门黑社会头目尹国驹，他也是在中修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为建设电诈园区做准备，与少数民族军阀“民主克伦佛教军”勾结，在佘智江建立起水沟谷电诈园区后不久就拿下了缅甸塞西港的开发权。此后，臭名昭著的 KK 园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拔地而起。佘智江曾供认不讳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大背景下，海外华商经济与‘一带一路’之间互为唇齿、相互依托。”①这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此类“电诈”园区，完全应该归功于中修政府做着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中修扶植的殖民急先锋拿下了缅甸的土地开发权后，各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与商品输出便如洪水一般袭来：多个中修国有企业都直接投资了缅甸各诈骗园区的建设，如中冶国际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就同佘智江签署了“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项目（一期）”项目合同，合同金额高达 18.3 亿元；中国铁路 20 局集团也于 2019 年 4 月在山西省与同样规模巨大的诈骗园区“亚太新城”签署了战略协议。不仅如此，当地的生活必需品乃至于“电诈”园区内进行诈骗使用的手机、电脑、电话卡等“生产资料”也均是从中国“进口”。从地方到中央，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缅甸电诈的这条黑色产业链上赚的是盆满钵满。同时，电诈园区也使得中修政府可以间接地同实际控制当地的各大军阀建立相对稳固的经济、政治联系，这就大大加深了中修对缅甸的控制程度，使得中修政府此后可以这些电诈园区为基地，进一步向缅甸的内陆地区输出商品和资本。


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设立管委会，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入驻特区的企业享有所得税、关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受缅甸《外国投资法》的保护。

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总规划面积18万亩。规划有科技产业区、休闲旅游区、民族文

点赞中冶集团，共建缅甸妙瓦底智慧园区，日入斗金

洋儿爱音乐
2023-07-30 10:16 广东

为贯彻我国同缅甸经贸发展，由商务部开发，经济交流中心下属国经咨询有限公司

在此次电诈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之前，中文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将电诈园区鼓吹为所谓“一带一路合作典范”的黑文。

中修的侵略给缅甸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为垄断组织服务的美国有组织犯罪》一书曾指出：“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实行政治恐怖和掠夺劳动者的工具之一。”这些犯罪组织“一贯地利用刑事犯、暴徒，血腥地镇压为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斗

月，中缅原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行。11 月，中修政府向缅甸政府提议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企图恢复因 2011 年亲中修的军政府倒台而停滞的中缅铁路建设，将侵略的触手伸向缅甸各处。缅甸的买办政府也顺势出台有利于中修进行资本输出的政策，允许在缅甸数个“最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公司有资格享受 7 年税收减免。

① 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亚太国际控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https://www.facebook.com/mmgoldenphoenix/posts/3143558935662234。

争的劳动者，用招摇撞骗和直接的暴行掠夺人民，实行各种大规模的欺诈行为。”[①]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缅甸的所作所为同过去的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他们同建立园区的资本家、当地军阀沆瀣一气，利用最卑劣无耻的诈骗犯、刽子手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以最野蛮的方式压迫和剥削当地劳动人民——他们强迫缅甸劳动人民放弃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强迫缅甸劳动人民在电诈园区的建设中出工，甚至强迫缅甸劳动人民加入电诈团伙行骗。百年前中国人民面对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洋鬼子曾经揭露道：“通商门开引洋人，洋人比那虎狼狠；吃人肉来吸人血，骨瘦如柴老百姓”，而在今日的缅甸在中修商品和资本输出狂潮和电诈园区四处扎根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民不聊生，中修在缅甸的罪行罄竹难书！

最后，中修将这些由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些诈骗园区作为在未来继续扩大对殖民地侵略的“战争借口”。中修政府在王星事件初期表面上采取了十分冷淡的态度，实则放任大量官媒、自媒体借此事大肆宣扬沙文主义思想。他们一面转移群众对国内热点事件的关注，另一面则将自己粗暴干涉他国警察和政府的殖民行动披上“打击电诈”、“拯救中国公民”的外衣，为未来的进一步殖民活动暗中做准备——在一篇刊登在《环球时报》上的名为《中缅泰打击电诈，从清剿转向治理》的文章中，中修的野心便昭然若揭：文章提到，不仅要形成“打击跨境犯罪的长效合作机制”、还要“实现双边、多边的法律合作、情报共享、执法扩容和监督问责体系……科技赋能打击电信诈骗”，更要“打击电诈方面从‘清剿’转向‘治理’，拓展中国与东盟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内涵和范畴”。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正是中修未来借打击电诈之名而准备推行的殖民计划+获取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情报、推行野蛮的 SIM 卡实名以便镇压、推广国家反诈中心 App 加强监控、进行更加全面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他们无非是说：要由中国来入侵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要由中国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要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

综上所述，“电诈”园区不是别的，正是中修反动集团对缅甸和整个东南亚推行殖民侵略政策中的关键一步和必然结果——对缅甸和整个东南亚更深、更恐怖的殖民活动就将以这些电诈园区为依托开展起来。而真正将无数无辜中缅人民群众送入诈骗园区这个魔窟的，不是别人，正是中修政府自己！

团结起来，血债要用血来偿！

然而，一手造成了缅甸电信诈骗园区里累累血债的中修政府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反倒是要同历史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那样营造反革命的舆论为自己的罪恶遮羞。缅甸电诈事件的受害者们，不仅要被中修庇护的诈骗集团层层盘剥，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还要再被中修豢养的喉舌们兜头泼上一盆脏水，被说成是“自愿”、“活该”，而他们的家属不仅诉苦无门，因亲人的生死未卜倍感煎熬，还要被中修喉舌污蔑为包庇诈骗、纵容犯罪——中修政府在王星事件发酵后很快就抛出了他们屡试不爽的“受害者有罪论”，诋毁起受骗前往电诈园区的群众。他们散布诸如“反诈警察揭露缅北电诈真相：‘95%的人都是自愿过去的’”[②]的言论，攻击被骗的群众是“好言难劝”的“该死的鬼”，甚至指示自己的喉舌胡说什么被骗的人“都是明白自己是去干电诈的”[③]，“甚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家属对此知情并支持”，真是厚颜无耻！实际上，从被中修封禁的“星星回家计划”文档中随便挑出一个受害者的信息都足以击破中修的谎言——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父母身体不好需要赚钱补贴家用，或是家人迫切需要一笔高额手术费，或是丢了工作失业在家，生活难以为继……总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为生活所迫，被“高薪工作”蒙蔽了双眼。究竟是谁

---

① 基福罗夫：《为垄断组织服务的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法律出版社，1956 年。

② 谷雨实验室：《反诈警察揭露缅北电诈真相：“95%的人都是自愿过去的”》，https://news.qq.com/rain/a/20230828A07XCS00。

③ 江宁婆婆：《在境外做诈骗的真的都是被骗过去的吗？》，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N4y1R7D6。

让他们穷困潦倒？是谁让他们"为生活所迫"？不是别人，恰恰是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自己！不正是由于中修制造贫困和失业，誓要榨干人民的每一滴骨血，这些人才在慌不择路之下上当受骗吗？中修的喉舌口口声声说什么缅甸被拐卖人员绝大部分都是自愿成为了诈骗犯，就算他们中的有些人有贪图轻松工作的错误思想，他们就活该被摘取器官命丧黄泉，他们就活该家破人亡吗？哪有人会"自愿"地落到这样的处境呢！中修将一小撮诈骗犯打成是受害者，又将受害者打成诈骗犯，他们有何颜面面对自己同胞的累累白骨，又有何颜面面对自己欠下的累累血债！

中修之所以如此大肆地散布"受害者有罪论"，正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把受害者一竿子打成"自愿"，他们一手建立起缅甸电诈园区的罪行就会被掩盖在他们"解救受害者"的英雄行为之下。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把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就能欺骗人民群众，孤立缅甸人口拐卖的受害者家属的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而自己则从斗争的中心逃之夭夭，摇身一变成为了"宽宏大量"地解救缅北诈骗犯们的"伟大祖国"。

可惜的是，缅甸诈骗受害者家属和广大群众暂时还没有彻底认清中修的真面目，他们争取解救亲人的运动已暂时地处于低潮。出现这一情况，除中修在外部舆论和行动上的打击外，是存在着运动内部的原因。首先，受害者及其家属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其中不乏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明星及其家属，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依附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这些资产阶级明星的家属只是希望利用人民群众在这场运动中造出的声势救回自己的摇钱树，在自己的目的达成后，就会毫不犹豫地从中抽身。而这些资产阶级明星们在获救后，也绝不会顾念其他被拐卖者的利益，只会"感谢祖国"，如王星一般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曾经被虐待被拷打的经历，在前呼后拥下坐上专机回到中国，甚至按照剧本说出什么"泰国是安全的，我下次有机会还会来"的谎话。

其次，除开在运动中起着消极作用的资产阶级明星家属，一批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怀揣着利用群众为自己敛财牟利的个人野心混入了运动，这也是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知名自由派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就打出一副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招牌，在"星星回家计划"文档被封禁后迅速接手，创建了一个"千万星星回家"共享文档，并表示"本表格所收集信息，任何媒体、NGO 等组织均可自由使用，以便推动舆论，增加营救可能。"但实际上，他却在收到受害者家属的投稿后并没有干任何真正有益于受害者的事情，而仅仅是将信息登记在文档上并统计以立案和未立案的占比，此后便不闻不问。而且，就连这仅有的一点统计发布数据的工作，"李老师"都要当甩手掌柜。他将统计信息、制作图表等等工作，全部丢给了志愿者，自己则稳坐钓鱼台，一边博取着名望，一边迫不及待地发行虚拟货币"$Li"，收割了 200 多万美元。另有一些自由派们致力于在网上扒出管理园区的资本家和中修叛徒集团之间的关系，他们挖得不亦乐乎，恨不得挖出习近平亲自指使电诈分子从事人口拐卖。他们自以为是地在各种"猛料"上打转，但是受害者的情况、该怎么帮助他们，这些自由派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作为同样不劳而食的寄生虫，同样吞吃劳动人民血肉的鬣狗，根本不在乎广大群众，他们至多不过想争取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取代中修统治集团成为新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实际帮助到被园区围困的受害者。

最后，受害者家属们的斗争是自发的、分散孤立的，这也导致了争取解救受害者的运动陷入了低潮。受害者家属们的斗争多为个人的单打独斗，缺乏组织，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行动的纲领，这就导致他们不可能持续性的引起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注意并以此向中修政府施加压力以营救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们往往采取在抖音、微博等各个平台甚至线下诉苦求助的方式向政府请愿，而这种方式往往遭到中修政府简单粗暴的镇压—— 1 月 2 日曾有部分受害者家属在云南省公安厅门口抗议中修公安不立案，要求上访，结果却只换来了中修警察的棍棒。由于缺乏一个领导他们并能够把运动坚持到底的组织，受害者家属们的自发反抗最终归于失败，"星星回家计划"文档也石沉大海。

那么，解救受害者的运动就没有希望了吗？并不是！实际上在王星事件爆发后，确实有一部分电诈园区遭到了打击，这是因为缅甸的克伦族人民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在泰国



部分受害者家属曾到警察局前请愿，但很快被反动警察暴力拽离。

应中修要求切断了电诈园区的电力和网络之后，当地本就受到电诈团伙压迫的缅甸普通克伦族人民不堪忍受，进行了斗争，向保护诈骗业务的地方军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表态结束电诈园区中的虐待行为。正是迫于克伦族群众的压力，一些电诈园区中的受害者才能逃出，而当地的军阀部队也完全撤出了一些电诈园区。由此可见，单靠电诈受害者家属们的单打独斗，是无法改变现状、无法找回被拐骗的亲人的。“亲不亲，阶级分”，只要电诈受害者家属们与同为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缅甸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受害者们获救的希望就增加了。

总而言之，面对当前的运动低潮，受害者家属们应当首先设法团结起来，肃清仅仅以为依靠请愿和诉苦就能使得中修大发善心的妥协投降的思想，应当设立统一的目标，进行统一的行动。抗议者们应当要求中修政府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人口拐卖”而非“诈骗”或是“强迫劳动”（诈骗罪可能会使部分为了生存而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在回国后仍要经受牢狱之灾），应当争取尽力解救目前缅北被强迫从事诈骗工作的人员并在他们回国后对他们宽大处理。同时，抗议者们还应当要求彻查缅甸电诈的幕后黑手，将他们严厉惩办并向群众公布真相。同时，只要中修还在放任甚至是支持缅甸（或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诈骗园区继续存在，那么中国人民仍旧有被拐卖、被奴役和鱼肉的危险，中国人民的财产仍有继续被诈骗园区骗取一空的危险。只要中修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停止对东南亚人民的侵略，还没有停止妄图让广大的东南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就还会不停地在东南亚各个地区设立诈骗园区，践踏其土地、蹂躏其人民，在世界各处造成人间炼狱。因此，应当设法使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南亚人民都知道中修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有同时在国内外打击中修政府的嚣张气焰，运动才能取得成果。此外，在现在的中修统治之下，早已是冤案遍于寰宇，单就缅甸诈骗一事，就有如此之多的受害者，那全国范围内，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多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人呢？缅甸诈骗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们应当组织起来，同全中国、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团结在一起，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迫使中修政府让步；应当同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运动结合起来，觉悟了的工人也应当以罢工来支援他们的斗争，中国国内反对中修政府的运动也应当同国外殖民地里反对中修殖民的运动结合起来……而中修势必不会允许这些光明的未来轻易地实现——他们一定要凶狠的反扑。因此，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决的斗争。

要想进行上述斗争，就不能够离开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因为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才能“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并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最终冲破中修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枷锁，摧毁这个腐朽的旧世界。只有无产阶级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也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才能“把全世界人民从剥削阶级的压迫下，

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①]如果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领导这次争取解救受害者的斗争，那么声援这场运动的群众将会声势浩大到让中修颤抖；如果无产阶级在先锋队的领导下能够像巴黎公社时那样掌握枪杆子，那么在面对缅甸的诈骗集团折磨受害者致死的暴行时，我们就能以处死三个逮捕到的电诈头目作为回答！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②]缅甸电诈的受害者们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血债要用血来偿！

①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967 年 4 月 30 日《人民日报》。
② 共产国际：《东方民族》杂志。

没有计划的“计划生育”——批判资本主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计划生育，原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政策。它旨在保护妇儿的身心健康、减轻广大妇女抚养子女和料理家务的负担、实现人口增长的有计划调节，从而促进妇女的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计划生育，不仅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大革命。它促使人民移风易俗，破除孔孟之道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反动思想。实行计划生育，并不是由于我国存在什么“人口过剩”，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中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但是，在 1976 年华国锋—叶剑英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后，“计划生育”却成了他们抹黑社会主义、制造白色恐怖和盘剥劳动人民的手段。在无数婴儿的哭声中、在无数妇女的血泊里，一小撮官僚和资本家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中修叛徒集团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

一、资本主义：为生育计划人民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攻倒算。**“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①]资本主义复辟伊始，修正主义集团便立即大造反动舆论攻击社会主义。他们“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②]，不敢公开撕下“社会主义”的伪装，于是便极力歪曲社会主义，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抹得一团漆黑，又是污蔑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又是宣传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然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及时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社会主义”，那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呢？他们回答说，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要兑现这些空头支票，就非按照他们的路子来不可。除了“联产承包”、“改革开放”、“国企改制”，最终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最重要的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减少人口。然而，他们当真是要继续贯彻毛主席提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吗?

实际上，修正主义者早就预备好了一套反动的人口理论，准备按照他们的办法篡改计划生育政策，这套理论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中国信徒。他出身于封建大商人家庭，青年时得到清政府官费资助留学美国，此后便成为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乏走狗。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马寅初开始极力活动，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为帝国主义主子奔走效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什么遭受到极端的贫困？他回答说：“中国劳动者生计困难的缘故”，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不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侵略，而是“因为人数太多，分配就少了。”[③]那么，又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呢？他回答说：只有“节制生育，减少人口”[④]，只有通过“中美两国的经

①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② 鲁迅：《狂人日记》，《呐喊》，《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③ 马寅初：《评今日我国之讲社会主义者》，1922 年。
④ 马寅初：《现代之新经济政策》，1928 年。

济合作”[①]。不仅如此，马寅初还公开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他在 1935 年说：“日本人口激增，其原有土地不能容纳，大和民族，势必向外发展……日本国内，只有工业，农业无可发展，故必须向国外寻求原料与食品”。马寅初的反动人口理论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光辉胜利。

解放后，马寅初怀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拒绝进行思想改造。在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和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他摇身一变，以“学术权威”的身份继续从事其反动活动。1955 年，正当我国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提出了他的人口理论，在当时遭到了批评未予发表。1957 年，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时候，马寅初迫不及待地重弹英国地主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老调，提出反动的“新人口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1958 年，面对大跃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第三次提出了他的人口理论，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猖狂地攻击道：“粮食增长的速率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变成问题的”。他还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②]的教导，说什么“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尔萨斯对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看法一点没错”，“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企图离间工农联盟、恐吓革命人民。他的“新人口论”的提出与彭德怀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掀起的“反冒进”逆流遥相呼应，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马寅初说：“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革命。”他攻击人口太多拖住了技术革命的后腿，由于我国人口太多，想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也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而靠自身的积累，又“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因而是办不到的，除非“节制人口”。


马寅初和他的八个孩子

马寅初提出了什么办法“节制人口”呢？他像他的老前辈马尔萨斯一样狂叫着要用堕胎、弃婴、杀婴来降低生育率，要用战争、瘟疫、饥荒来消灭过剩人口。显而易见，他的“新人口论”以及相应的强制每对夫妇生育至多生育两个孩子，一旦超生便征以重税的生育政策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任何实施的社会基础。在理论上，虽然马寅初狂妄地声称自己要顽抗到底，“单枪匹马，直至战死为止”，但他的“新人口论”一经出笼，便迅速地遭到革命人民的批判，不久便销声匿迹了。而在实践上，他所信奉的马尔萨斯主义反动观点更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所彻底否定。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等原因，人口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据统计，平均每年递增 2%左右。由于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产的发展速度则是更快的。单是粮食生产一项，即从 1949 年的 2162 亿斤上升至 1971 年的 4920 亿斤，平均每年递增 4%左右。[③]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推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这套破烂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没有翻起什么风浪。

①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 年。
②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③ 参看徐禾：《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 年。

但是，昔日在社会主义时期被革命人民弃如敝履的东西，却被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们奉为圭臬。马寅初的反动人口理论正切合了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他们急切地需要一个借口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后迅速出现的巨大贫富差距，以合理化劳动人民时隔三十年所再度遭受的饥饿、贫困和劳动折磨。因此，他们迅速把为马寅初"平反"放到了日程上。1979 年，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大笔一挥，将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寅初的批判统统推翻，为他"恢复名誉"、"彻底平反"。随后，他们便开始大力宣扬"新人口论"，并在此基础上贯彻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一面通过复辟资本主义聚集大量社会财富，一面通过宣传"新人口论"打消人民反抗，走资派的用心不可谓不险恶。正如"新人口论"的祖师爷马尔萨斯曾供认的那样，"如果这些真理（即其反动的人口理论——引者注）能一步一步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那末下层阶级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就会成为更温顺的和更守秩序的了，也就不会在缺粮的季节里动辄骚扰滋事，并且由于认识到劳动的价格和养家活口的生活资料问题的解决多半不决定于革命，他们将永远不易受到煽动性出版物的影响了"①，他们也同样企图使人相信，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严重贫富分化和长期贫困，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人多地少"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而与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攻倒算毫不相干。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顺利地、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一时之间，"中国人穷，就是因为生得太多"，成了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然而，果真是因为中国人生得太多，把自己都吃穷了吗？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就有一小撮人富起来了，而且是极端地"富裕"。他们不仅没有因为"中国人口太多"而遭受贫穷，反而利用了这些"廉价人口"，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嘴流油。就为了这一小撮人自私、下流、卑劣的利益，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不仅制造了这个世纪骗局，还不惜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持它。自称毛主席路线继承者的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为基础，在这套颠倒黑白的唯心主义理论上炮制了他们自己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屠杀与谎言中，中修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竭力巩固着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遍及全国的白色恐怖

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②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通过暴力实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极力加强手中的暴力机关，镇压人民的反抗。计划生育同样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用以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借口，尽管他们在嘴上仍然假惺惺宣传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妇女健康着想，可一旦落到实践中，他们就借此大力豢养走狗、加强暴力机关，想要用血腥的屠刀"教育"人民，逼迫他们服从资本主义秩序。在马寅初"平反"的几个月后，大走资派陈云就公开叫嚣，实行计划生育要"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③。当 1982 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时，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计划生育的实行效果更成为了各级官僚能否升官发财的评定指标。1982 年后，全国各地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对于那些未能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的官员，将一票否决其晋升、评优、评先进等资格。利欲熏心的各级政府纷纷设立"计划生育专项经费"，并委托地方官员组织形形色色的"计划生育执法大队"，不惜用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他们从收缴来的罚款中抽出一小部分收买群众中的落后分子，鼓励群众互相监视、举报超生人员。山东章丘市政府就曾公开悬赏举报违法生育，鼓励市民举报"超生"现象，对举报者最高可奖 6000 元④。他们以现代"保甲制度"分化群众，一时间人人自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豢养的计生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 年。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④ 陈云：《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
① 赵孟：《山东章丘悬赏举报超生最高奖六千，再引社会抚养费去向质疑》，

执法人员一旦收到有关超生人员的消息，便迅速组织一行十余人出发，若在临近省份，就包车前往；若远，就搭火车，赶到超生家庭打工的地方，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连夜抓捕。若是遇到“配合”工作的超生户，计生执法人员就将其带去附近的医务室，强迫其进行流产、结扎手术。若是遇到不愿配合的超生户，计生执法人员往往直接将其逮捕，强制带回老家动手术。这些泯灭人性的豺狼鬣狗面对超生的孕妇，不论其怀胎几月、如何央求，一概以“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一条红线，是一票否决”回答，决不愿放下手中杀害孩子的屠刀。即便是足月的产妇，若不幸被计生人员抓获，同样也要被强制送去做引产手术。如果引产下来的孩子是活的，地方官员就强迫医院医生杀害活婴。一系列诸如溺死、捂死、打针毒死婴儿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竟成了计划生育中不足为奇的常事！1991 年，山东聊城冠县官员曾昭起眼见计划生育指标执行不力，竟要求当地自 5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的一百天内一个孩子都不许出生。当地官员强令计生人员、公安、武警抓人，确保所有怀孕妇女从 5 月 1 日起强制堕胎。诸如“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宁肯血流成河，不肯多生一个”的反动标语遍布大街小巷。若有人民胆敢反抗，他们便调集公安、武警进行暴力镇压，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



左图为被强制引产的妇女，右图为反动标语之一

“中国式”的资本原始积累

除了为在政治上镇压、恐吓广大劳动人民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计划生育同样有着经济上的考量。

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在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不复存在，农民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迅速分化，大部分失去除小块口粮田以外的土地，社队企业或者遭到解散、或者被变卖给私人，过去由集体组织进行的公共工程建设完全停止，持续二十余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被叫停。在此基础上，农村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他们约有 1.5 亿人，两手空空、饥肠辘辘，如潮水一般涌向城市谋生。然而，城市的情况也并无二致。1979 年，全国城市中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 2000 万①，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大量企业的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增大了失业劳动者的队伍。在整个 90 年代中，国企员工下岗人数共达 4500 万人②。这一切，使资产阶级拥有了充足且足够廉价的劳动力储备，他们不仅不必担心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且还准备进一步压低劳动力价格。计划生育政策便是如此“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中的一环。

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它由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其中包含有劳动力的延续——即工人养育下一代的费用。显而易见，减少了社会受抚养人口的计划生育，通过降低这一部分费用，为减少工人的工资创造了条件。虽然，工资并不是一个固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2399。
②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
① 根据《就业基本情况（1999 年）》与《2002 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国有单位职工共减少 4326 万人。

定不变的数量，它的现实水平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决定的。但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失去了原先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在暴力镇压下丧失了将本阶级组织起来的革命组织。这使得资产阶级能够肆无忌惮地将工资降低到最低限度，进而减少可变资本的支出，加速资本的积聚。

当然，对于利欲熏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言，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有更加直接的好处——敛财。一方面，社会受抚养人口的减少降低了国家财政中的福利支出。另一方面，早在80年代初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便采取了马寅初的反动建议，决定针对超生群众征收重税，设置了所谓的“超生罚款”。尽管它的后来名称一变再变，最终改为动听的“社会抚养费”，但其作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不折不扣的一大苛捐杂税的实质从未改变。此外，计划生育一系列项目的开销全部都需要劳动人民自己承担，竟连臭名昭著的强制人流、引产等项目都要受害者自己出钱！面对迟迟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群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也有的是“办法”，“你违法生孩子，我依法拆房子！”从直接去超生户家里抢劫财物、掠夺存粮，到拿着锄头去生活困难无力缴纳罚金的超生户家庭，爬上房子扒开房顶，牵走耕牛，抢走家中最后一袋粮食，中修政府无所不用其极。陕西省镇坪县冯建梅及其丈夫因无力缴纳4万元罚款，怀有第二胎七个月的冯建梅被地方官员逮捕。在被迫签订引产协议后，冯建梅被放倒并注射了堕胎药。此后，计生官员更是将死胎放置在她身边以催促她尽快缴纳罚款。河北省昌黎县的杨忠臣与金亚妮夫妇即使已经同意缴纳罚款，却因为没有及时补办准生证，怀孕9个月的金亚妮被强制引产。金亚妮被注射引产针后胎儿死亡但体积过大，两天内不能自行从体内流出，医生便将产钳探入金亚妮体内，将胎儿头部绞碎后取出，从此她丧失了生育能力……无数惨案遍布全国各地，泯灭人性一词都不足以形容中修统治集团的罪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嘴流油，仅根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公开数据显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抚养费的年征收规模就在200亿至300亿之间。[①]“社会抚养费”甚至成了一笔“长期收入”，有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而父母还在被追缴社会抚养费。在一些地区，没有按时交社会抚养费的，还会被列入征信黑名单。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未公开过这一大笔赃款浮财的去处，但从2021年社会抚养费机制取消后，一些计生办走狗 “一分钱也拿不到了”的哀嚎声中，也可确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了这帮乏走狗手中血淋淋的奖金。



冯建梅与她身边的死胎

暴力镇压、高额罚金……中国妇女本就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地位，“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用一连串反人类的暴力措施剥夺了中国妇女仅剩的一点生育的自由。从1980年到2010年，资本主义中国用了四十年时间，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6降到了1.28这一全世界倒数的水平[②]。如修正主义分子们所愿，中国的生育率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了，但是四十年前邓小平开出的“共同富裕”这一空头支票兑现了吗？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国家。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数以亿计劳动人民终日苦劳，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有了显著增长。然而，广大群众依旧身无分文，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资本主义制度加在广大人民头上的贫困、压迫和劳动折磨日益深重。绝大多数人的劳而不获，成就了一小撮人的不劳而获。

② 中国法院网：《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截留挪用时有发生》。

① 快易理财网：《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统计》，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population_fertility_perc/chn.html。

“田园牧歌”式的谎言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①]中修统治集团同样不仅通过暴力手段，而且通过宣扬牧师式的谎言欺骗、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左手杀婴屠刀上的血迹还未干，右手便已捧起了节制人口就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布道书。

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广泛传播。中修堂而皇之地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写进高中教科书之中，在此基础上编造了“环境承载力”、“人口容量”、“合理人口容量”这三个概念。他们说，环境对人口的容量是有限度的，一定时期内，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是一定的。而人口容量便是在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容纳的最高人口数量。人口合理容量则是指在有效和持续地利用资源、环境并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一定地区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他们说中国人民之所以贫穷，都是因为人口数量过多超过了“合理人口容量”阻碍了经济发展。如果人口再增加下去，超过了人口容量，中国就将走向崩溃，但只要减少人口，中国的经济便能立刻腾飞，失业和贫困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他们编造谎言，声称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人均不足”，“严重阻碍了生产发展”，胡说什么“现在中国有 14 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会增加一倍，我们会过得更幸福”。然而，中国的人真的太多了吗？从人口密度来看，2021 年，中国为 149 人/平方公里，韩国为 530 人/平方公里，日本为 344 人/平方公里，他们的人均收入均高于中国[②]。同时，非洲面积 302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人口和中国几乎相当，为什么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呢？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人口合理容量”就此失了灵呢？对此，中修又慌忙打出补丁，说资源虽然是地区人口容量的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交通优势，提升人口容量，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凭借着领先的技术提升了人口容量，使他们的人民相对生活得更好。同时，中修还强调指出，这些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他们近年来经济的衰退，也正是因为老龄化的人口超出了“人口合理容量”。至此，他们将劳动人民所受的一切苦难都归结于他们的咎由自取——生，生，生，只知道生！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你们生了那么多中国人，如今一切不过是自讨苦吃！在对劳动人民进行这一阵冷嘲热讽之后，他们又在其耳边轻声细语地唱起了田园牧歌：忍吧！忍吧！忍到这一代超生的人口死完了，忍到中国人少下去了，你们下一代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四十载后的破产

2024 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了-0.99‰，然而，“忍”了一辈子的中国人的好日子来到了吗？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用自己的血汗牺牲创造出了高耸的楼房、宽阔的街道、飞奔的汽车、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在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同样也包含着购买这一切他们所创造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可这偌大的“盛世”却与他们毫无关系，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四十载猛于虎的残酷剥削、飙升的房价，使得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绝对贫困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仅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让人民群众的负债总额翻了十几倍。至 2023 年，即使将那些毫无收入的婴幼儿、学生也计算在内，每个中国人都至少背上了六万余元的债务。[③]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根本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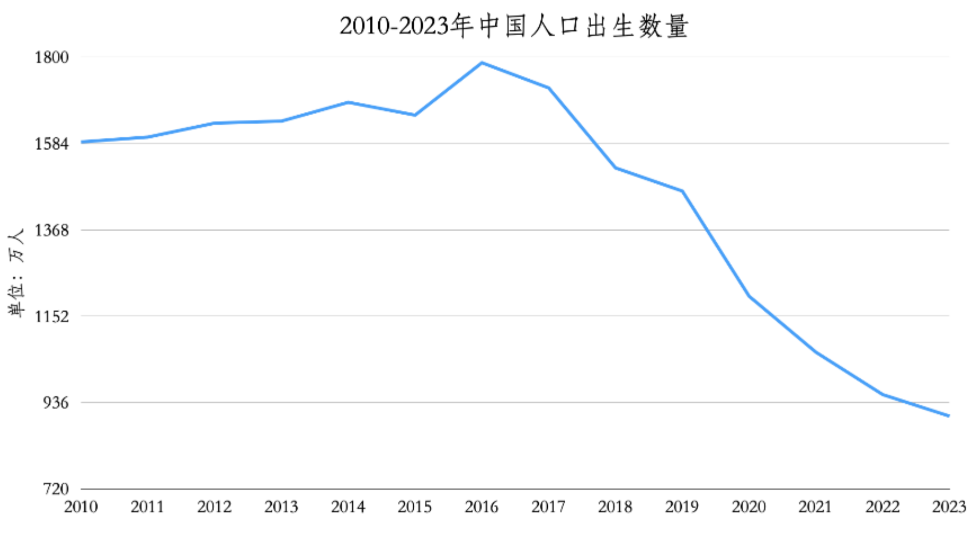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③ 快易理财网：《中国、日本、韩国历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数）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population_density/chn-jpn-kor.html。
③ 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债务结构优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https://www.cncc.cn/gzdt/xydt/202209/t20220920_1093.html。

办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想要不被债务压垮、勉强维持现有的生活已是困难重重，至于养育下一代，承担他们的生活、教育费用更是成了天方夜谭。

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趋势使得他们无力养育自己的下一代，生育率的骤然下降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巨大的断层，2010 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依然维持下降趋势。在社会主义时期度过自己幼年、青年的庞大一代陆续老去。相比起来，那些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出生，正处于中青年的一代的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数量却要少得多。2000 年，60 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有 6.96%，仅仅二十年时间，这一比例就翻了三倍，到 2020 年已达 19.8%，足有 2.8 亿人。自 2010 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就不断下降；2013 年后，连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值也持续减少。2011 年至 2019 年，45—64 岁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从 33.74%上升为 41.94%[①]。而自 2011 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却相应地减少了 6000 多万[②]。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时的“人少”反而成为了新的危机。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社会受抚养人口规模不减反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见青年一代所占人口比例不断下跌，新生儿的出生数量岌岌可危，可供他们剥削的“人类材料”已经接近“青黄不接”。此时，“计划生育”这一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被三令五申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便被迅速打入了冷宫，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谢幕。

2013 年 8 月，中国政府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全体人民宣称，要“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而在仅仅五个月后，12 月 28 日，中国政府便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要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持续了近四十年、铺天盖地的计划生育宣传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明眼人都能够看出，“计划生育”政策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2016 年，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被豢养了数十年的近 800 万计生办走狗们突然无所适从起来：他们从“追着人做结扎”变成“追着人做孕检”，从强迫人民不许生、变成“低三下四”求人民生；曾经刷满农村墙面的“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变成了“放开二孩政策好，生对儿女好养老”。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满心以为，他们如今既已“恩赐”给了人民被剥夺了四十年的生育自由，人民便会如他们所愿掀起一轮新的“婴儿潮”，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供剥削的“人类材料”。可他们错了，错得一塌糊涂。

伟大导师马克思早已指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



② 童玉芬、刘志丽、宫倩楠：《从七普数据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2021 年《人口研究》。
③ 桐欣、郭晋晖：《人口迈入“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 10 年前已达峰，人才红利如何释放》：https://www.yicai.com/news/101655451.html。

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①]由于劳动人民的工资早已被压低到不足以养育自己的后代，“全面二孩”政策颁布后，仅有2016、2017两年出生人口超过1700万，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出生人口数量都以平均每年减少约200万的速度断崖式下跌。2021年放开三胎并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后，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事实上不复存在，可出生人口急剧减少的趋势却并未改变。至2023年，这一数字已仅有903万人，中国总人口数量连续两年下降。这还是建立在我们对国家统计局数据信任的前提上，考虑到中国政府已有数年未公布过每名婴儿出生强制接种的卡介苗的接种数据，实际的出生人口可能还要远低于这一数字。

“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②]眼见一纸纸空文丝毫未能唤起人民群众的“生育热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动用起自己的行政、舆论工具，采取了除改善人民生活待遇外的一切办法，昏招迭出。反动派们将自己过去用来装潢门面的“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丢在一旁，鼓动自己的喉舌大吵大嚷，胡诌起什么“生孩子后乳腺癌几率下降，不容易痛经”、“女性生育的黄金时期是20岁到29岁”，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为了让女性安心回家当生育机器，他们甚至把那些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封建礼教都扒了出来，大肆鼓吹起什么“复兴传统家风”。中修总头目习近平更是亲自出马，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这一类臭不可闻的粪秽都列为了他口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③]，真是活脱脱一副封建卫道士的嘴脸！当然，他们也偶尔会拿出米粒大小的“奖赏”来鼓励一下人民群众踊跃生育，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对该地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不过相比于养育下一代所需要的天价费用，这一点少得可怜的育儿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据统计，2022年，中国大陆0—17岁孩子“生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平均每年近3万元，比同期不到2.5万元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出20%。[④]可见，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趋势不改变，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当然也不会改变，中修用于挽救生育率的种种“病急乱投医”的手段注定付之东流。

中修如今用于刺激生育的政策真可谓又愚又迂，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看到都不免哈哈大笑。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放下对于资产阶级的警惕。回顾资本主义中国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史，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没有一刻停止过用谎言欺骗人民、用暴力镇压人民，他们为了实现自己这个最腐朽、最反动的阶级的利益，必然无所不用其极，一定还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⑤]。当年，他们使用蛮力将孩子从妇女的肚子里打出来，如今他们又恨不得把孩子塞回去。为了维护反动家庭的稳固、延缓生育率的下滑，中修于2021年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离婚冷静期”制度，要求提出离婚申请后，要经过30日的“冷静期”才能解除婚姻关系。2024年以来，中国政府更是不顾一切地推行各种反动措施，妄图将女性死死束缚在家庭之中，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8月12日，中国政府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进行结婚登记可不再需要户口本，大大降低那些受诱骗、受绑架的女性踏入婚姻坟墓的门槛。其中，更为骇人的则是这部条例进一步“细化”了离婚冷静期制度，规定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任何一方”均可随时撤回离婚申请；到期时只要任意一方不到场申领离婚证，离婚就视为无效，中国的女性竟丧失了最基本的离婚的自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③ 习近平，转引自人民网：《习近平谈家风建设》，https://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2/c1001-31792411.html。
④ 育娲人口研究：《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
②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由。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愈是接近它的灭亡，它的反扑就愈是激烈，若是再过几年，又安知其会不会如过去的罗马尼亚修正主义政府一般，设立什么“月经警察”[①]，用暴力剥夺女性选择不生育的权利？

中修“计划生育”的政策成了荒唐的笑话，“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那一套也破了产。随着中国日益地成为一个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中修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小资产阶级大量地、迅速地破产了。曾经，这些小资产阶级们笃信着只要国家不断地开拓疆域，不断地节制人口、革新技术、发展经济，中国的人口数量就能够降到“人口合理容量”，等到中国的“上一代”们死完了，“下一代”们的好日子总该到来了吧。可现实却将他们的幻想无情地击碎了。现在，中国的人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贫穷，不是因为人多地少，不是由于计划生育执行得不够彻底，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中修的“计划生育”已经彻底沦为了笑话。

二、社会主义：为人民计划生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许多小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压迫，认识到自己行将破产的命运，认识到生育子女只会延续自己这一代受到的压迫，选择了以“不生”作为沉默的反抗。但由于儒教家庭的压力、资本主义制度下养老的现实以及他们希望依靠子女投机巩固自身阶级地位的幻想，他们往往最终还是会选择组建家庭，生育子女。多数女性也难逃被当作商品出卖，成为家庭奴隶的命运。但是，我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在本文开头便已提到，社会主义中国也曾推行过“计划生育”的政策。彼时，毛主席带领革命人民斗倒了蔑视人民的走资派，批判了“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为了中国的“半边天”——妇女的彻底解放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同时鼓励晚婚晚育。

在旧社会里，无数的女性由于受到父权制的压迫、缺乏生育相关知识以及受到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没有“不生”的自由，只能作为家庭奴隶和生育工具而活。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革命干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通过向全体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进行计划生育。领导干部带头实行节育措施，同赤脚医生一同深入基层，向人民群众推广卫生健康知识，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努力发展保护健康、方便群众的两性节育技术，壮大革命化的节育技术队伍；鼓励男到女家，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实现男女平等；革命人民在上层建筑领域遍插红旗，破除在婚姻、生育问题上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批判孔孟之道的封建余毒。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不用再在十六七岁就因过度生育落下终身的疾病，不用再盲目地顺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世界观还没成熟时过早地将自己的一生所托非人，不用再在青春年少时被关入狭小的家庭，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度过余生。她们可以选择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投入社会生产而不是浪费在个人的婚姻与家庭上。

在社会主义中国，妇女拥有“不生”的自由，也拥有着生育的自由。但生育的自由绝不意味着多生几个孩子，生个儿女双全，生个子孙满堂，这样的自由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自由”。**“妇女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②]妇女真正的生育自由，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实现。投入社会生产以开阔眼界、学习马列以明辨是非，投身阶级斗争以增长才干……当妇女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时，她们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明白自己将要选择同什么样的人恋爱、结婚、孕育子女，第一次真正地拥有恋爱、婚姻、生育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国还设立了育儿所、集体食堂等，让妇女能够进入生产战线，在结婚生育后仍然能不为子女、家务所牵累。无数妇女翻身解放，在生育后经过恢复很快投入生产，在经济建设上撑起了“半边天”。仅江苏丹阳高桥大队就通过队办托

---

③ 1966 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实施政策禁止堕胎，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② 列宁，转引自克拉拉·蔡特金：《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列宁印象记》。

儿所解放了一百三四十个妇女，她们的投工量占到了全大队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七十。

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才真正拥有了生育的自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6 年至 1976 年，社会主义中国总和生育率从 6.31 下降到了 3.24[①]，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革命人民已经用实践告诉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实现计划生育的道路是可行的，也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可行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红太阳的光辉下，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计划生育，实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让妇女可以不仅仅为了家务、为了生育而生活，而能够成为撑起半边天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成为新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② 快易理财网：《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统计》。

中修为何翻来覆去反对“躺平”？——兼评裴頠的“崇有论”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西晋士族大地主阶级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

在中国的哲学史上，不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唯心主义内部的各派哲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西晋时期士族大地主阶级的御用哲学——玄学内部就曾爆发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和裴頠的“崇有论”之间的斗争。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主张“无为”，宣扬放浪形骸的享乐哲学，反动性是很明显的。而裴頠的“崇有论”则似乎是以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出现，“痛心疾首”地指责“贵无”败坏了社会风气，让世人道德败坏，要人们放弃淫乐，回归到“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的儒家传统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颇具迷惑性。但是裴頠的这番指责，只是儒家内部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他批评“贵无论”与其说是责备它的享乐主义，不如说是责备它让士族大地主阶级肆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淫乐活动而忘记了相互之间的内部团结。因此，貌似“进取”的崇有论和空谈“无为”的贵无论在其历史地位上，都不过是在反动性上旗鼓相当的一丘之貉。虽说如此，**“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①]裴頠的这种虚伪面貌，他的这一套道貌岸然的“崇有论”，对今天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让人们能够看清何为“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可以帮助人们更加认清如今大喊“奋斗”，反对“躺平”，貌似如此“积极向上”的中修到底是何居心。

裴頠的“崇有论”思想

裴頠出身河东裴氏，其父官至司空。他少时就继承了其父的爵位，是士族大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反动政治人物和哲学家。裴頠的一生是“克己复礼”的一生，西晋一取得全国政权，他就“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②]急不可耐地宣扬起尊孔读经的老一套。为了维护士族大地主阶级的内部稳定，对内巩固以门阀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他卖力地为“名教”摇旗呐喊，宣扬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直至死于“八王之乱”。

裴頠并未明确回答何为世界本源的问题，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生”出来的，借此玩弄存在与非存在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③]，精神与物质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而“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只是否定了非存在不能产生存在，之后就与郭象的说法如出一辙，万物都是自然生化出来，而且客观存在的。但是存在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裴頠认可“自生”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晋书· 裴頠传》。
③ 裴頠：《崇有论》。

是要证明封建纲常既然存在，那也和其他万事万物一样都是“自生”出来的，因而天然合理。但裴頠并不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把“道”抬高到整个物质世界之上，将神换了一个名字以达到偷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的目的。

既然裴頠在本体论上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他所谓的“崇有”又到底是崇些什么呢？不过是更加露骨地宣扬“名教”罢了。何晏、王弼一类玄学家提所谓“天理自然”主要还只局限于从玄学理论上去宣扬封建纲常的合理性，裴頠则更进一步，他公开声明自己“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写作《崇有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遂相放效，风教陵迟”的现状，要求在整个社会复兴名教。因此，裴頠尊崇的“有”指的就是名教，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也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



“竹林七贤”之一——阮籍

裴頠写作崇有论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改变士族大地主内部“不重名教”的现状，想要通过宣扬名教来维护士族地主阶级内部团结。他批评当时王衍一类玄学家“贵无”的论调，是因为当时的士族大地主为了给自己“及时行乐”辩护，他们宣扬的玄学竟把万事万物都说成是“无”，那么“名教”也就成了虚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封建等级制度，不利于士族大地主的内部团结。因此，裴頠痛陈“贱有”即士族大地主内部轻视名教之风的危害，并给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他认为如阮籍、嵇康一类士族大地主玄学家，他们“卑贱万有”，进而就要放荡形骸，疯狂追求物质享乐而不守地主阶级的制度规范、伦理道德，最后就必定抛弃礼仪。要是防止地主阶级内部大打出手的一套礼教竟都被他们自己抛弃了，那怎么办呢？裴頠惊恐地大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他进一步宣扬“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要求士族大地主内部“克己复礼”，遵守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士族地主阶级的内部稳定。但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士族大地主都是一帮鱼肉百姓的恶霸，他们不择手段地谋求个人利益，彼此间的矛盾很快就演变成了激烈的外部冲突，连裴頠自己也死在了“八王之乱”中。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①西晋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从一开始就非常尖锐。裴頠十分清楚，单靠宣扬士族地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不能使西晋的反动统治万古长存。劳动人民早已不堪剥削与压迫，他们对西晋黑暗统治的怒火如同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把士族大地主的统治震得摇摇晃晃。因此裴頠想方设法反对“无为”的作风，将士族地主动员起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他批评王衍一类玄学家“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掌握中央政权却不自觉维护西晋的统治。他主张当权的士族大地主要“有为”，自觉地维护、传播封建礼教，以使劳动人民永远安于当时的黑暗统治。他首先把劳动人民都污蔑为没有思考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行尸走肉，认为“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天下的劳动人民顺从统治，就如同水在器皿中一样，他们“信于所习”，圣人教化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而统治阶级的任务就是造出这么一个承装“水”的器皿，封建君主必须“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制定礼教刑法，并推行“教化”，用封建礼教束缚劳动人民，使得他们“心服其业”，终身心甘情愿地为士族大地主当牛做马。**“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



“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裴頠的一套哲学理论就是要极力宣扬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最终实现他“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的罪恶目的。不仅地主阶级内部要永远维持等级制度，高门永远是高门，寒门永远是寒门，劳动人民也要永无二心、各安其分，不产生任何改变现状的异心。

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打着“崇有”的旗号，佯装反对淫乐至死，实则为残暴黑暗的封建统治大力辩护。他同王弼、何晏的斗争，是士族大地主阶级内部一派玄学家反对另一派玄学家之间的斗争，玄学势微后，他那些维护“名教”的后继者便自居为得胜的“正统”，换个姿势继续剥削人民。两宋明清之际大谈“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们，正是摆着裴頠式的脸孔，用剥削农民得来的膏血纵情享乐，却道貌岸然地抨击什么“世风日下”、“礼崩乐坏”，指责农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造反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用虚伪的“仁义道德”吃人，可谓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现代社会的裴頠们

裴頠虽然已经化为齑粉，但是他“崇有”的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已经和西晋时的士族大地主阶级一样，成为了一个濒临灭亡的没落阶级，因此也就制造出了极端腐朽的精神文化，各式各样诲淫诲盗的反动文化在此情况下层出不穷。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纸醉金迷、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将凶杀、色情、欺诈等一切反动恶行都当作值得炫耀的资本，鼓吹应该无限放任自己各种肮脏欲望的享乐主义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将灭亡时陷入绝望的反映。

而比起资产阶级更加绝望的则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既有能力，又富有反革命魄力的资产阶级不同，虽然同样不甘于灭亡，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反动，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分化因压迫的加重而更加剧烈了，他们从未如此不稳定过，如此感到他们已经绝了升官发财，跻身资产阶级的路，只能破产为靠雇佣劳动过活的无产者了。可是，小资产阶级不仅受着资本主义的压迫，还有着私有财产的负累，跟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文化眉来眼去，和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不想革命，又不想加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苦，那么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大搞鼓吹寄生和享乐主义的“躺平”生活，试图逃避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必然命运了。



互联网上流行的“躺平”表情包

正因如此，“躺平”如今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一批批小资产阶级在绝望中和“贵无”的玄学家们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为”，不思工作，纵情淫乐，用空虚的低级趣味填补低级趣味带来的空虚，最后愈发空虚、徒耗光阴。就连中修的各种喉舌也不得不承认，“躺平”思想已经“风行一时”，“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选择了‘放过自己’”。[③]

---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 年。
③ 杨辰玥：《奋进的青春拒绝“躺平”与“内卷”》，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2/1105/c447715-32559516.html。



中修喉舌新华社、中修头目习近平反对“躺平”

但中修并不对“躺平”思想的广泛传播乐见其成，他们对“躺平”思想的激烈反对是肉眼可见的。2021 年 4 月 17 日，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①]的百度贴吧贴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仅仅一个月后的 5 月 20 日，中修喉舌新华社就转载了一篇名为《“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的文章，声称“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②]。5 月 30 日，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题为“拒绝‘躺平’的 86 岁科学家”的微博视频，鼓动人们应该“拒绝‘躺平’”，效仿这位科学家“持续奋斗”。8 月 17 日，中修头目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宣称“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要“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躺平’”[③]。不仅如此，为了消灭“躺平”思想，中修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封禁大肆宣扬“躺平”思想的百度贴吧“躺平吧”，在各大网络平台压制一切有关“躺平”的言论，连在淘宝上印有“躺平”言论的 T 恤都全部被下架，其对“躺平”思想的反对可谓到了严防死守的地步了。

拒绝，拒绝，还是拒绝，中修为何翻来覆去反对“躺平”？奋斗，奋斗，还是奋斗，中修为何翻来覆去叫人们奋斗？看上去，中修似乎是对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躺平”思想颇为愤慨，“恨铁不成钢”，好像他们真的是在为小资产阶级的“幸福”考虑，因而激烈反对享乐主义一样。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掩盖他们真实目的的假象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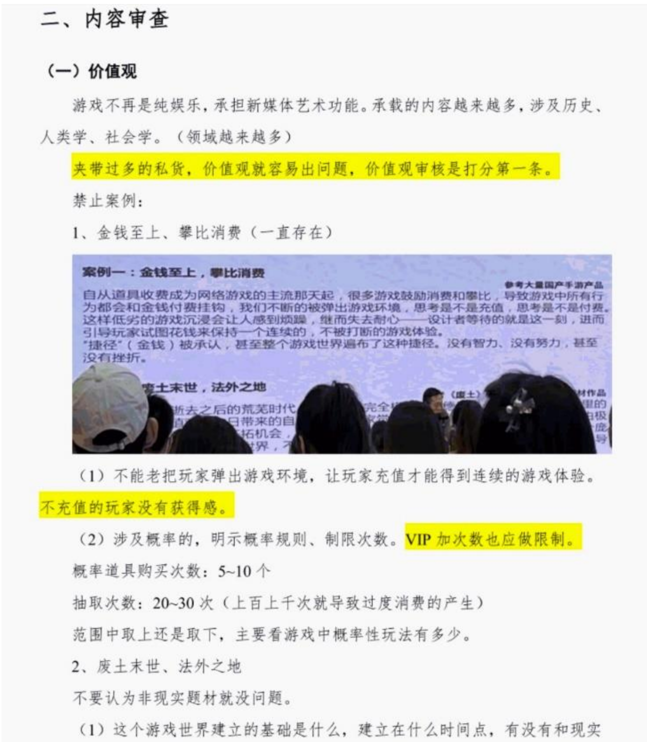


① Young_：《躺平即是正义》，https://mdnice.com/writing/ae0bdc8070cb4dcea901eede3bd93434。
② 新华网：《“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234693286478627。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0/15/c_1127961225.htm。



中修特权阶层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惊人财产

中修难道真的反对享乐主义吗？不，享乐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中修出于他们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是不可能放弃享乐主义思想的，这是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中修叛徒集团自己就早已因极端腐朽堕落的享乐生活而臭名昭著。2016 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曾公布了一份揭露各国统治阶级上层境外隐藏资产的文件，它被称为《巴拿马文件》。在《巴拿马文件》中，至少有 8 位现任或前任中修政治局常委被提及，包括中修头目习近平。至于确有可靠来源，足以证明中修叛徒集团大小头目依靠剥削所得过上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的各色消息更是层出不穷。貌似抨击“躺平”，鼓吹“奋斗”的中修特权阶层自身就是最大的享乐主义者，是最深谙“躺平”之道的。


二、内容审查

（一）价值观

游戏不再是纯娱乐，承担新媒体艺术功能。承载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历史、人类学、社会学。（领域越来越多）

夹带过多的私货，价值观就容易出问题，价值观审核是打分第一条。

禁止案例：

1、金钱至上、攀比消费（一直存在）

（1）不能老把玩家弹出游戏环境，让玩家充值才能得到连续的游戏体验。不充值的玩家没有获得感。

（2）涉及概率的，明示概率规则、制限次数。VIP 加次数也应做限制。

概率道具购买次数：5~10 个

抽取次数：20~30 次（上百上千次就导致过度消费的产生）

范围中取上还是取下，主要看游戏中概率性玩法有多少。

2、废土末世、法外之地

不要认为非现实题材就没问题。

（1）这个游戏世界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建立在什么时间点，有没有和现实

中修自觉利用精神鸦片麻痹人民

不仅如此，中修自己就是各色低级趣味的最大吹鼓手，要借享乐主义来麻痹人民。在一篇对中国政府部门游戏审核人员的培训讲话《网络游戏内容管理培训班开班动员讲话内容整理》中，一位中修头目就供认，“游戏具有鲜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属性，对青少年价值观行成有很大影响”，“要把握好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可以说，中修充分印证了什么叫**“用‘娱乐活动’麻痹人民群众的斗志，早就是剥削阶级的惯用手段。”**①

如果中修实际上并不反对享乐主义，那么他们到底为何要装出这样一副与“躺平”不共戴天的姿态？《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一语道破了“天机”。在文中，中修卖力地叫嚷“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

① 烽火 Flame：《思想斗争指南》。

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躺平，就是暴殄天物，入宝山而空回”[①],把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迷梦列为反对“躺平”的主要理由。原来，中修反对“躺平”的真正理由，是希望小资产阶级摆脱“躺平”的寄生状态，应该追求虚无缥缈的“个人际遇”，加入到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中“尽显其能”，而让中修的一小撮特权阶层能够“按需分配”！这就正如一千八百年前的裴頠一样，将“人知厥（juē）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②]当作了“治道可隆，颂声能举”的治国之道，把儒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统治经奉为圭臬。从裴頠到中修，中国反动派的儒家底色可谓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立场上，中修如裴頠一样，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剥削阶级辩护士，都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反动统治而竭力维护儒家的社会秩序，所以在装模做样，“抨击”享乐主义的问题上总是不谋而合的。裴頠说放肆享乐会“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中修便说“躺平”会“世风日下，伟大复兴无望”；裴頠说“崇有”能让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心服其业”，甘愿一直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中修便说“奋斗”可使小资产阶级为中修的帝国主义争霸“贡献一生”，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恭顺忠实的奴才。中修是站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躺平”当作一种妨害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加以道貌岸然的谴责的，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恶意批评只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能够享乐，不让别人享乐，让别人成为忍欲牺牲的“奋斗”者，他们自己成为最大的“躺平”者。

必须要指出的是，“躺平”思想虽然包含着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沉重压迫的不满，但是它同样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躺平即是正义》中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各种长篇大论更能表明“躺平”的实质：只要掩耳盗铃，闭眼不看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现实，不断维持寄生状态，用享乐主义来麻痹自己的精神，那么让“万物”貌似迁就于他们个人“尺度”的日子就能永远过下去。但是，既然小资产阶级反对压迫的原因只是想贪图寄生、厌恶劳动，想要过上毫无痛苦的享乐主义生活，那么这就毫无合理性可言了，因为他们正是企图用自己的寄生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寄生，用自己的享乐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另一方面，所谓的“躺平”也是躺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对无产阶级来说不但无利，反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③]这些小资产阶级虽然辞去了工作，在家“躺平”，但他们并无能力单纯靠剥削或小生产过活，最终还是要回到工作中，接受资本主义剥削。他们幻想靠“躺平”逃避剥削的结果只是让他们成为了潜伏的相对过剩人口，依然没有挣脱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锁链，甚至还作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帮助资产阶级压低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此外，即使是他们暂时的“躺平”生活，也是需要无产阶级负担的，因为他们既然脱离劳动，失去了收入来源，那么他们每日的消费只能靠他们亲属的劳动来挣得，这只能是让已经陷入贫困的劳动者家庭雪上加霜。可见，“躺平”不是无产阶级该走的路，走着“躺平”道路的小资产阶级也应为自己损人利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马克主义并不支持任何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反对在低级趣味中虚度光阴、道德堕落，肆意“躺平”，认为**“这些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精神鸦片是当代资产阶级腐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最趁手的‘软刀子’，可谓是威力无穷”**[④]，使人远离革命，留恋资本主义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资产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帮凶。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样

---

① 关铭闻：《躺平不可取——建功新时代系列评论之一》，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1-12/27/c_1128204512.htm。

② 裴頠，转引自《全晋书》。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

④ 烽火 Flame：《思想斗争指南》。

认为，不能将这一问题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那些受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因为这种现象得以流行的社会根源正是对**“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的恐惧”**。[①]将小资产阶级定为社会风气败坏的祸首而忽略了真正制造这一切的资产阶级是对现实的颠倒黑白。而马克思主义更加反对的，则是那些将小资产阶级从沉迷淫乐的邪路引向不断“奋斗”的另一条投机邪路的巧伪人。因为正是这些现代的儒教徒在一边大肆享乐，散布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一边指责那些竟想挤入他们“西方极乐世界”，不愿充当他们忠实奴才的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中国蓬勃成长的年青一代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它既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满，又和资本主义联系太深，无法割舍自己的资产阶级旧思想、旧习惯。中国如今的小资产阶级沉迷于各种低级趣味，生活**“被各色各样无聊、空虚、垃圾、反动的低级趣味充斥了”**，对革命几乎毫无作为，**“但是，小资产阶级毕竟不是一个无用的阶级”**。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对中修卫道士的批评正是为了告诉小资产阶级，他们不应听信中修教唆投机的蛊惑，应该意识到在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是“躺平”还是“奋斗”，死抱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放是没有出路的。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存在着向革命和反革命两方不断分化的趋势，有着转向革命一面的可能。从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没有选择，但是既然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已经不再只有灭亡一条路可走。**“小资产阶级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要成为革命的阶级，必须要把自己从道德败坏中解放出来。”**[②]小资产阶级要想获得真正的个人解放，就必须首先经过思想斗争，洗净自己思想上的污泥浊水，转入到无产阶级中间来。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资产阶级若是能洗尽铅华，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同盟军，为中国的革命势力增添一份力量。

①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劝君少骂雅各宾——论雅各宾派的历史地位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1789 年，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它席卷全欧洲、震撼全世界，将法国千余年来顽固的封建制度砸得粉碎。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对旧有封建生产关系清算得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还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则为资产阶级巩固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在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封建贵族、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统治，并对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实施革命恐怖；他们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队，打退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限制大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维持了战时法国经济的运转......法国大革命的高潮——雅各宾专政**“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①“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口号正是出自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之口。雅各宾派曾在这个口号下，为了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过一系列顽强的斗争。没有雅各宾专政这柄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剑，就没有后来的资本主义。

雅各宾派对资本主义事业是忠心耿耿的，它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十分坚决的。因此，一切封建势力都极端仇视雅各宾派，这是丝毫不令人奇怪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可现如今，对雅各宾派的攻击却恰恰来自于他们的那些资产阶级后辈，来自于那些一面对人民进行残酷专政，一面叫嚷着雅各宾专政“残暴”的巧伪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今天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胡说什么雅各宾派对反革命分子实行的革命专政是“滥杀无辜”、是背叛了曾经的“革命同志”，又说什么雅各宾派限制高价的法令“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在他们口中，正是雅各宾派如此“极端”的政策，才使法国的各个阶层群情激愤，最终导致他们的统治被“正义”的热月党人推翻。但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污蔑雅各宾派的种种谰言，都是丝毫经不起推敲的。雅各宾派发展壮大，推行专政，直至垮台的历史证明：从斗争立宪派和保王党，再到斗争吉伦特派及宽赦派，雅各宾派的每一个胜利既是符合人民的要求、又是顺应历史的发展，他们所执行的每一项革命政策都是十分正确且必要的，决不能以雅各宾派的断头台否定上了断头台的雅各宾派。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②的方针，考察雅各宾派的历史，给雅各宾派以公正的评价，从法国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革命经验。

一、雅各宾派的产生，雅各宾派反对立宪派和保王党的斗争

1789 年 7 月 14 日，革命的法国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法国上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③在法国王室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后，到底由哪个阶级、哪个政治集团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政权，就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为了实现本阶级和集团的政治主张和阶级利益，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都在这一时期积极活动，围绕着政权问题与其它阶级、其它政治派别进行了种种激烈的斗争。雅各宾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别。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初期诞生的一个中小资产阶级派别，其成员多为下层资产阶级及

①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毛泽东，转引自《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1967 年第 6 期《红旗》杂志。
③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他们政治上以卢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理论指导，主张以革命手段实行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法国各地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便齐聚巴黎的雅各宾修道院，在此地秘密召开各种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集会。在会上，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建立起以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人为主导的雅各宾俱乐部[②]，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投身法国大革命。



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马拉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时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③]自建立伊始，人数稀少，力量薄弱的雅各宾派就面临着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动摇分子斗争的革命任务。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首先上台的是在一开始实力雄厚，受到王室支持，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立宪派（又称斐扬派）。他们本就没有革命的要求，而且还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掌握政权，便急急忙忙地宣布革命结束，妄图阻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1791 年，由立宪派操控的制宪议会急忙抛出了一部充满妥协性的《1791 年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给国王以极大的权力，用纳税额卡住投票权，将广大的法国人民一概打为没有投票权的“消极公民”。这部宪法的出笼，标志着立宪派已经背叛革命，与封建地主阶级合流，滚到反革命的一边了。

而对这部没有给予广大人民任何权利、甚至将工商业资产阶级也排除在外的反动宪法，雅各宾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罗伯斯庇尔曾愤怒地指出：“如果国王给自己的祖国招致内乱和外患的一切惨祸，如果他率领叛乱者和外国人组成的军队，想要蹂躏自己的国家，并把全世界的自由和幸福埋葬在它的废墟下，那么他将是不可侵犯的吗？”[④]尽管此时雅各宾派仍然相当幼稚和具有妥协性，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甚至并不准备废除君主制，只要求实现比立宪派的主张更有利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为了反对立宪派独揽政权，雅各宾

---

① 从家庭出身来看，罗伯斯庇尔是出身自没落律师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律师，马拉是出身自教师家庭的小资产阶级医生，圣鞠斯特是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法学生，在经济地位上大多处于清贫状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因而容易接受卢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政治上代表了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② 广义上的雅各宾派在革命初期泛指一切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在立宪派尚未明显表露出其反革命本性，吉伦特派尚未彻底反对革命时，他们也曾在雅各宾俱乐部内活动，也曾被称为“雅各宾派”。狭义上的雅各宾派则仅指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俱乐部内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当时被称为“山岳派”，以与雅各宾俱乐部内部的其它政治派别相区分。为了便于理解，全文各处的“雅各宾派”均指山岳派，而立宪派、吉伦特派则一律称之为“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此后在雅各宾派内部分化出的宽赦派和埃贝尔派同理。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 年。

④ 罗伯斯庇尔：转引自《罗伯斯庇尔》，《世界史话（近现代部分）》，《青年自学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派与其时还支持革命的吉伦特派，以及巴黎的无产者——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与立宪派展开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

在立宪派的一味纵容下，保王党分子活动得越发猖狂。时时刻刻梦想着复辟君主专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以还端坐在王位上的路易十六为总代表，开始在革命队伍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派结成联盟。早在革命初期，路易十六就与立宪派将领拉法耶特暗通款曲，宣称他对拉法耶特“保持绝对的信任”。拉法耶特也“投桃报李”，极力在各种场合袒护国王，甚至将大臣的任免权全部交与国王后，还要每年批给他个人 2500 万里弗尔的王室费，待遇极为优厚。



立宪派头目拉法耶特

不过，贼心不死的路易十六却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受制于第三等级的虚君，他企图逃往国外，投靠欧洲封建君主势力，借助欧洲反动君主的军队，用刺刀复辟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专制王朝。尽管他的出逃最终失败，但仍然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极度愤怒，他们聚集在巴黎的马尔斯校场，要求废除君主制。此时，立宪派将领拉法耶特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血腥镇压了这次和平示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尔斯校场惨案”。这说明立宪派早已和封建地主是一丘之貉，都是妄图扼杀革命的反动派，是**“大革命事业的真正叛徒”。**[①] 此时的雅各宾派仍然是妥协的，他们虽一度主张参与请愿，最后却中途退出了。但也正是这次事件使雅各宾派认识到，立宪派是革命的凶恶敌人，为了将革命向前推进，夺取被立宪派把持的国家政权，他们唯有与立宪派斗争到底，别无他路。

出逃和惨案过后，立宪派迫于人民的压力，以裁定他叛逃无罪为代价换取他签署了《1791 年宪法》，路易十六仍不失法王之位。然而路易十六和他背后的地主阶级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改换手法，要变本加厉地策划反革命复辟阴谋。路易十六利用宪法授予他的一票否决权屡屡否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法案，却别有用心地主动提出了要对外“输出革命”，让新生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动对外战争，与全欧洲君主国为敌的提案，还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吉伦特派提出的相关法案，妄图借欧洲反动军队的屠刀残杀革命力量，颠覆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在君主国刺刀的保护下重掌实权。与此同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在信中得意地写道：“一群傻瓜，他们看不出来这是在为我们服务”，翘首以待封建制度的复辟。在此之后，她更是充当了欧洲反动君主的超级间谍，可耻地向奥地利军队出卖情报。法国王室已然成为了法国革命政权的最大内奸。



法国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暴君路易十六

为了揭露法国王室的罪恶阴谋，反对把革命“输出”到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建立所谓“姊妹共和国”、“共和国圈”的反动主张，让法国大革命不被这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葬送，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接连发表讲话，抨击法国王室和吉伦特派的荒唐言论，宣扬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对外实行

① 列宁：《解放派和新火星派，保皇派和吉伦特派》，《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民族自决，不用暴力来强迫外国接受“革命”，对内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革命思想。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罗伯斯庇尔慷慨陈词，发表了名为《论宫廷的战争阴谋》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痛斥法国王室妄图利用战争来使外国干涉军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罪恶阴谋，指出这场战争“是法兰西革命的敌人反对法兰西革命的战争”，“目前不应当宣战，首先必须毫不松懈地让各地制造武器，必须武装国民自卫军……必须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必须惩处有罪的大臣和坚持镇压煽动叛乱的教士……战争应当从起诉叛乱者和查封他们的财产开始”。[①]此后，他在《“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中也认为法国此时盲目发动对外战争只会遭到各民族的反对，使自身处于遭到内外反革命敌人夹击和全欧洲人民反对的孤立境地：“没有人喜欢武装的传教士，自然和明智的第一个劝告是把他们当作敌人赶出去……这些地区（指外国）的人民群众懂得这些事件（指法国大革命），却并不懂得我们的宪法”，“由政府发动和领导的对外战争……是一种逆向的运动，这是一种会导致国家死亡的变动。这样的战争……预示着将使带来种种侵害的自由的敌人得以顺利地发难”。[②]虽然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派的正确主张在当时由于遭到了资产阶级大多数派别和王室的反对而未能得到采纳，但这充分表明了雅各宾派在当时作为资产阶级进步派别的革命性。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雅各宾派的先见之明。在对欧洲君主国宣战后，由于内部叛徒的出卖和法国军队依旧实行革命前腐朽落后的旧制度，法国在战场上一败涂地，欧洲反法同盟的反动军队长驱直入、进抵巴黎。1792 年 5 月 25 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发布《布伦瑞克宣言》，叫嚣：若是法国人民胆敢伤害法国王室，巴黎将遭到血洗。反革命势力一时间喧嚣尘上，法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着被内外反革命分子武装颠覆的严重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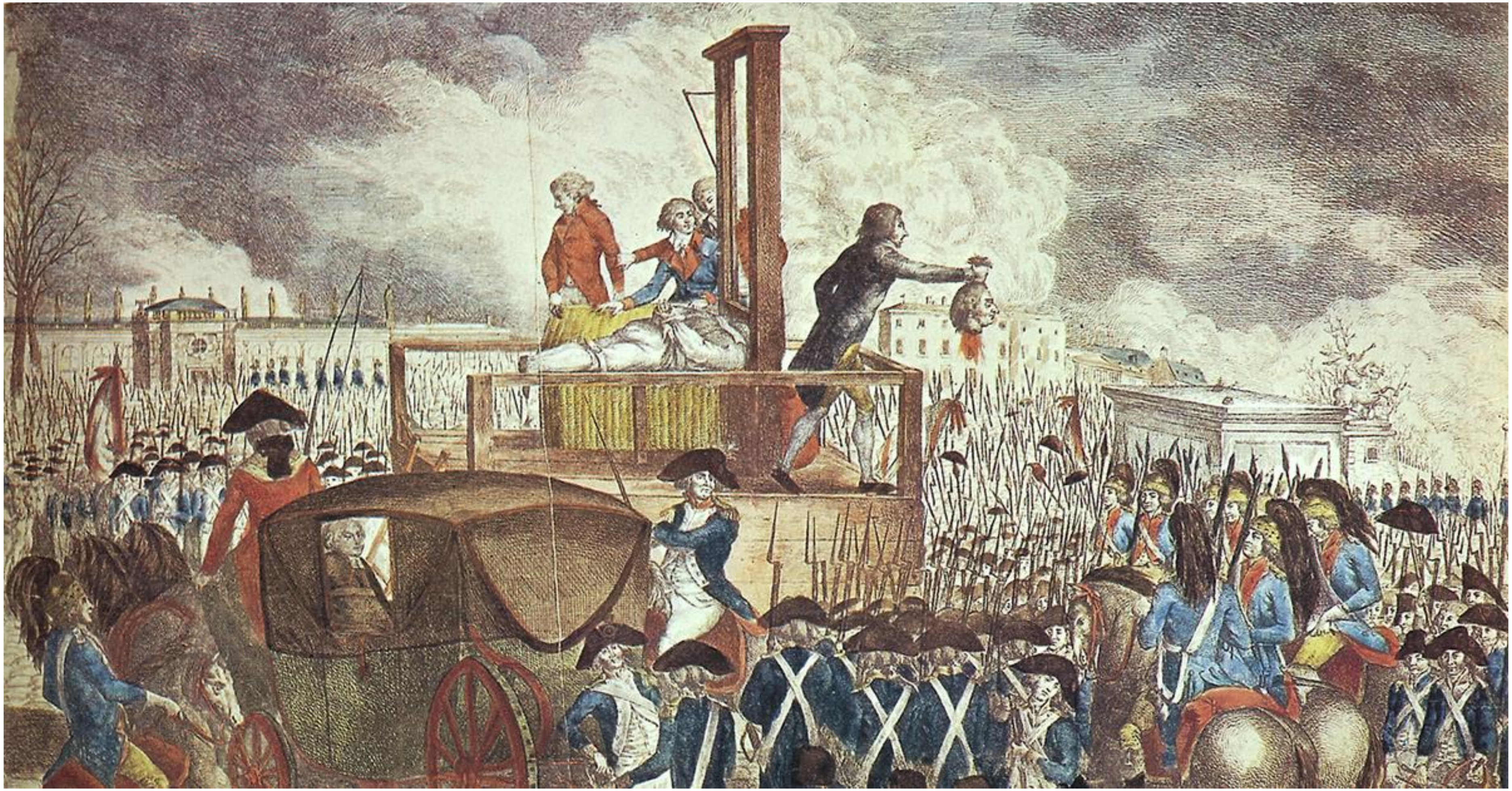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立宪派却毫无作为，负责指挥军队的前线总司令拉法耶特甚至不顾战况、弃军而逃，亲自返回巴黎发表恶毒攻击雅各宾派的演讲，叫嚣要解散雅各宾派俱乐部，镇压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革命者，甚至企图借国民自卫军发动武装政变，用反革命暴力维持反动统治。但是，人民是要革命的，在法国人民满腔怒火的斗争下，他的反革命阴谋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粉碎：受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自卫军士兵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王室等保王党分子迫于人民压力作壁上观，拒绝与他联合；他的演说则迎来了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激烈反对。最后，走投无路的拉法耶特竟仓皇出逃、狼狈投敌，朝奥地利方向逃窜，成为了赤裸裸的革命叛徒，最后落得一个在普鲁士境内锒铛入狱的可耻下场。立宪派对内镇压革命，对外投降叛变的反革命立场已经暴露无遗。

与立宪派相反，雅各宾派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主张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指出“只有打击拉法耶特，法国才能得救”，要求废除君主制、推行共和制。他们顶住了立宪派施加的强大压力，于 1792 年 8 月 10 日联合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巴黎民众发动起义，推翻了立宪派的统治，逮捕了路易十六等王室成员和立宪派分子，在事实上废除了君主政体。9 月 21 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召开，吉伦特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并上台，正式接管了此前由立宪派控制的政权。1793 年 1 月，吉伦特派控制的国民公会在人民群众的愤怒要求下，被迫同意雅各宾派要求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的提案。至此，立宪派和他们的政治盟友保王党垮台，雅各宾派反对立宪派和保王党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依靠人民的支持扩大了自身在革命政权内的权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然而，如今的资产阶级却一方面大肆攻击雅各宾派处死路易十六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又将路易十六这个叛国贼美化成“心系人民”、“温良仁善”的好国王，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反革命的政治本质。对此，罗伯斯庇尔曾说：“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③]。为了发展

① 罗伯斯庇尔：《论宫廷的战争阴谋》。
② 罗伯斯庇尔：《“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
③ 罗伯斯庇尔：《“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和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雅各宾派和保王党、立宪派之间没有任何妥协余地。雅各宾派从支持君主立宪到支持共和的转变，是阶级斗争浪潮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这正好说明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抽象的“暴政”。雅各宾派对立宪派和保王党实施的革命暴力，绝不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所污蔑的“暴政”，而只是顺应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这样的暴力是必要和正义的。



1793 年 1 月 21 日，地主、内奸、两面派、卖国贼、暴君路易十六在法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被处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二、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雅各宾专政的建立

取代立宪派而上台的是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与封建制度有着很深的矛盾——封建行会、专利公司、关卡林立和度量衡不统一等，都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曾经参与过民主共和运动，但是，他们由于背着极为沉重的私有财产包袱，便在革命中顾虑重重，特别是害怕群众运动危及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他们对于把革命推向前进往往是动摇的，对于封建反动势力往往是妥协的。在吉伦特派取得政权后，这种动摇性和妥协性更是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性。在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后，广大的法国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要求彻底摧毁千余年来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为了防止封建制度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实现复辟、为了更加彻底地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中小资产阶级也要求推动革命更进一步。他们势单力薄，无力单独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抗，故而在与二者的斗争中往往向人民寻求支持。然而，对于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来说，王政既已废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也被扫清，那么就应该“到站下车”了。为了使革命就此结束，吉伦特派甚至否认旧制度的复辟是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惜与保王党分子勾结，将矛头转向坚持革命的人民群众和雅各宾派，事实上成为了封建势力在革命队伍中的代理人，成为了投降派。就这样，雅各宾派与人民继续联盟，吉伦特派则与保王党等各色反革命势力同流合污，围绕着是继续革命还是倒退复辟的核心问题，两个营垒在各条战线上爆发了尖锐斗争。



吉伦特派头目——布里索、让-马里·罗兰、玛丽-简·罗兰

在如何处置通敌叛国的国王的问题上，吉伦特派为了防止革命走向“过激”，与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死保路易十六，主张将其“留待战后处置”，而革命的雅各宾派和人民群众则要求立即审判并处决国王，以进一步打击反革命气焰并巩固革命成果。吉伦特派千方百计地拖延对路易十六的调查和审判，甚至援引《1791 年宪法》中关于国王的人身“不可侵犯权”的条令，反对将其处决。只是到后来，在杜伊勒里宫铁柜中发现的通敌密信彻底暴露了路易十六的叛国面目——铁证如山！在人民的滔天怒火下，吉伦特派再也无力辩驳，只得顺应雅各宾派和群众要求，将路易十六处以死刑。

吉伦特派还纵容保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政策是旺代保王党叛乱爆发的重要原因。1792 年 12 月，吉伦特派颁布法令废止粮食统制，此后物价飞涨。次年 2 月，指券①贬值 50%。劳动者工资与生活开支的差距日增，他们在全国各地不断掀起骚动。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下，地主纷纷转向保王党，希望借助王政维持对土地的占有。1793 年，吉伦特派颁布的三十万征兵令成为了叛乱的导火索。西部农民本饱受封建压迫之苦，起先也曾

① 指券是法国大革命时由政府颁发的纸币。

对革命表示拥护。但是，吉伦特派不仅没有满足他们对于土地的要求，反而带来了高昂的物价；不仅没有废除“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划分而给他们以政治权利，反而废除了历史悠久的村民大会。本就遭到吉伦特派以应对战争为名盘剥的他们，如今又要被强制征兵入伍。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对革命的不满，使他们易于受到反动宣传的蛊惑。3 月，保王党分子在西部的旺代省及周边地区组织“天主教王军”，利用反征兵口号煽动农民发动叛乱，一路攻城拔寨，猖狂一时。然而吉伦特派不以为意，只派遣少数军队前往镇压。这些军队的将领往往消极怠战或根本不会作战，致使整个旺代地区只剩下两个城镇为共和政府所掌握。当时，唯有雅各宾派坚持对叛乱进行严厉镇压。3 月 19 日，国民公会根据雅各宾派的主张通过法令，规定凡属携带武器的叛徒一律处死。雅各宾派上台后，此次叛乱终于在强力镇压下被平定下去。

在经济上，吉伦特派实行的政策仅限于清除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阻碍，他们极力保护投机利益和私有财产，对群众处境的改善并不在乎，迟迟不肯颁布为城市贫民和劳动农民所强烈要求的限价法令和土地法令。在连年的内外战争中，法国工商业遭到极大破坏，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却趁机大做起投机买卖。吉伦特派成为了投机商的保护人，不愿对物价进行任何干涉。为弥补战争造成的巨额军费开支①，吉伦特派滥发纸币、制造通货膨胀。一时纸币暴跌，农民不愿出售粮食，全国到处发生粮荒，客观条件对投机特别有利。在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下，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富裕农民藏匿粮食，物价腾贵、工业衰落，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城市贫民不堪其苦。群众运动由是高涨，城市居民强购商品、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政府实行限价。在反投机运动中，出现了革命期间最激进的派别——忿激派，它代表城市最贫苦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实行商品最高限价。雅各宾派最初并不同意忿激派的主张，但为了在与吉伦特派的斗争中取得群众支持，它和后者逐渐接近。1793 年 5 月 4 日，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民公会第一次通过了粮食限价法令。这一法令使得雅各宾派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土地问题上，吉伦特派代表富农利益，甚至为了保障私有财产竟也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愿对土地进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分配。在立宪派统治被推翻后，吉伦特派为在新选举中骗取农民支持，曾假意表示同情农民，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令。然而，即便是在这些法令中，对封建生产关系的铲除也极不彻底：仅仅次要的封建税金和对教会的负担遭到废除，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地租、代役租等——仍需农民赎回。关于没收逃亡贵族和王室土地，并将其分成小块向农民出卖或租佃的法令，后来被吉伦特派借口“调查不足”而取消；分配公社公有土地的法令也未见实行。这两条法令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才得以实现。此外，雅各宾派还宣布无偿取消一切封建义务，下令焚毁一切封建契约并禁止私藏。在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下，数十万无地、少地农民以低价取得了土地，他们成为了拥护革命、保卫祖国的生力军。

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吉伦特派始终希望通过战争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海外掠取市场和土地。1791 年 8 月，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支持路易十六，外国干涉战争的威胁愈发临近。路易十六心怀鬼胎，秘密策划着“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的阴谋。此时，雅各宾派正确地指出，法国和革命的危险主要来自国内的封建势力，要求首先肃清内部敌人，“真正的科布伦茨②在法国”。③而吉伦特派不仅不支持雅各宾派的主张，反而与路易十六苟合。1792 年 4 月 20 日，法国向普、奥宣战，战争还是爆发了。

当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雅各宾派便力图使它转变为保卫法国革命成果、支援欧洲革命力

① 1792 年 12 月，国库收入仅三千九百万里弗尔，而支出中仅战费一项即需二亿二千八百万里弗尔。

② 科布伦茨是德国一座位于德法边境的城市，法国的流亡贵族在逃窜出国后大多涌向此处，于此地策划阴谋，妄图组建复辟势力，借助外国干涉军的力量实现法国的封建复辟，重新建立以法国王室为专制统治者的法国旧制度。“科布伦茨”一词在当时已成为地主阶级反革命巢穴的代名词。

③ 罗伯斯庇尔：《“真正的科布伦茨在法国”》。

量的战争，而吉伦特派则将其视为转移或掩盖他们的反动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手段。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主张，要将法国边界扩张到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而另一个吉伦特派分子罗兰供认：“我们一定要使我国成千成万的军队前进，进到他们两足所能及之处。否则，他们一返国就会致我们于死命。”吉伦特派发动了战争，却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本已解放的尼德兰地区陷于敌手，南部的重要港口土伦也被英军占领。就在此等危机时刻，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率军叛变，同干涉军一道进攻共和国，可见吉伦特派的“战功赫赫”。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本就是一个妄图在革命中趁机攫取独裁权力的野心家，早在 1791 年，他就殷勤地在多封密函中就如何制止革命向路易十六建言献策。在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他又转而拥立奥尔良公爵，密谋借助奥国力量复辟君主立宪制。雅各宾派对他早已不信任，雅各宾派领袖马拉公开将其称为叛贼，但吉伦特派却仍对他赞赏有佳，极尽奉承献媚之能。在部队中，迪穆里埃保护军需承包人，他所属的士兵衣服、饮食都很坏，大量义勇军归国，剩下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旧军队士兵。他们纪律很差，常常从事劫掠，战斗力可想而知。在对荷兰的进攻中，迪穆里埃因分散本已不多的兵力而遭到惨败。为此，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其撤职，派出一名将领携三名特派员取代他的位置。不料，迪穆里埃竟将四人拘留，甚至把他们交付敌人。之后，他更是于 1793 年 3 月妄图煽动军队调转枪口进攻巴黎，以恢复君主立宪制并释放王后。然而，广大官兵依然拥护革命，在这一企图遭到挫败后，迪穆里埃率部千余仓皇逃往奥国，彻底沦为可耻的卖国贼。这样一个革命叛徒能够长期保有军队的统帅权，吉伦特派“功不可没”，他们早已成为了迪穆里埃一类的靠山和后台。迪穆里埃的叛变阴谋早有端倪，而吉伦特派却死命保留他的职位，致使其活动愈加公开和猖獗起来。到雅各宾派上台时，各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军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并占领了法国的大片领土。只是雅各宾派颁布的土地法令，才激发了农民参与军队、保卫祖国的爱国热情。他们在短期内组成一支四十二万人的大军，终于在 1794 年 7 月将所有外国干涉军赶出法国。



雅各宾专政与“革命恐怖”

在吉伦特派实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下，1793 年初，旺代的保王党叛乱和反法同盟已经从内外将革命政权包围，革命形势极为不利。然而，吉伦特派非但不能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4 月，吉伦特派诬告雅各宾派领袖马拉，把他送上法庭。在马拉受审的途中，巴黎人民、革命市政府和外省的雅各宾俱乐部支部纷纷出面为他示威声援。由于群众的斗争支持，马拉最终被判无罪。吉伦特派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提升了雅各宾派在群众中的声望。5 月 18 日，吉伦特派又组织反动的“十二人委员会”，妄图取缔作为雅各宾派主要营垒的巴黎革命市政府——巴黎公社。24 日，吉伦特派下令逮捕雅各宾派领袖、巴黎市政府副检察长埃贝尔。可见，吉伦特派此时已经完全沦为了革命的敌人和阻碍，不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革命就有被扑灭的危险。愤怒的巴黎人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组织起一支八万人的武装队伍，于 5 月 31 日—6 月 2 日发动起义。在起义中，雅各宾派联合忿激派，发挥了领导作用。29 名吉伦特派反动议员被逮捕，政权转入雅各宾派手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此上升到最高阶段。



马拉之死

但是，起义并没有完全消灭吉伦特派的力量，许多吉伦特派议员逃走。在外省，由于原有的市政府得到保留，吉伦特派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四处挑起叛乱，妄图使各省“独立”，组织对抗雅各宾专政的“联邦政府”，甚至不惜与保王党勾结。6月中旬，全法国83个省中有60个发生叛乱。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雅各宾派革命政权遭到颠覆，雅各宾俱乐部也被捣毁，八百余名成员被杀。在马赛、南特和波尔多等商业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吉伦特派与旧贵族合作，他们窃据市政，驱逐国民公会的特派员，设立反革命法院对雅各宾派大加迫害。7月，为阻止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吉伦特派丧心病狂，竟使出卑鄙的暗杀手段，派出刺客夏洛蒂·科黛将马拉公然刺死在其家中，反动势力一时猖狂到了极点。大敌当前，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知道，他们必须联合人民。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布土地法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革命期间最激进的《1793年宪法》，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规定实行普选制；通过全面限价法，制止通货膨胀，建立征用粮食的“革命军”；派出雅各宾派成员担任各地军队特派员，确保军队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政权手中；加强革命恐怖，严厉镇压投机商和反革命分子。革命恐怖是雅各宾派对当时反革命分子的革命专政，它是雅各宾派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推行的。后来的地主资产阶级为攻击革命，污蔑革命为“暴政”，纷纷对“革命恐怖”大加攻击，好似这样的革命专政一无是处，仅仅带来了“悲剧”一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①如果没有这种恐怖，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胜利，也就没有这之后对法国封建制度更加彻底的扫荡了。在实行了雅各宾专政后，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了镇压，暂时无力再反对革命政府，法国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得到了承认，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而爆发了强烈的革命热情；法国工人在雅各宾专政中惩处了那些罪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部分稳定了物价，并获得了政治上更多的自由，并得到了法国将要实行资产阶级范围内最民主的宪法——《1793年宪法》的承诺，他们为了保卫并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应得权益而纷纷拥护革命，誓要粉碎一切想要把他们重新拉入封建制度深渊的复辟势力。马赛、里昂、旺代的叛乱终于先后在8—12月间得到平定，法国境内的各国干涉军在雅各宾专政结束时都基本被赶出国外，法军甚至还乘胜追击到了比利时，在当地建立了革命统治。革命的成果保留下来了，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了。

三、雅各宾派反对宽赦派的斗争，雅各宾专政的继续和发展

雅各宾派虽已在1793年6月夺取了最高政治权力，但它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却从未停止。在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政策下，王后与吉伦特派头目先后在10月间被送上断头台，反革命气焰遭到沉重打击。彼时彼刻，依然流窜于社会各界的反革命分子眼见公开的对抗已然不再可能，便转而采取更加隐蔽、阴险的分化政策——收买雅各宾派中的动摇分子，以挑动雅各宾派内部的分裂。因此，以丹东为代表、主张同大资产阶级媾和的宽赦派就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

①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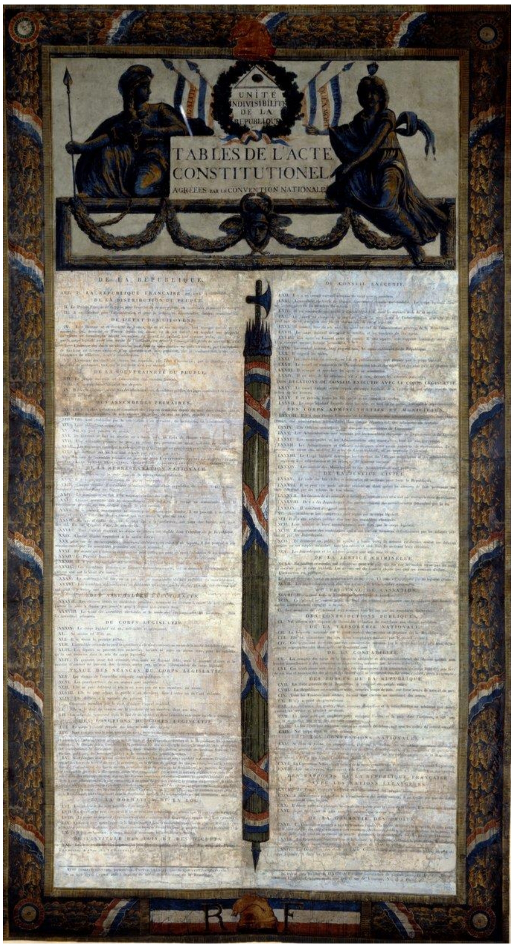


“腐化堕落的偶像”——丹东

宽赦派是雅各宾派中的右翼，他们是投机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所希望的不过是保全自身，所渴求的也不过是升官发财，这些大资产阶级往往并无任何立场，只是如同政治娼妓般在各派间摇摆不定，左右逢源。宽赦派的代表就是丹东。丹东原本是和马拉、罗伯斯庇尔齐名的雅各宾派领袖，他在革命初期为革命民主事业做出过一定贡献。他曾支持破坏封建制度，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奔走呼号，热烈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痛击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只有这样共和国才能得救。”然而，在丹东身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立场，“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①。在与吉伦特派的斗争中，他动摇不定，曾试图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呼吁双方“共同对敌”。为此，他还责备马拉“不应因为某些过激的个人而谴责一个省的所有议员”。②丹东更与革命的叛徒和卖国贼迪穆里埃交好，甚至在后者向共和国发动进攻时还试图为其辩护，直到其公开叛国投降后才堪堪作罢。彼时同大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暧昧不清的关系，便已预告了丹东日后叛变革命的罪行。

在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后，丹东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和积累的政治资本大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彻底蜕化变质成了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在革命前，丹东不过是一个背负着数万里弗尔购官欠款的无名律师。而到他临死前，他已拥有巨量产业，财产竟积累至数十万里弗尔。已在经济地位上迈入大资产阶级行列的丹东，在政治思想上也迅速地朝着他们靠拢。他不愿意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主张对内宽赦投机商人和反革命分子，对外同各国干涉军议和。丹东是宽赦派的一个缩影，其中的许多人也同他一样成为了新的大资产阶级并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要不要继续革命，要不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权，要不要镇压革命队伍内部危害革命的宽赦派叛徒？这个问题摆在了雅各宾派面前。一贯坚持“事情如果半途而废，那便等于什么也没做”的雅各宾派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主张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在吉伦特派的统治被推翻后，宽赦派和雅各宾派之间再次爆发了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雅各宾派主张对吉伦特派分子实行严厉的专政，并派遣革命军队镇压反革命叛乱；而宽赦派却对吉伦特派报以温情，使原吉伦特派外交部长勒布伦的职务得以保留。埃贝尔



雅各宾专政的果实——《1793 年宪法》

① 勒瓦瑟尔，转引自马克思：《<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此处指吉伦特省，因为吉伦特派议员多出自于法国的吉伦特省。

派要求与外国干涉军作战到底，以保卫革命的成果和祖国的独立；可宽赦派却主张与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媾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已敏锐地觉察出宽赦派的反革命行径，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在演讲中痛斥丹东及其同党的腐化生活，彻底撕下了宽赦派的宽容假面。宽赦派成员的声望一落千丈，彻底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支持，大资产阶级此时也因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而人人自危，根本无力掩护他们，宽赦派领袖丹东过去所积累的政治资本化为乌有，他在 1793 年 7 月的救国委员会票选中落选，退出了革命的权力中心。

丹东一众虽被开除出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救国委员会，但其反革命活动不仅并未停止，反而因为他们的失势而更加猖狂起来。在发现雅各宾派对外国间谍和国内投机分子的调查会对他们产生威胁时，宽赦派就公然站到台前，向雅各宾专政发起最疯狂的进攻：他们把雅各宾革命专政下的法国说成是“告密者飞黄腾达的天堂”、“法官与原告的屠杀场”，将罗伯斯庇尔说成“多疑的暴君”，称他“迫害天才、迫害有产者、迫害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借口所谓“爱惜人类的鲜血”，要求彻底停止实行革命恐怖，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他们主张取消限价法令，实现“商业自由”；他们对被投入监狱的卖国贼与投机分子暗中襄助，甚至帮助英国奸细的银行启封，并助其逃出法国。反动势力看似疯狂到了顶点，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宽赦派的政策与劳动人民的要求根本相悖，他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即使制造了如此多的反革命舆论，却无法对雅各宾派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于是很快便遭到雅各宾派的清算。1794 年 4 月，丹东、德穆兰等宽赦派被处以死刑，“腐化堕落的偶像”们最终以一副滑稽的面貌退出了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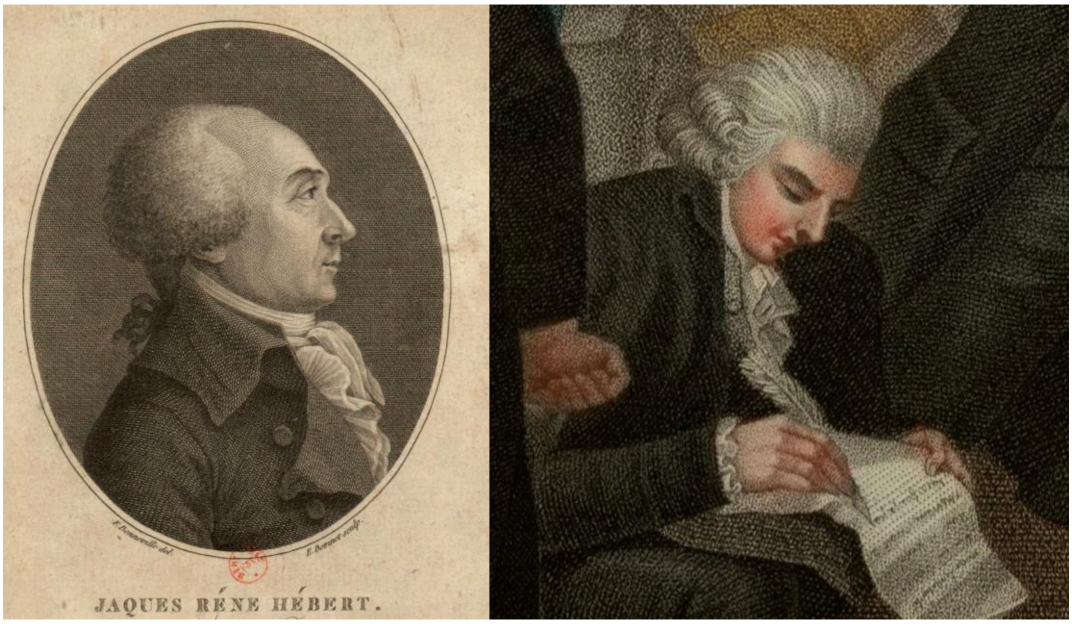
宽赦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在形成之时，就已经从革命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了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高喊着所谓“宽赦”的美妙字眼，实际上企图篡夺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复辟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早已沦为了革命的叛徒。因此，雅各宾派将丹东等人送上断头台，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所谓争权夺利的“同室操戈”，而是维护革命政权的必要举措，在客观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

四、雅各宾专政的垮台，批判反动的“杀人太多论”

尽管雅各宾派曾与人民结成同盟，且与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派、宽赦派等进行过不懈的斗争，但是雅各宾派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它与人民在阶级立场上是有着根本对立的。虽然他们反对封建主和大资产阶级，但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削弱和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要求的达成，他们也不愿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雅各宾派害怕人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破坏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秩序。**“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①因此，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雅各宾派最终也将资产阶级专政的矛头指向了曾经的同盟者——劳动人民。在雅各宾派掌权后，虽然他们颁布了一些如嫌疑人法和最高限价法等法令，以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劳动人民利益，但这些不过是他们维持与无套裤汉同盟的临时性手段，目的是防止反革命分子夺走他们尚不稳固的政权。他们希望利用人民的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又不希望人民的革命运动超出自己的掌控，更不希望人民执掌政权。为此，他们制定了许多限制人民权利、镇压人民活动的狭窄框框。雅各宾派保留了立宪派在 1791 年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列·霞白利法》，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雅各宾派的最高限价法虽然规定了最高物价，但同时又规定了最高工资，也没有对最低工资的规定，资产阶级仍得以随意降低工人工资。雅各宾派还镇压了其他主张更加激进的派别。忿激派不满于雅各宾派政策的不彻底性，要求逮捕囤积硬币和制造饥饿的银行家、没收革命期间暴发户的财产、免去军中贵族和富人的职位、全部开除国民公会内部的吉伦特派分子、立刻实行新宪法。对于雅各宾派颁布的《1793 年宪法》本身，忿激派也看透了它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因为它仅仅只是抽象地规定了人与人在政治上的形式平等，却从未对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实际的不平等作出过任何限制。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曾满怀愤怒地对《1793 年宪法》控诉道：“在宪法的哪一章中，我们能找到对于囤积投机的谴责？假如人们中间还有一个阶级能迫使另一个阶级陷于饥饿，那末，这是什么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其垄断而享有生杀予夺之权时，那么这是什么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国——在今天只不过是空话罢了。”[①]雅各宾主义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不论如何地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革命的作用，但归根到底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它是与人民根本对立的。



埃贝尔与雅克·鲁

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雅各宾派也充分暴露出了自己身为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一面。面对忿激派的革命主张，雅各宾派不仅不愿满足这些要求，反而还于 1793 年 9 月逮捕忿激派的领袖雅克·鲁及其战友，并将他们交付审判。在忿激派被镇压后，雅各宾派更是向埃贝尔派举起了屠刀。埃贝尔派是雅各宾派内部的左翼，他们主张废除基督教、扩大打击投机的范围、对财产征收累进税、取缔高利贷、将革命公敌的土地交给贫民、将逃亡业主的工厂收归国有、继续革命战争，并准备发动新的起义。1794 年 3 月，罗伯斯庇尔把埃贝尔、肖梅特等左派领袖送上断头台，从此公开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此后，雅各宾派更是在镇压劳动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放松了对粮食供应和生活必需品的管制，甚至容忍各种违反最高限价法的行为，放弃了经济上对投机商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取缔了巴黎地区其他有组织的人民俱乐部，企图“定于一尊”，使无套裤汉从此噤声；他们还撤销了先前设置的“革命军”组织和“反囤积专员”职位，将无套裤汉从政府中一脚踢开。雅各宾派背离革命的行为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们看到深受自己信赖的领袖纷纷遭到政府镇压，而同时自己的生活也并无改善，不愿意再信任和支持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割断了自己与人民的联系，使专政丧失了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他们从真老虎变成了纸老虎。

经过对宽赦派和埃贝尔派的镇压，雅各宾派似乎消灭了一切对自身统治的威胁。然而，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大资产阶级还在继续暗中搜罗力量，在各个阴暗的角落中密谋推翻雅各宾专政。就连雅各宾派本身也对此有所察觉。为了巩固雅各宾专政，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镇压提出要废除基督教，反对一切宗教的埃贝尔派，深感自己统治基础薄弱的罗伯斯庇尔把宗教迷信当作救命稻草——1794 年 6 月 8 日，罗伯斯庇尔竟荒唐地炮制了所谓的“最高主宰崇拜”，话里话外地把自己说成是所谓“最高主宰”的化身，把资产阶级专政美

① 雅克·鲁，转引自周一良：《世界通史 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 年。

化为绝对合乎所谓“美德”的统治，企图依靠迷信的方式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加强雅各宾派的政治力量。但是，当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开始镇压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时候，他和他的雅各宾派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没有人民的支持，所谓的“最高主宰”不过是空洞的，虚幻的神灵，一点都无法为雅各宾派带来任何现实的力量，它并不能掩盖雅各宾派在政权中力量薄弱的事实，以及他们处于被大资产阶级、保王党和人民共同反对的孤立境地。雅各宾派无论如何是无法依靠一群资本单薄、思想软弱、人数稀少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圣鞠斯特、库东、小罗伯斯庇尔（即罗伯斯庇尔之弟）等——与资本雄厚、反革命意志坚定、党羽众多的大资产阶级抗衡的。因此，他们不但没有能力阻止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组建反动的热月阴谋集团，而且就算在察觉到密谋推翻他们统治的阴谋后也几乎毫无办法，只得不断作徒劳的挣扎，麻木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反革命政变。



热月党头目——富歇、西哀士、塔列朗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资产阶级来说，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专政仅仅是他们在法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被彻底颠覆的危险时所采用的一种非常措施。当法国解除了国内外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 7 月 27 日垮了台。”**[①]1794 年 7 月 26 日即热月 8 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中已经出现了阴谋集团。然而，此时的雅各宾派却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来识别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他们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如圣鞠斯特，甚至主张加强“团结”，向大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次的演讲不但没有对大资产阶级形成威慑，反而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尽快发动政变，以快打慢，试图在雅各宾派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之前，将他们眼中的“暴君”“一举粉碎”。7 月 27 日，即热月 9 日，就在罗伯斯庇尔发表最后一篇演讲的第二天，反革命势力就在国民公会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打断了当时圣鞠斯特的发言，在混乱中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小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袖逮捕，发动了使大资产阶级上台篡夺政权的热月反革命政变。当晚，巴黎市政府和雅各宾俱乐部派兵营救，将罗伯斯庇尔一行救出。然而，大势已去，此时巴黎的 48 个区中仅有 13 个出兵拥护雅各宾派，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完全丧失了所有信心，既感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没有力量，无法在反革命阴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因为自己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本性，不能和不愿借助人民的力量来挫败热月党人的阴谋，夺回被夺走的政权。最终，他选择了束手就擒，放弃一切反抗，无力地哀叹道：“强盗得志，共和完了！”28 日，反动军队再次逮捕了他们，并于下午将他们送上断头台，雅各宾专政就此终结。

雅各宾派统治的垮台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必然性。雅各宾派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一方面

①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89 年 12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

力量弱小，需要借助劳动人民的力量对抗封建旧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作为剥削阶级，他们与劳动人民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这样的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既不甘心使反动势力梦寐以求的旧制度复辟，又不可能坚定地与劳动人民一道反对大资产阶级，于是只能利用二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为自己的掌权开辟道路。然而，随着自身目标的逐步实现，他们与人民的联盟便走向破裂，他们的政权也因此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力面对大资产阶级的进攻，只得束手就擒。



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领袖被押往断头台处决。

但是，资产阶级学者们却将雅各宾派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其“极端”政策和“屠杀”了太多“无辜者”，以至最终被“代表人民利益”的热月党人推翻，但事实并非如此。雅各宾派的政策看似极端，但实际上只是针对反革命分子而实施的革命恐怖，法国大革命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大半归功于这样“极端”的政策。而致使雅各宾派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是什么杀人太多，而恰恰是没有彻底地实施革命恐怖。一方面，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不够坚决，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恐怖加之于人民。在他们手上，恐怖从保卫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①。雅各宾派未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彻底镇压，反而给热月党人等反革命分子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而对于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和埃贝尔派，他们却果断镇压，致使他们几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看似威风凛凛的革命统治，实际上变成了空架子，最终被热月党人轻而易举地推翻。

资产阶级学者所谓“杀人太多”导致雅各宾派最终失败的言论，完全是重弹宽赦派的老调。资产阶级所谓反对暴力，实际上反对的只是革命的暴力，而对于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始终是认同的。他们批评雅各宾派对反革命“不行仁政”，却对立宪派屠杀抗议群众、热月党人镇压牧月起义的暴行闭口不谈，极尽美化之能事。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暴力是假，反对革命是真！

五、雅各宾派的历史地位，正确评价雅各宾派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保王党与立宪派是革命政权凶恶的敌人，掌权后的吉伦特派和宽赦派则蜕变为了革命政权之中阴险的叛徒，雅各宾派对他们的专政，无疑是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的，是符合革命利益的。雅各宾派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专政非但不是“暴政”和“屠杀”，而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必要的革命恐怖。即使在专政末期，雅各宾派逐渐蜕变为阻碍革命的势力，但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他们的主要方面是推动革命发展的进步派别，奠定了如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今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由雅各宾派确立的，这是对那些“数典忘祖”的资产阶级最大的讽刺。

罗氏虽死魂犹在，正如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一样，雅各宾派虽然消失了，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热月政变后，残余的雅各宾主义者高喊“为罗伯斯庇尔报仇”的口号，尝试重建雅各宾专政；在黑暗的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里，资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9 年 2 月 2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一度举起雅各宾主义的旗帜要求推翻王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直到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列宁还多次赞扬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当效仿雅各宾派，对反动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不仅如此，雅各宾派的革命思想还传播到了国外，引起了西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地震：海地的黑人资产阶级组织起了“黑人雅各宾派”，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了第一个黑人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的雅各宾派曾在雅各宾专政的同时期四处活动，密谋推翻英国封建君主制，一度引起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雅各宾主义为武器，反对英国的民族压迫，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造成了震动；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巴贝夫虽在根本上批判雅各宾派镇压人民的反动的一面，但是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督政府的热月反动时，也曾说道：“恢复罗伯斯庇尔就是恢复民主”，将雅各宾主义当作法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总之，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雅各宾主义一直是民主主义者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的锋芒直指一切封建制度，对此后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反，反动派则是对雅各宾派的革命暴力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早在热月政变刚发生不久，热月党人就开起了谣言公司，为被雅各宾专政镇压的牛鬼蛇神大肆翻案，抹黑雅各宾专政是“暴虐”的“专制”，捏造所谓罗伯斯庇尔密谋与路易十六的女儿联姻，想要成为复辟君主制的“暴君”的无耻谰言[①]；在复辟年代和七月王朝时期，保王党分子还在疯狂鼓吹雅各宾专政是雅各宾派“血腥罪行的样本”；即使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年代，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无所不用其极的资产阶级也悍然将“雅各宾主义”的名头扣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头上，咒骂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借攻击雅各宾专政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国 19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电影中，法国资产阶级依然没有放弃对雅各宾派的污蔑，公然把雅各宾派抹黑为“残暴”的“刽子手”，以服务于其反对暴力革命，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反动宣传；直至今日，中修喉舌《北京青年报》还疯狂攻击雅各宾专政是“血腥专制方式”，“狂热而无情的杀戮”。[②]

这一切激烈的争论足以说明，对雅各宾派的历史评价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到是否坚持革命暴力，是否要求对反动势力实行专政，是否要反对旧制度复辟的问题。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列宁也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不管是考茨基还是当今的中修叛徒集团，都无比激烈地辱骂雅各宾派，就是因为他们要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们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暴力革命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雅各宾派的历史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同样是有着参考价值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所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旧资产阶级革命中是空前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种种革命专政措施，到今天还能够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某些宝贵的历史经验，而雅各宾派坚持

① 热月党人在发动热月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便捏造了所谓的“王室阴谋”，声称罗伯斯庇尔为了当上“暴君”，早已在暗地里与路易十六被囚禁的长女玛丽·特蕾莎订婚，阴谋通过与法国王室公主联姻来继承王位，复辟君主专制制度。随着拿破仑称帝以及之后的波旁王朝复辟，这样可笑的罪名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罗伯斯庇尔被强加的罪名也从阴谋复辟君主制变为了反对复辟君主制，正如所谓的“四人帮”在被中修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后其罪名同样离奇地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为了“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这无疑说明此类罪名只是做贼心虚的反革命阴谋家在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欺骗群众而临时编造的谎言，一旦造谣者自己打算实践他们给对方强加的罪名时，就只得偷偷摸摸地把原来的功绩改为罪行，把原来的罪行改为功绩，然后将颠倒过来的罪名再度强加给对方。

② 北京青年报：《恐怖主义：当从历史长河明辨其踪》，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6/c_128835841.htm。

③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革命的精神，到今天还是有某些教益的。如今的资产阶级正和过去的各色反动派一样，挥舞着反雅各宾主义的破旗反对暴力革命。批判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污蔑，对于将资产阶级鼓吹“行仁政”的虚伪谬论批烂批臭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如今的无产阶级较之过去的一切剥削阶级来说是更加伟大和英明的，无产阶级革命较之任何资产阶级革命来说也是要伟大无数倍的，而如今的时代比起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则更是一个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新世界破土而出的伟大时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吧！

向魔童开战，给人民和平！——彻底批判反动沙文主义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近日，由资产阶级导演杨宇拍摄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关于这部电影的议论铺天盖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点。这部如今被捧上神坛的电影究竟该如何评价，已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那个自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中修叛徒集团，却暴露出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对《哪吒 2》五体投地，极尽吹捧之能事。为了给这部电影摇旗呐喊，中修各色官方喉舌开足马力，把《哪吒 2》吹得天花乱坠，又是“中国文化创新表达的非凡魅力”，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是“全球化时代个体对抗命运的共同叙事”，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哪吒 2》竟然“传递‘爱’‘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俨然将其塑造成全人类、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化身。[①]好一副拜倒在资产阶级文化垃圾面前的丑态！





要闻 > 正文

有贩毒利润而无贩毒风险：对“电子鸦片”应像缉毒打黑一样清剿

2018-06-07 08:44 来源：半月谈网 分享到：

【导语】半月谈记者在北京、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地调研发现，目前危害较大的网络精神毒品主要有邪恶动漫与成瘾性电子游戏等。而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部分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对此，半月谈微信（ID：banyuetan-weixin）连续两天播发有关报道《我们难道穷到靠牺牲心智和精神来赚钱？该打一场“电子鸦片战争”了》《“电子鸦片”终成社会毒瘤：虚拟的世界将会摧毁我们的新生代！》，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反响。

今天我们播发第三篇，敬请大家关注并留言评论。

号称要“清剿电子鸦片”的中修极力吹捧反动影片《哪吒 2》

与中修相反，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批判这部最新出笼的反动电影，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密切配合中修对内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需要的特大毒草！为了调和中国国内如今无比激烈的各种社会矛盾，《哪吒 2》煞费心机地掺入了各种调和主义、中庸之道的孔孟毒素：它教子女爱儒家大家长，教女性爱渣男，教人民爱法西斯政府，教破产小资产阶级爱压迫着他们的国家。最后，它还教唆这些被蒙蔽的被压迫者去跟在中修叛徒集团挥舞着的沙文主义旗帜之下，沦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争霸的可怜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电影，唯有彻底批烂批臭，方能肃清其流毒。

资产阶级反动导演杨宇其人及其早期作品

《哪吒 2》的反动性与其导演杨宇的反动性是密不可分的。杨宇，外号“饺子”，1980 年出身于中国四川泸县一个工人贵族家庭。杨宇的父亲是医院放射科医生，其母则是医院保管室的管理员，都过着少干活、多拿钱、剥削他人的资产阶级生活。[②]在养尊处优的资产阶

---

①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5/0227/c1002-40427360.html。

② 据《泸县志》记载，在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后，泸县的中修政府就开始执行中修在医疗卫生领域推行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路线，企图用高薪和职务评级来收买医务人员。1979 年，在杨宇出生时泸县县政府就已经“对全县中西医务人员进行 4 次全面技术考核”，最后于 1982 年使“全县 304 人晋升，其中晋升医士级 231 人，医师级 59 人，主治医师，所有获职称人员工资均得到相应提高”。杨宇父


反动导演杨宇

级家庭生活中，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杨宇从小便形成了崇尚不劳而获、梦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野心。因此，他以投机资产阶级学业的“奋进与务实”为己任，竭力满足其父母“望子成龙”的资产阶级投机思想，同时也意图在这个过程中收获自己的个人名利。最后，他成功考入了资产阶级高等学府四川大学华西医药学院，并在大学毕业后的 2003 年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至此，杨宇似乎已经实现了自己投机成为资产阶级人上人的迷梦，成为了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

然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却是冷酷无情的，它不以任何资本家主观上的幻想为转移，对于任何个别资本家的投机迷梦绝没有比别的资本家的幻想更多的偏好。因此，在杨宇刚工作后不久，他的父亲突然去世，其本人也于 2004 年从广告公司离职。杨宇在投机的道路上刚刚爬完了一个小山坡，便又很快跌了下去，滚到了其母亲仅仅靠 1000 元退休金维持的小家庭中。由此，杨宇便开始了居家长达三年半，依靠其母亲供养维生的寄生生活。杨宇的家庭一下子便因投机失败而到了破产的边缘。①

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之所以具有力量，不仅仅在于他们经济上的地位，还在于他们能够利用自己在政治上残余的社会关系帮助自己东山再起，还在于他们凭借剥削

亲的放射科医生一职便属医师级，在三级共 304 名医生中都位列前 24%的医师和主治医师群体之中，遑论其余医务人员。同年，“改工资总额 40%补助为实行考评，按完成任务的好坏酌情补助”，用物质刺激的方式来培养医务人员争名夺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扩大脑体差别，不合理地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此后，1980 年经调整人均月工资上升为 49.75 元，1982 年为 63.5 元，1985 年工资改革后“全民所有制”（杨宇父亲所属的泸县人民医院名义上属“全民所有制”。虽然“全民所有制”一般而言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的范畴，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早已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为了与《泸县志》用语保持统一，故暂且使用“全民所有制”一词）医务人员人均月工资为 80.1 元。因此，按最保守的情况估计，杨宇一家月工资也早已超过 100 元，并且这还是建立在不考虑杨宇父亲身为医师级医生，其工资必然高于平均水平这一点的基础之上的。与之相比的是，泸县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平均年工资在 1985 年也才达到 644 元，平均月工资仅 53.7 元。这意味着即使排除较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外更加贫困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以及独立的小生产者，杨宇全家的年平均工资也已较泸县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平均年工资高出 317.2 元，较其平均月工资高出 26.4 元！因此，起码就杨宇出生后的情况而言，杨宇的家庭成分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家庭。

① 根据中修官方对杨宇家庭的采访，杨宇其时已失业在家，其父已死，其母月退休金仅 1000 元，且每月还需将 700 元用于支付房租。在此情况下，杨宇全家便要凭余下的 300 元不仅满足其每月的生活所需，还要额外支出一大笔用于为杨宇购买各种制作动画用的电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开销。因此，杨宇全家是否已经贫困到了只有退休金这一收入来源是非常可疑的。杨宇本人则也在自己的采访和自述的动画制作经历中透露了蛛丝马迹——“尤其是牌的冲锋那段，我用尽了各种方法都没法把消耗的电脑资源降下来，我的内存 768m，只好征用了朋友的高配置电脑，没想到他的电脑都渲染到内存溢出，没法，我只好开着 Maya 的窗口，一帧一帧地手动渲染”（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杨宇专访：三年痴狂为动画原创》，https://www.cafa.com.cn/cn/opinions/interviews/details/541054）、“……我家甚至网线都没牵，我要上网就去朋友家上，这样可以减少娱乐时间，减少社会浮躁气息的影响，还保证了用于动画制作的电脑系统的稳定性”，“我还要感谢我的一帮朋友，他们有的在我制作过程中给我以帮助、鼓励，有的在我作品完成后协助我进行推广，没有他们我会在单人独骑的战斗中倍感寂寞，会在举步维艰的跋涉中更加寸步难行，会在精疲力竭时愈是回天乏力”（litsand：《梦想比面包美好 CG“裸奔者”饺克力弃医从“文”动画路》，https://blog.csdn.net/litsand/article/details/4625844）。杨宇找到的这些“朋友”，恰好都是非富即贵，有条件为杨宇制作动画提供种种便利，帮杨宇克服让他“最刻骨铭心”（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杨宇专访：三年痴狂为动画原创》，https://www.cafa.com.cn/cn/opinions/interviews/details/541054）的技术难题的有产阶级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的人际关系正如文中所分析得那样，是杨宇得以东山再起，复辟资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条件。

阶级几千年来对文化知识的垄断而把思想文化领域变为了自己的独立王国，随时能够凭借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卷土重来。杨宇正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他虽然经济地位上接近破产，但是却依然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高等学府里掌握了被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文化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人还在，心不死，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和资产阶级地位的即将丧失，千方百计地想要恢复并发展他过去朝思暮想的荣华富贵。因此，他一转投机方向，开始尝试制作各种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动画，将复辟自己资产阶级地位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粗制滥造的反动动画能够得到资产阶级赏识上，想要以此来得到资产阶级赏赐的那一点残羹剩饭。

杨宇宛如一条哈巴狗一样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并不是没有结果的。在失业三年后，由杨宇一手组建的反动工作室“饺克力”便于 2008 年炮制出了一部反动的资产阶级动画《打，打个大西瓜》（以下简称《打》）。[①]虽然从表面上看，《打》仅仅是一部粗制滥造，掺杂了大量低俗情节的滑稽剧，然而它的思想内核却正好适应了资产阶级其时的反动需要。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 2008 年，不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急剧地尖锐起来，而且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也随之尖锐起来。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阴影既吓坏了小资产阶级，又吓坏了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种以“反战”为名，宣扬人们可以在以帝国主义战争为代表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独善其身”，钻到一个现实中哪里也找不到的孤岛上充当现代鲁宾逊的资产阶级动画无疑迎合了诸多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各种社会危机惶惶不安的恐惧心理。

必须指出，《打》看似是在宣扬“反战”的和平主义思想，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和平主义绝不是影片想要传达的核心思想。杨宇实际上是在《打》中借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故事来宣扬依靠消极避世来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救世良方”。对此，就连杨宇自己都直言不讳：“这部短片表面上是讲反战的，但这其实还不是最内核的思想。我之所以在片头片尾还有海报上使用了蜘蛛网元素，其实是暗指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上司下属、街坊邻里以及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都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无不受到这些联系的影响，我们往往会身不由己，迷失在这些牵连之中，做出并不是自己愿意的决定。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些感悟、顿悟、超脱，跳出尘网的束缚，没有欲望、没有喜好、没有悲喜、没有成见、没有立场实现思想的裸奔，做一做真正原始的自己。”[②]

① 《打》情节梗概如下：两个虚构的国家黑梅花国和红桃国为了争夺一座小岛而爆发了一场波及海、陆、空的大规模争霸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位黑梅花国的飞行员一次与一位红桃国的飞行员相遇并发生战斗，双方的飞机在战斗中双双失事，两人只得跳伞而生，共同降落在海上的一座无人荒岛上。虽然两人本是敌对关系，但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两人不得不携手合作，共同在荒岛上求生，忘记了彼此过去的仇恨。一天，两人在岛上看到了两国在海上爆发的一场血腥的大规模海战，并由此对战争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要一直躲藏在荒岛上共同生活，逃离战争的念头。因此当第三国黑桃国派遣救援队伍登岛搜寻幸存人员时，两人选择在岛上隐藏起来，躲避黑桃国救援队的搜救，使黑桃国救援队在一无所获后离去，最后在岛上度过了余生。

②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杨宇专访：三年痴狂为动画原创》，https://www.cafa.com.cn/cn/opinions/interviews/details/541054。



宣扬小资产阶级避世思想的《打，打个大西瓜》

也是由于这个，这部动画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就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不仅害怕自己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人死财消这一未来的、抽象的可能，而且更害怕自己在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中陷入破产，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现实的可能（或者已经成为现实但想要极力逃避这一点），因此极其需要这样一种能够自我欺骗的精神鸦片来麻痹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还能在充满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持那种依靠一亩三分地度日的狭隘的小私有者生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也极其需要这样一部麻痹人民革命意识，让他们无法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无法走上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反动作品来阻止革命的爆发，因此也“万分感谢”做出了这样一部反动动画的制作者杨宇。如此说来，杨宇依靠这部动画获得资产阶级扔给他的诸多肉骨头——第 26 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第十二届日本 TBS Digi Con 6 总决赛金奖、CCGF（专业组）最佳动画短片奖——也就毫不奇怪了。

依靠当资产阶级忠犬名利双收的杨宇在尝到了投机甜头后便更加意识到了自己该如何重新回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于是，2013 年，“饺克力”工作室又炮制了一部被杨宇称作是“史上最纯洁的动画”的资产阶级恶俗色情动画——《老板的女人》。这部极端反动的动画将贩卖色情当作吸引眼球的工具，甚至给动画中的猥亵情节频频予以特写，赤裸裸地把动画中出现的罗小薇和清洁工两名女性全部丑化为向男人卖弄风骚的“荡妇”和理所当然地被男性当作性工具压迫的奴隶，简直是乌烟瘴气！最为无耻的是，为杨宇辩护的法西斯男权分子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把这部动画标榜为“揭露”“职场潜规则”的动画，好像杨宇制作这部色情动画是要“好心”地诉说“女性”在资本主义公司里的所受到的压迫一样！然而不仅动画中的各种色情内容都毫不留情地出卖了这些辩词，遭受压迫的可怜女性罗小薇在动画中处于软弱无力，任由淫魔和强奸犯资本家支配的悲惨境地也暴露出了杨宇贬低女性，抹黑女性只知逆来顺受，甘当奴才的极端大男子主义世界观。罗小薇只能依赖于一帮比之色情狂资本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资产阶级走狗二哥、小喆、大波[①]来将她从虎口中“拯救”出来，最终得到的却是新的狼窝中的侵犯阴谋。她本人在动画中的地位一直是任人摆布的——无论是开头被资本家以秘书的名义招来，踏入资本家的侵犯阴谋当中，还是在喝下带迷药的酒失去意识后只能任由二哥、小喆、大波三个新的强奸犯宰割时，她都没有任何个



“史上最纯洁的动画”《老板的女人》

① 动画交代了四个“员工”，即二哥、小喆、大波、BB 仔的身份：市场总监、艺术总监、技术总监和实习生。从阶级成分来看，前三者皆为身居公司高层，受资本家收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后一者作为与这些工人贵族相伴的“实习生”基本上也可认为是工人贵族的预备役。因此，四人不管就世界观来说还是就阶级地位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一员。

人的独立性可言，完全没有体现出任何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冲天革命气概，有的只是被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种种适合充当性工具的特征——性征突出（刻意夸张的效果）、语气柔弱、自卑自贱、愚昧无知。当动画将大量色情画面和污言秽语不加批判地向观众灌输时，将观众的精神粗暴地强奸时，“纯洁”在哪里？当动画污蔑妇女永远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对父权制的压迫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作为一种所有物成为男性占有的对象时，这是什么“讽刺”呢？当动画鼓吹妇女必须做俯首帖耳的奴隶，不能反抗奴隶主，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救世主”将她们“拯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救世主”脆弱、不可靠，甚至是卑劣的所谓“良心”之上，并需要将自己的献身当作“英雄”不请自来的代价时，“揭露”又是何等的荒唐！这清楚地说明，杨宇从来没有任何企图通过这部动画来“揭露”女性遭受资本家骚扰、侵犯的黑暗现实的意图，因为他本就没有打算对此给出任何解决的方法，他反而是在这部动画中通过将女性丑化成彻头彻尾的性工具来将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对女性的性压迫合理化，好像女性生来就应该如罗小薇一样遭受男资本家、男工贵的骚扰和侵犯一般！这不是对现实的揭露，而是对女性形象粗暴的歪曲，是对那些敢于为妇女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千百万劳动妇女的莫大侮辱！

虽然中修对这样一部能够如此剧烈地腐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黄色废料的出现欣喜若狂，但是**“特权地位的优越性也不是随时都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①，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是绝不容跳梁小丑杨宇之流肆意诋毁的！面对这样一部粗暴地侮辱了女性尊严的色情动画，中国广大人民在网上掀起了对动画的猛烈批判，沉重地打击了以杨宇为代表的法西斯男权分子的嚣张气焰。在人民群众愤怒的声讨浪潮下，中修只得下令将这部动画在国内网络上封杀，让早已凭借这部色情动画名利双收的杨宇暂时“委屈”一下。杨宇和他的动画于是暂时隐匿了，但这只意味着他在中修的掩护下逃脱了罪行。他炮制黑动画的活动依然没有停止，并且随时都在伺机东山再起。

果不其然，经过六年的蛰伏，杨宇在 2019 年重新向人民群众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抛出了一部相较之前的动画形式更加繁琐、内容更加反动的长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相较于杨宇前两部动画，《哪吒》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便是不再将粗制滥造、画质低劣的反动动画匆忙放出，而是妄图凭借种种看似华丽的特效掩盖其内容的空洞，因此其迷惑性正是在于将小资产阶级引向对画面特效的片面追求，使他们只注重动画的艺术性，而不去关注和仔细思考动画的内容。这就让他们不能明晰是非、分辨敌友，竟纷纷把《哪吒》这株大毒草当作香花去歌颂、赞扬。一时之间，《哪吒》俨然成了小资产阶级口中的“神作”，杨宇仿佛也已经洗去了其过去的低俗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什么“国产动画”的“巨匠”、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师”。

虽然《哪吒》这样的**“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但是**“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②《哪吒》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借哪吒闹海的故事来宣扬调和阶级矛盾、家庭矛盾的儒家等级制观念。虽然杨宇一再狂妄地宣称《哪吒》的核心思想是“不认命，打破成见”、“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这样的口号实则不过是笑话罢了。哪吒形式上好像无比“叛逆”，好像无比“不认命”，但潜藏在他大话之下的，却是无比怯懦、庸碌的与一切儒教徒别无二致的循规蹈矩。列宁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③同样的，判断哪吒反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不是根据他口头上的言语，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而是根据他实际的行动。杨宇所要塑造的哪吒，与其说是“不认命”，倒不如说太过于“认命”，以至于到了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等级制面前卑躬屈膝的地步，所以才会显得貌似在“反抗”一样。“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①正是因为杨宇太过热衷于将哪吒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孝子贤孙，所以他才需要让哪吒在形式上似乎没有那么“认命”，以便偷运儒家孝道思想、奴才思想的黑货。当观众被哪吒的“不认命”麻痹时，也就在同时默默认同了哪吒“忠孝双全”的另一面，杨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为了维护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剥削阶级等级制，让资本主义万世长存，杨宇竟不惜对哪吒闹海的原著情节大砍大杀，把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在《哪吒》中，本来“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对父亲有着刻骨仇恨的哪吒，被说成是无比“感动”于父母“好心”的恭顺奴才；本来眼里自己的乌纱帽、对哪吒动辄打骂、甚至恨不得一剑将其劈死的哪吒之父——陈塘关总兵李靖，竟成了“父爱如山”，甘愿为哪吒承担“天劫”，“无私”地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哪吒生命的“慈父”。这样的修改绝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要淡化哪吒闹海中那些原本不利于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美化儒家家长的内容，因而刻意突出乃至编造大量能够体现“父慈子孝”、“母慈子孝”的情节。杨宇自己就曾供认，他在创作《哪吒》时就曾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有更多父母的“爱和包容”②，大谈所谓的“父爱”和“母爱”，甚至煞有介事地称哪吒和父亲隔空相望、观看其父亲甘愿为哪吒牺牲自己的画面是他“最喜欢的”，对此“非常感动”。如此一来，杨宇便在观众面前铺开了一幅充满儒家臭气的阖家团圆的画卷：虽然李靖是一个依靠陈塘关人民的劳动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一个热衷于“斩妖除魔”，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反动将军，但他却依然可以毫无根据地对自己的儿子“无私”起来，主动要求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自己儿子哪吒的生命，只因杨宇硬要说他作为一个父亲，天生就应该对子女充满“父爱”；即使哪吒的父母一心想着如何利用子女，把子女变成实现自己“斩妖除魔”、建功立业的个人野心的工具，但是“父爱”和“母爱”是真实存在的，父母真的可以为子女无条件牺牲自己，替子女抗下必死的“天劫”；即使哪吒的父母偶有“严厉”之处，粗暴地将哪吒关在府内乃至屋内却不对哪吒进行任何思想教育，用管、卡、压的方式把子女当奴隶对待，但那也只是“煞费苦心”的“为你好”！在杨宇看来，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子女在这样的“爱”面前就也应当无条件地对父母“孝顺”，对父母言听计从，如哪吒对父母“感动”一般对父母“感恩戴德”，把中国变成一个遍地是孝子的儒家神国。

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② 陈塘关四太子奶吒：《饺子导演，最全专访合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t411w7Wz。

但是，画饼不能充饥，杨宇如此美化的这么一个家庭，在现实中是哪里也找不到的。在中国这个充斥着儒家家长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要说什么父母为子女无条件牺牲自己了，就连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子女，把子女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而不是当作自己的家庭奴隶和自己的财产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家长不但没有什么李靖一般的“父爱”，殷夫人一般的“母爱”，反而一个个都**“把子女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要在这份财产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于是，他们以‘为子女前途着想’为幌子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子女的压迫，希望手中的这支股票能够涨到高价”**。[1]**“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2]儒教家长为了让子女



杨俊明之子与杨俊明的杀人凶器

在资产阶级学业中取得优胜地位，夺得一个高等文凭，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从而使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增值，便动辄打骂子女，用种种法西斯式的手段强迫子女投机资产阶级学业，甚至疯狂到在子女考试成绩低下时以“最好的心”用武士刀将子女一刀捅死[3]，以“教育”的名义用火钳对子女施加烙刑，用木棒、铁棍将子女活活打死[4]！无数以“爱”之

①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③ 杨俊明，有产阶级家庭出身，早年曾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在外出轨，因而其妻与之离婚，离开了这个家庭。在自己的家庭奴隶逃跑后，杨俊明不甘心失败，反而更加疯狂地将投机发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仅剩的家庭奴隶——自己的儿子身上。因此，杨俊明便对其子长期以来使用法西斯手段实行管、卡、压，企图“棍棒底下出孝子”，让自己的儿子在其逼迫下能够拼命投机，实现其发家致富的美梦。为此，杨俊明甚至不惜屡屡用其此前购得的开刃武士刀恐吓儿子，妄图实现刀刃下的暴富。但是，在一次线上家长会上，当得知自己儿子体育成绩仅 18 分后，杨俊明对妨碍了自己大发横财的春秋大梦的儿子怨恨至极，气急败坏之下竟穷凶极恶地挥舞起武士刀，一刀捅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了一个不耻为人的弑子禽兽。

④ 叶明兰，贵州省遵义市人，1987 年生，出身自农村家庭，后沦为破产游民，在破产后被迫以务工为生，破产游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极其严重，一心幻想有朝一日通过投机倒把来捞取名利，挽救自己的破产命运。在其夫因犯罪入狱后，叶明兰的家庭收入遭到极大损失，导致叶明兰经济压力急剧增大，遂萌生了将自己儿子当作投机工具，逼迫其为自己谋求荣华富贵的投机思想。因此，其子自 2019 年与叶明兰生活起便遭受了叶明兰骇人听闻的虐待。为了逼迫自己的儿子投机，丧心病狂的叶明兰竟“数次以极端且残忍的方式即采用恐吓、殴打、捆绑、烙烫等”对其子酷刑折磨，妄图通过法西斯手段来摧残出一个善于投机，卑躬屈膝的奴才投机狗。但是，在其子通过离家出走等方式进行反抗后，叶明兰的幻想破灭了。于

名对子女行压迫之实的罪恶早已充分地表明，在中国的儒家社会里，“父爱”也好，“母爱”也好，全都是再虚伪不过的谎言。谁想找到李靖，谁就只能找到杨俊明！谁想找到殷夫人，谁就只能找到叶明兰！

不过，在剥削阶级家庭中间，父母对子女的“爱”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对子女的溺爱与放纵。这些处于剥削阶级地位的父母，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陷入无尽空虚的生活中除了将子女当作投机工具外，还会将子女当作用于玩乐、消解郁闷的“宠物”，让子女和自己一道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对子女在长期寄生生活中养成的各种剥削阶级坏习气百般纵容和娇惯，让子女从这种自私自利的实践中不断得利，从而逐渐形成一套极端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将子女培养成心安理得地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血汗来维持自己奢侈生活的寄生虫。这样的“爱”，也只能是一种腐蚀年青一代，让他们成为剥削阶级接班人的“爱”，是一种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之上的罪恶的“爱”。哪吒父母对哪吒的娇生惯养，就非常鲜明地带有这种剥削阶级的性质。哪吒这个剥削阶级的纨绔子弟，自出生起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哪吒在出生不久后便大搞破坏，对陈塘关人民拳打脚踢，还放火炸楼，将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付之一炬时，自诩“除妖抚民”的殷夫人却毫无为百姓安危考虑之心，而是满脑子如何保住她的宝贝儿子，大喊什么“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对人民所受的伤害毫无反应，而李靖紧接着也轻描淡写地以所谓“孩子无辜”为由将哪吒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一笔带过，仅仅是开了个“好好管教”的空头支票敷衍了事；当哪吒在府内“翻墙倒瓦摔瓶罐”，把府院糟蹋得千疮百孔，加重劳动人民的修缮负担时，殷夫人竟毫不在乎地要和哪吒一道“踢毽子”，放纵哪吒以“踢毽子”为名继续毁坏砖墙瓦石，殴打底层士兵，毫不遮掩地宣布为了满足哪吒一人之快乐，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当哪吒在陈塘关胡作非为到人民群众恨透了哪吒，甚至自发组建了发誓铲除哪吒这一蛮横无理的霸王的“伏魔帮”时，殷夫人则是彻底显露了其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竟妄图防民之口，“严令在陈塘关不得提及魔丸二字”，**“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①]；而当哪吒“烧毁村庄”、“殴打村民”，肆意欺压百姓时，李靖更是毫无作为，仅仅是将哪吒敷衍地带回府内重新关押了事，并未予以任何惩罚；当哪吒生辰宴来临时，李靖为了还哪吒“清白”，竟摆起自己“陈塘关总兵”名为“情面”，实为反动封建权威的架子，动用自身的特权来“求”陈塘关人民冒着被哪吒残忍屠戮的生命危险到场参与生辰宴，将全城人民的生命作为证明哪吒一人“清白”的抵押物！一边压迫子女，一边压迫人民，哪吒家长的所作所为，可谓是既负人民又负儿。

杨宇之所以费心费力地将如此沉重的剥削和压迫美化为“父爱”、“母爱”，正是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承认一切剥削阶级父母对子女的“爱”，首先就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是用人民的膏血造就的罪恶。**“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持住自己令人作呕的“爱”，就要千方百计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条件养育子女，有条件让子女衣食无忧，而不是如同每日被雇佣劳动制榨干了血汗，在漫长的工作日中被麻痹了精神，被迫因外出务工而与子女长期分离的无产阶级一样失去“爱”子女的权利。有哪吒们的快乐，就有人民的痛苦；有哪吒们的安逸，就有人民

是，发觉投机倒把愈发失去希望的叶明兰开始变本加厉地虐待其子，企图用更加疯狂的手段来逼迫子女投机。2020 年，在其子一次离家出走被抓回后极端残忍地以木棒不断殴打其子，并在连续殴打导致木棒折断后竟更加狠毒地用铁棒继续殴打，导致其子在叶明兰的棍棒下被活活打死！即使如此，反动的中修政府为了维护儒教等级制度，竟依然于 2024 年恬不知耻地“建议对罪犯叶明兰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妄图让本就逃脱杀人罪名的叶明兰再获减刑，逃脱惩罚，充分暴露出其反人民的儒教嘴脸。

① 毛泽东，转引自 1974 年 7 月 4 日《人民日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的劳累；有哪吒们的残暴，就有人民的屈辱；有哪吒们的富足，就有人民的贫困——这就是作者极力掩盖，但却怎么也掩盖不住的与大多数劳动人民无缘的父母对子女的“爱”！

在家庭观上宣扬子女应当如哪吒爱父母般去“爱”自己的儒家家长的《哪吒》，在阶级观上也必然宣扬被统治阶级应当无条件地去“爱”统治阶级的奴才哲学。儒家创始人孔老二的学生有子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哪吒》中的“屎、尿、屁”低俗情节

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所谓“孝道”，其实历来就是剥削阶级用以维护等级制度，妄图使现存的剥削制度万世长存的一种手段；所谓“孝子”，历来都是死命地维护现存剥削制度的。哪吒的父母之所以将软硬两手交替使用，一会对哪吒管、卡、压，一会对哪吒好言好语、循循善诱，都不过是为了让哪吒走上“斩妖除魔”的封建仕途。在他们看来，哪吒就应当继承父亲李靖的家业，做封建制度的孝子贤孙，四处“替天行道”、“斩妖除魔”，充当“正义之士”，维护封建统治，最终如其两个哥哥金吒和木吒那样升仙当官，成为下一个有着名誉、地位的仙人。在李靖和殷夫人看来，哪吒在家孝敬父母，在外也就会效忠封建朝廷；既然能对父母言听计从，当一个“孝子”，那么自然也就能听从父母让他“斩妖除魔”、“修炼成仙”的要求。事情不正是这样吗？当哪吒对父母“感动”的时候，他不也正是在心中产生了种种父母如何“关爱”他的“美好记忆”，进而“幡然醒悟”，痛哭流涕，要“子承父业”，“拯救陈塘关百姓”，成为“斩妖除魔”的“神仙”，成为下一个李靖，下一个封建制度的忠臣吗？可见，所谓孝子，必然会成为反动制度的忠臣。杨宇正是怀着如此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哪吒》中大肆散布儒家思想，以求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饱受家庭压迫的年青一代也都一个个成为父母的孝子、中修法西斯国家的忠臣，实现其意图让中修叛徒集团法西斯统治永世长存的反动迷梦。

除此之外，《哪吒》中贩卖的各种油滑化低俗内容，各种“屎、尿、屁”恶俗情节，各种歧视女性的父权制思想，更是为这样一部恶臭的儒家电影又增添了几坨无比肮脏的大粪，也再一次暴露了杨宇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大导演”外表之下无比肮脏龌龊、恶臭不堪的真面目。

由此可见，杨宇的早年经历，就是他如何通过投机倒把，投靠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来获得种种名誉、地位、金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上人”的经历；就是他如

① 《论语·学而》。

何疯狂散布反动毒草，毒害中国人民的经历。他以“普通人”的面目出现，但人们扒开他的皮囊看到的却是他的妄自尊大；他以“天才”的头衔闻名于社会，但人们透过这种称呼看见的却只有他可鄙的庸俗思想；他想要成为指点社会的儒家卫道士，但人们仔细观察后却看到了他那恶臭不堪的低俗嘴脸；他想要自命不凡地冒充全体中国人的代表，但人们最后发现他仅仅是中国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玩物。

***

在《哪吒》之后，杨宇无疑地因为其宣扬儒家思想的“卓有成效”，得到了中修官方的赏识，一时间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名扬天下”的“大导演”。从此，杨宇便更加卖力地充当中修的御用文人，在《哪吒》上映后仅五天便宣布已经开始制作《哪吒》续集，并在 2022 年 3 月正式于中修国家电影局处报备立项，将《哪吒》续集定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即《哪吒 2》）。这部电影在中修的全力扶持下得到了相关影视行业的全行业帮助，最后于 2025 年 1 月 29 日上映。相比《哪吒》，《哪吒 2》在反动性上更是登峰造极、更是露骨。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哪吒》中的儒家毒素，而且还将色情思想、父权制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沙文主义思想等各色反动思想囊括在内，卖力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涂脂抹粉，毫不掩饰地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妄图调和社会矛盾的罪恶阴谋和对外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服务，可谓是各种反动思想融合而成的大杂烩。为了将这株特大毒草彻底批判，就必须逐一分析《哪吒 2》宣扬的各色反动思想。

批判《让子弹飞》——兼评资产阶级导演姜文及其反动作品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让子弹飞》的创作背景

《让子弹飞》开始拍摄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 2009 年。这一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始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全球生产总值减少 5.2%，工业增加值减少 10.3%①。生产的骤然减少，进一步压缩了本已因劳动人民消费能力的降低而变得十分狭窄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急剧扩张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到严重冲击，货物出口额猛跌 18.3%②。彼时，中修于 2008 年末出台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的“四万亿计划”，也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于是，商品积压、生产缩减、企业裁员，大量工人被资本家以极低的代价或根本不付代价地开除，余下的在岗工人也由于产业后备军的扩大而不得不忍受更低的工资和更苛刻的劳动条件。进入新世纪的近十年来，无产阶级用血泪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特色腾飞”——据估计，仅珠三角一地，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三万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四万只。③而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产阶级却又想让他们承担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代价，工人群众胸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了！2009 年至 2010 年，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自发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9 年近万名工人团结罢工、打死建龙集团总经理陈国君的通钢事件，以及 2010 年有约二千名工人参与、持续十九天的南海本田罢工。这两起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信心，各地工人学习通钢工人和南海本田工人的榜样，纷纷起来发动罢工斗争。其中，以 2010 年下半年爆发的大连工业园区连锁罢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罢工持续约三个月、有超过七万名工人参与、波及企业逾七十家。此伏彼起、声势浩大的工潮冲击了资本主义秩序，在团结一致的群众面前，骄横不可一世的中修也不得不低下头来，部分地同意工人提出的复岗复工、提高工资等要求——吉林省国资委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控股通钢，通钢部分下岗职工重新恢复工作，在岗职工的月工资增长二三百元，退休职工的退休金也有所增长；南海本田工人月工资增长五百元，



陈国君向愤怒的通钢工人求饶：“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工人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 年，全球生产总值为 64.15 万亿美元，工业增加值为 18.01 万亿美元；2009 年，全球生产总值为 60.81 万亿美元，工业增加值为 16.15 万亿美元。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货物出口总额 2008 年为 100,394.9 亿元，2009 年为 82,029.7 亿元。
③ 南方新闻网：《每年三万断指案，珠三角繁荣的代价？》，https://news.ifeng.com/society/5/200807/0710_2579_644870.shtml。

增幅达 33%；大连工业园区工人工资平均增长三百元，平均增幅达 34.5%。[①]

然而，反动派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中修在表面上对人民做出让步的同时，暗地里却一刻不停地策划着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反攻倒算。在经济上，如前所述，中修乞灵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所谓“四万亿计划”，大肆实行通货膨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企图在将无产阶级的斗争成果化为乌有的同时，为过剩资本开辟出一片为国家订单所保证了高利润率的投资场所，从而消耗过剩商品、渡过经济危机。在政治上，从 2008 年开始，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代表的一派便掀起了所谓“唱红打黑”运动，通过“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和“打黑除恶”，一面将马克思主义阉割、歪曲、篡改为庸俗的、无害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一面用假马克思主义将自己打扮成“改革家”、“革命者”和“青天大老爷”，借以欺骗群众、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并铲除政治异己。在思想文化上，中修在大力引进各种外国资产阶级文艺作品[②]的同时，还加紧炮制一批更加符合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电影，例如：宣扬阶级调和，以“幽默诙谐”的软刀子消解资无矛盾、抹杀阶级斗争的《人在囧途》（2010 年）；歪曲近代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中修统治制造合法性的《建国大业》（2009 年）、《建党伟业》（2011 年）；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人民群众视线的《南京！南京！》（2009 年）、《叶问 2：宗师传奇》（2010 年）。其中，影响最大、欺骗性最强、流毒最深远，因而也是最为反动的，当属《让子弹飞》（2010 年）。它通过宣扬“群众落后”论、将剥削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狗咬狗的斗争粉饰为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散布失败主义，最为巧妙地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至今仍发挥着其反动作用。

《让子弹飞》的情节与人物

既要鼓吹革命斗争必然失败，就要首先塑造一场“革命”和一群“革命者”。虽然影片中并没有一处提到“革命”的字眼，但其内容却无处不在说：故事发生地鹅城所爆发的正是一场“革命”，而其领袖正是主角张麻子。

姜文是怎样为张麻子的横空出世创设背景的呢？为了突出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和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他特意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为反动北洋政府统治的 1919 年。此时，在土豪劣绅黄四郎与两大家族统治下的鹅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贫富差距悬殊：老爷们或是手戴珠玉、或是嘴里镶金，要么身穿马褂、要么西装革履；反观绝大多数百姓，他们手中空无一物，只能赤裸上身、仅着单裤布鞋。并且，在电影开始后不久，姜文便借汤师爷之口说出：“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当张麻子的手下六子拉出布满青藤的冤鼓时，汤师爷又叫道：“你把它拖出来，指不定出多大冤”。话音未落，一名小贩的身体便飞来击破冤鼓，横行无忌的恶霸武举人正在对他进行殴打。鹅城百姓当真遭受冤屈极重——姜文正是这样对汤师爷的叫喊做出了回答。总之，一切都在表明：人民群众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土豪劣绅的剥削已经达到顶点，一场“革命”呼之欲出。“革命”需要领导者，张麻子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粉墨登场的。

为了塑造张麻子的“革命英雄”形象，姜文是颇费心机的。影片中，鹅城前 51 任县长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而张麻子则不然，他在得委任状、上任鹅城伊始，便称自己此行“从来没想刮穷鬼的钱”，而是“谁有钱挣谁的”，这似乎将他

①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编写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2019 年。

②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灾难电影”《2012》（2009 年）。影片宣扬所谓“世界末日”，将经济危机所预示的资本主义的灭亡视为人类社会的灭亡，极力渲染人们在灾难面前的渺小无力，妄图使广大人民放弃斗争、坐以待毙。



张麻子令人作呕的“深情”表演

与先前一众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区别了开来。紧接着，张麻子先是为小贩伸张正义，逼迫武举人向其磕头；又是朝天鸣枪，向赤贫的鹅城群众大喊：“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在“鸿门宴”一幕中，姜文借黄四郎这个“南国一霸”之口，提起他与张麻子在二十年前见面时“一个在暗处、一个在明处”，从侧面刻画了张麻子与土豪劣绅的对立。在张麻子得到两大家族的银子后，他也没有携款出走，而是命其手下散发给城中百姓。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现张麻子对鹅城群众的“深情”，姜文还特意设置了肉麻的一幕：当其手下与汤师爷准备携款潜逃时，张麻子却斩钉截铁地说：“人不走，钱也都不要了，发出去！”面对手下将银子发给谁的疑问，一向好勇斗狠的张麻子一改往日的痞气，眉眼低垂、面带微笑地温声细语道：“发给穷人呗”，仿佛他在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穷苦百姓，一个“心系苍生”的伟岸形象跃然于荧幕之上。张麻子与汤师爷的对话，更是彻底揭开了关于前者身份的谜底——原来，他曾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松坡将军”蔡锷的手枪队长。至此，一切与张麻子相关的情节似乎都得到了解释——正是因为张麻子参与过辛亥革命，所以他能劫富济贫、为民伸冤。在影片的末尾，随着张麻子的振臂一呼——“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故事情节进入了最高潮。在他的领导下，一场“革命”在鹅城爆发了，群众攻入黄四郎的老巢，将其剥削所得尽数夺回。

但是，张麻子果真如姜文所极力塑造的那样，是一个“绿林好汉”式的人物吗？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便可以揭开张麻子“革命者”的假面具，见到他土匪、军阀的真面目。

在影片中，张麻子称自己十七岁时便投入参与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蔡锷帐下，并且还作为亲信为其担任手枪队长（相当于警备团长），在汤师爷面前也尊称蔡为“松坡将军”而不直呼其名。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张麻子对于蔡锷是推崇的、对于自己作为蔡锷部下的身份是荣幸的。张麻子一角是姜文虚构的，自然无法在历史上考证其人。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他追随的这位“颇负盛名”的老上司的生平和政治活动，来看看张麻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

蔡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和立宪派军阀。他于 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受云南总督李经羲邀请入滇，预备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在等待就任新职时，蔡锷潜心辑录、钻研大卖国贼、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的“治兵语录”，对他大加赞赏，称其“以良心、血性为前提”，镇压革命的“武功”至于“绝顶” 。然而，等蔡锷正式当上协统后，他发现：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军中的革命情绪普遍高涨、难以遏制，此前爆发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于是，蔡锷便转而采取观望态度——若斗争情绪衰退，则血腥镇压之；若革命形势发展，则从中篡夺之。蔡锷对同盟会成员黄子和所说的一句话，便彻底地暴露了其投机革命的立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1911 年 10 月 27 日，以张文光为首的同盟会腾越支部响应武昌首义，在腾冲发动起义并建立“滇西都督府”。革命形势一日千丈，此时若再按兵不动，便将失去在新政权中的一席之地。于是，在腾冲起义爆发三天后，蔡锷匆忙发动了所谓“重九起义”，建立“云南都督府”，果真穿上“白盔白甲”、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军政府都督。夺得革命果实后，他立即派兵镇压张



蔡锷对袁世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曾多次发电吹捧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是“中外钦仰”的“一代伟人”。

文光起义、解散腾冲起义军的武装，云南都督府遂成为滇内唯一“革命政权”。在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关于定都的斗争中，蔡锷大力支持袁世凯，他说：“建都燕京，可以控驶中外，统一南北”——新政权定都北京，更便利于得到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从而将中国统一于一个卖国政府之下。1912 年，蔡锷借北伐之名、行扩张之实，派出唐继尧部进入广西，与贵州立宪派勾结突袭贵阳，对革命群众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凡不受立宪派控制的军队，“无论官长士兵，恐其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时，蔡锷更是致电袁世凯，疯狂地叫嚣对于革命务必“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 。

姜文在电影中塑造的张麻子正是蔡锷式的人物——本质上是土匪军阀，然而却善于伪装自己、假扮革命，在利用群众达到个人政治野心方面诡计多端。

影片中，黄四郎在表明自己为何要出城剿匪时，曾提到他替刘督统贩运小半个民国的烟土，而其烟土“十回有八回”都被张麻子劫走。烟土，说得好听，实际上即我们所常说的鸦片。换句话说，拦路打劫、贩卖鸦片，正是张麻子一伙所赖以为生的勾当。鸦片，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工具。约二百年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盗正是借助鸦片打开了中国大门、扭转了贸易逆差、掠走了大量白银。而在鸦片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又与殖民强盗勾结起来，一面强迫广大农民种植并低价收购罂粟，一面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以供自己吸食鸦片。虽然张麻子嘴上说什么自己“没想刮穷鬼的钱”，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用以购买鸦片的钱财又是从哪里来的？不还是敲骨吸髓地从劳动群众身上榨取出来的吗？可见，张麻子劫走鸦片再进行转卖的行为，只不过是改变剥削所得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配罢了。**“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张麻子不事生产，依靠手下一伙土匪武装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按其阶级性质来说，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张麻子从事的罪恶勾当获利颇丰，就连以买官为业的汤师爷也羡其“富有”。他本可以继续当土匪吃这口“自在饭”，那么又为什么要跑到黄四郎的老巢鹅城虎口拔牙呢？难道果真是要为鹅城百姓讨还公道、为他们平均财产？当然不是这样。

张麻子原是倚靠蔡锷势力、通过辛亥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的封建军阀。那时，作为蔡锷的亲信，张麻子是风光无限的。然而，在蔡锷死后，张麻子却失去了他的靠山，并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落败。但是，食髓知味、野心勃勃的张麻子决不甘心失去自己原有的“天堂”，此刻的他正像被刺双颊、流放江州的宋江一般——“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于是，张麻子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占山为王，通过打家劫舍、转卖鸦片的方式积蓄力量、窥测风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重掌大权[②]，最终果真让他等到了劫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
② 在影片中，张麻子也正是这样地表白了自己“落草为寇”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跟这帮东西玩不

火车、走鹅城的机会。当张麻子得知鹅城的税已经收到九十多年后时，他不仅不沮丧、反而还喜不自胜，对一脸错愕的汤师爷说："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正是因为他也想行蔡锷故事，利用革命的形势和群众的斗争达成夺取权力的个人野心。并且，当汤师爷告诉张麻子，做县长如果想要赚钱，就要巴结城内豪绅、就要看黄四郎的脸色时，张麻子立刻火冒三丈，表示：自己之所以当土匪，就是因为"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而此次上任鹅城，正是要"站着把钱挣了"——不仅要"挣钱"即剥削劳动人民，还要摆脱"在山里"的非法状态和"跪着"臣服于黄四郎的附属地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张麻子所谓"公平"的真正内涵——跻身于鹅城统治者之列，与黄四郎和两大家族"公平"地分配权力，实现剥削阶级内部的利益再分配。

可见，张麻子与黄四郎之间的矛盾是剥削阶级的内部矛盾。我们知道，由于在剥削、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一般来说是非对抗性的。然而，在如何分配剥削所得和政治权力的问题上，剥削者又总是相互斗争着的。这种斗争发展到顶点的结果，便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只有通过激烈的外部冲突才能解决的对抗性矛盾。张麻子与黄四郎之间的矛盾正是如此，它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张麻子只不过是山间土匪、一芥草寇，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在野派，与称霸南国、权盛一时的黄四郎还没有直接交锋的力量。但是，二者间的矛盾此时毕竟已经存在了。张麻子为卷土重来劫走黄四郎大量鸦片，令其十分头痛。

在第二阶段，一纸委任状使张麻子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成为了鹅城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张麻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要进一步掌握实权。既然要利用群众、分黄四郎和两大家族之权，那么必须首先欺骗群众、立自己这个县长之威。于是，张麻子利用为小贩断案"伸冤"的机会，逼迫武举人下跪磕头并将其杖打。通过此举，张麻子既得到了"青天大老爷"的"美名"，又削弱了黄四郎在城中的威望（武举人在黄四郎面前的狼狈哭诉表明了这一点——"这哪是打我的屁股，这明明是打您的脸！"）。然而，张麻子此时还并不想根除黄四郎，只是通过"敲山震虎"的方式迫使黄四郎让出一部分权力。但是，黄四郎作为鹅城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两大家族只是他的附庸和傀儡，自然是寸利必争、寸权必夺，不愿向初来乍到、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张麻子做出任何让步，他接下来的报复行动使两个集团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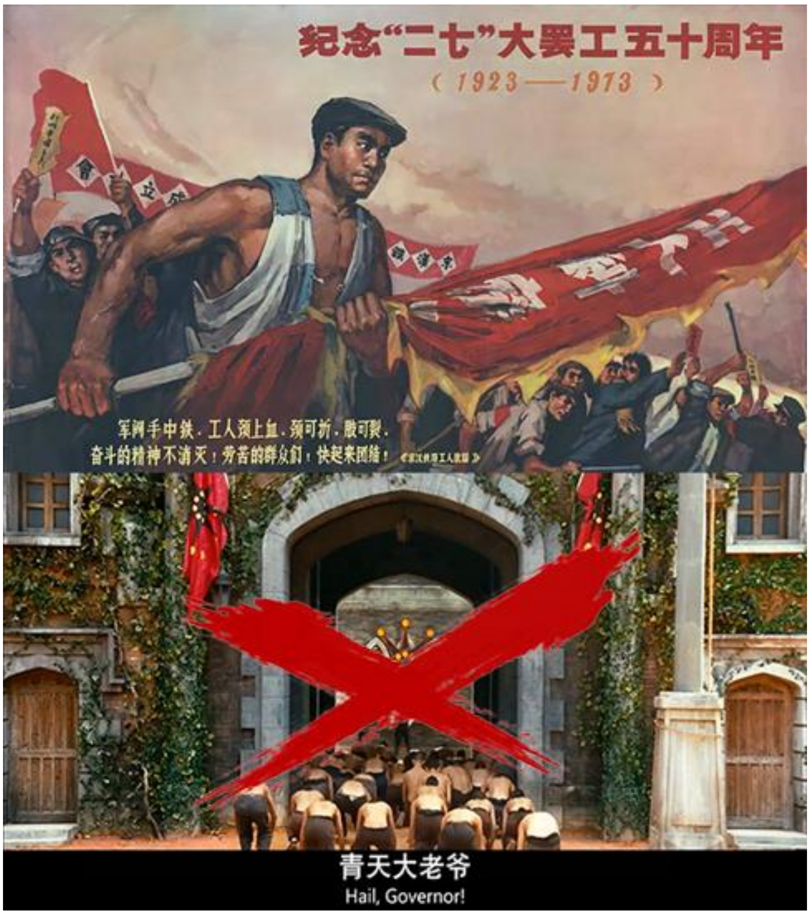
在第三阶段，黄四郎为阻止张麻子的夺权企图，设计将其继承人六子杀死。这使张麻子下定决心，要从鹅城"彻底拔掉"黄四郎，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从非对抗性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无论是张麻子企图夺得鹅城的统治地位，还是黄四郎希望维护自己的"世袭领地"，这时都必须通过战争才能够实现了。为了准备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张麻子可谓是做足了准备：先是只身赴宴探清黄四郎的虚实，又是以"剿匪"为名敛聚、散发两大家族的钱财以收买人心。黄四郎一方也同样磨刀霍霍，在得知张麻子重回鹅城并大造"杀四郎"舆论时，他立即联系郭旅长，准备借其骑兵对张麻子一伙"痛加剿洗"。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经清楚，是张麻子在这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取得了胜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姜文在《让子弹飞》中所塑造的"革命"，实际上不过是一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在野派向当权派要求重新分配利益和权力的狗咬狗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民群众而言，所谓"革命"在一开始便已经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它的结果不是新的剥削者代替旧的剥削者、就是旧的剥削者照旧统治下去。并且，为了进一步深化革命必然失败的反动观点，姜文还无耻地贬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无限地夸大以张麻子为代表的"英雄"的力量。前文已经提到，小贩因招惹武举人被打得半死。然而即便是张麻子亲自出面为其伸冤，他也还是忌惮于黄四郎的淫威，一面向武举人磕头求饶，一面说什么"不

起"。

是我冤，是武举老爷冤”，简直是一副奴才嘴脸。并且，在黄四郎设计杀死六子时，这个小贩更是“忘恩负义”地诬告六子“吃了两碗（凉粉），只给了一碗的钱”，充当了黄四郎的工具和走狗。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在旧中国，小贩属于半无产阶级，他们**“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①]也就是说，由于遭受沉重的剥削压迫，小贩等半无产阶级是具有相当强的革命性的。然而，姜文却极力将他们塑造为对反动势力畏之如虎、丝毫不敢触动现存统治秩序、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惜出卖良心的奴才与市侩，这是对劳动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至于最广大的无产者，姜文更是将他们塑造为一帮众愚群氓。鹅城百姓大多深受剥削，他们赤裸上身、一无所有，然而却在武举人殴打小贩时站在一旁拍手叫好，在小贩与武举人对簿公堂时躲在门外探头探脑。而在张麻子上演完“为民伸冤”的戏码后，他们更是一个个毕恭毕敬地预先立正站好，在张麻子出门时一齐向其屈膝跪拜道：“青天大老爷！”甚至，在张麻子向天鸣枪、厉声呵斥“站起来，不准跪！”后，他们又一次跪倒在了这个“解放者”跟前。在姜文看来，“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奴性”是深入骨髓的，他们即便在肉体上“站了起来”、在精神上也仍是“跪着”的，始终只能对一小撮所谓“英雄人物”俯首听命。



历史上真实的工人群众——“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消灭！劳苦的群众们！快起来团结！”（《京汉铁路工人歌谣》）

然而，事实与姜文所描绘的恰好相反，1912 年至 1919 年间，正是中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工人觉悟快速提高的时期。首先，工人斗争的规模空前扩大起来，在 1870 年至 1911 年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的四十年间，罢工仅有 105 次左右；而在 1912 年至 1919 年的短短七年间，罢工次数便达 130 起，并且不论是人数还是激烈程度都在与日俱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①]与姜文所谓群众只能等待“青天大老爷”来解救的谬论完全不同，中国无产阶级向来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们为了争取阶级的、民族的和全人类的解放，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反动势力进行着无畏的战斗。其次，在这一时期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逐渐由分散的转变为有组织的，同盟大罢工打破了过去行会间、地区间的障碍，出现了一处罢工、多方声援的大好局面。例如，1916 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法文报馆工人与法国使馆工人随即罢工声援，山东各地铁路工人、饭店旅馆工人、人力车工人也积极为天津工人筹钱款、送物资，并派代表前去慰问。可见，中国工人清楚地明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真理，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弟兄和一切受压迫者每一次都伸出强有力的援手，而根本不像姜文以他那套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所揣测的那样麻木冷血、见死不救。



姜文对毛主席著名论断的反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影片的结尾，张麻子通过散发银子与枪支弹药，观察群众拿不拿、拿完后上不上缴给黄四郎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最后，当张麻子看到群众并未交枪，他便以为时机成熟，挥刀呐喊道：“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然而，直到张麻子来到碉楼门口，他才发现自己身后只有鹅跟了上来，便说：“谁赢他们帮谁”。只是在张麻子当众斩杀了黄四郎替身、制造出黄四郎已死的假象后，鹅城百姓这才响应其“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的号召，一窝蜂地冲向碉楼。姜文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他直接向观众说明：群众是连鹅都不如的、就算手握武器也不敢反抗的、只会跟在“英雄”张麻子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胆小鬼，是“看到谁赢就帮谁”的投机者，是一帮众愚群氓和乌合之众。

在《让子弹飞》中，群众是如此的愚笨麻木。而反观张麻子一伙土匪，却无比“智勇”，仅凭着七人便将整个鹅城搅得天翻地覆。从亲赴鸿门宴到杀死黄四郎走狗胡万，从抓住黄四郎替身到散发白银枪支，从杀死替身到攻破黄四郎的碉楼……一切“革命”的条件都是由“英雄”张麻子所创造的——甚至就连碉楼的一道铁门，都是张麻子一伙先用手枪打得千疮百孔，最终才由群众突破进入的。

通过《让子弹飞》，姜文力图使观众相信：所谓“革命”，只是“英雄”的单打独斗，而群众则是愚昧无能的。他们只能向剥削阶级人物叩头请愿、摇尾乞怜，才有可能依仗其力量使自己得到救赎。所谓“革命”，只是“英雄”在实现个人目的的过程中捎带着造福了群

① 欧仁 · 鲍迪埃：《国际歌》。

众，而群众则是毫无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他们只会躺在“英雄”“牺牲奉献”的成果上享用现成的好处，而“起义”也不过是其在“英雄”为自己扫平了一切障碍后争先恐后地瓜分残羹冷炙。在姜文看来，群众始终是“革命”中可有可无的部分、时用时弃的棋子，只有张麻子一类“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最终，在完成了一切铺垫后，姜文终于彻底地暴露出了他的阴险目的。在影片的结尾，张麻子的手下纷纷与其辞别，坐上火车前往浦东。就连张麻子所倾慕的、在他与黄四郎的斗争中“毅然”加入“革命队伍”的花姐也表示不愿再跟着张麻子“当麻匪到处发钱”，与众人一同离去。在他们乘坐的火车上，已死的“黄四郎”的身影在车尾再次出现——张麻子打江山的班底、在鹅城“闹革命”的主力作鸟兽散，他们抛弃了“革命理想”，迫不及待地前往纸醉金迷的上海，一个个成了新的“黄四郎”、新的“剥削者”（尽管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张麻子一伙始终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黄昏中，只剩张麻子孤身一人追赶着火车，俨然一副落魄的“末路英雄”形象，影片接着便在《太阳照常升起》的音乐声中结束。“人性”是自私的，在打倒旧的剥削者之后，原先的“革命者”由于掌握了权力又会成为新的剥削者。因此，只有个别剥削者会发生改变，而剥削制度本身则是万古长存的——姜文正是这样鼓吹“先锋队腐化”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并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的：既然连无所不能的“英雄”都不免要失败，那么无知无能的“众愚群氓”们怎敢不老老实实、安安分分地当顺从的奴隶？！

《让子弹飞》流行的原因

正是《让子弹飞》这样一部反动电影，在 2010 年上映时便斩获 6.67 亿元票房，成为当年国产电影票房之最。有人评价它为“三十年来华语最好电影”、是“新时代的圣经”。中国的所谓“左派圈子”，更将其吹捧为“红色革命电影”和“姜文的毛泽东传”。《让子弹飞》如此受人推崇，以至于对其中“经典桥段”的解读竟成为一股风潮，并形成了所谓“让学”（《让子弹飞》研究学）。“让学家”——《让子弹飞》的狂热鼓吹者们反复地观看、推敲和解释电影中的每一幕场景、每一段对白，甚至对于画面中偶然出现的一串数字都要进行一番牵强附会的解读，以标榜自己理解了电影的“深刻寓意”。直到今天，这样的解读也还在不断进行着。

《让子弹飞》为何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原因首先在于中修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电影拍摄期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亲自到访剧组；在电影上映后，各种党媒或央媒的报道也经常引用其中的“经典台词”。除此之外，原因还在于电影所宣传的思想拥有广大的阶级基础——中国数量极为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农民、“个体工商户”与学生。截至 2016 年，三者的数量分别达到 2.13 亿人、5,930 万户和 9,913 万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时刻处于破产的边缘，这一点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2004 年，“个体工商户”为 3,921.6 万户；2008 年，这一数字缩减为 2,823.95 万户。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满的。资本雄厚的资产阶级、横行霸道的城管警察、蛮不讲理的学校教师……所有这些压迫都激起其对“公平”的追求和对变革现状的渴望。然而，作为小私有者，小资产阶级**“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们**“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①，因而在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同时，又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希望借助革命实现个人复仇和发家致富的落后性或反动性。姜文正是利用了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通过拍摄《让子弹飞》这样一部反动电影，极力激发和扩大其世界观中倾向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对于金钱、地位、名誉的追求，教唆他们像张麻子一般带着资产阶级的肮脏私欲混入革命队伍，将革命篡改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同

①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 年 12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在狭小的生产和生活范围中形成了狭隘的眼界，他们往往只见自己的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希望跃居于群众之上，然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力量在统治的资产阶级面前根本是不值一提的。加之不了解社会运动的必然规律，于是他们一遇挫折便总是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不可自拔。这也使得其易于接受《让子弹飞》中所宣扬的“群氓”论与革命斗争必然失败的反动观点。

姜文及其反动作品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①]文艺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反映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姜文的阶级地位和社会活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批判《让子弹飞》、彻底揭下姜文所谓“左翼艺术家”的画皮。



姜文得意洋洋地自供其反动家史

姜文出身于一个买办资产阶级—走资派家庭。他的外公是煤矿资本家，于1949年加入国民党，后被捕入狱进行劳改。他的父亲是高级军官。姜文的青年是在北京供高级军官及其家属居住的部队大院中度过的，因而他也被称为所谓“大院子弟”。“大院子弟”，即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反动的特权阶层——“可以‘保送’入团、入党、入‘名牌’学校，可以看内部资料，保密文件，可以随父母周游各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住单人宿舍，乘父母的小汽车上学、兜风，要褓姆、公务员服侍……”[②]。并且，在政治上，在文化大革命早期，为了“保爹”、“保妈”、保特权，他们还组织了“西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挑起武斗、残酷迫害革命群众、散布修正主义“血统论”。当然，我们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唯出身论者，并不否定一切干部子弟。但是，姜文于1993年亲自导演的、具有自传性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简称《阳光》），恰恰证明了他和其他“大院子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干部子弟，而是一群生活糜烂、思想腐朽的少爷、流氓、寄生虫和反动派。《阳光》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正是在这个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战天斗地的时候，主角马小军（姜文原名姜小军）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却既抗拒思想改造、又脱离劳动生产，整天撬锁入室、打架斗殴、骚扰女性、偷看色情影片。当代中国文艺界中的所谓“京圈”，便是由以姜文为代表的一帮“大院子弟”——冯小刚、葛优、马未都、王朔等流氓文人组成的。除家庭出身外，姜文本人也曾担任过三届共十五年（1993—2008年）的政协委员。不难看出，他与中修统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②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联动”展览会》编辑部：《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春雷》摧毁“联动”组织、批判“联动”思潮专刊，1967年。



秦书田妄想等待社会主义变天、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黑话

姜文演绎生涯的前半期，是他赤裸裸地暴露其反共反人民思想的时期。姜文此时的主要作品，除上文已经提到的《阳光》外，还有《芙蓉镇》和《鬼子来了》。姜文的“成名作”《芙蓉镇》拍摄于 1986 年。彼时，中修正在经济上进行瓦解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和城市“改革”，在政治上进行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严打”和“清理三种人”运动①，因而在思想文化上也迫切地需要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根据同名“伤痕小说”改编的《芙蓉镇》，正是顺应着这样的需要产生的。电影将与走资派（谷燕山）勾结、盗窃国家粮食的投机商人（胡玉音）美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为野心家（李国香）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和懒汉流氓（王秋赦）“仇富斗富”的“痞子运动”。这与中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污蔑——“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简直是完全一致！在影片中，姜文饰演的右派分子秦书田的一句台词，最集中地体现了《芙蓉镇》算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变天帐的实质——“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在影片的末尾，华国锋—叶剑英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胡玉音先前被没收的房屋和赃款被退还，被判处十年监禁的秦书田也得到释放，二人很快恢复起了他们的资本主义经营并大发其财。与他们的处境相反，王秋赦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也因此成了疯子。然而，正是对待这样一个“仇人”，胡玉音与秦书田却“以德报怨”，在其破落之际赏他一碗米豆腐吃。对待同为“仇人”却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依然步步高升的李国香，秦书田也表现得“不卑不亢”，告诫她“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好一个“以德报怨”！好一个“老实本分”、“勤劳肯干”的“老百姓”！然而，在现实中，胡玉音、秦书田这样一帮“老百姓”所实行的“以德报怨”究竟是什么呢？正是对革命人民残酷的迫害、监禁和屠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演好秦书田，姜文甚至走访了五十多个“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听取他们的“心声”并连篇累牍地写下了大量“人物分析”。可见，秦书田一角所体现的正是走资派的群像，姜文的表演正是承载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至于约十年后的《阳光》，虽然主要是一部在情节上与政治联系不很直接的色情影片②，但是其宣传海报上的一句话，却再直接不过地表明

① “严打”，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 1983 年“严打”期间，全国共逮捕 177.2 万人，判刑 174.2 万人。“三种人”，即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清理三种人”，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清算造反派。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供认，在历时十年的清查运动期间，全国共关押审查上千万人。

② 然而必须指出，色情本身也是政治，是资产阶级用以麻痹人民、分化群众的反动政治。姜文参演或导演的许多电影，都是不折不扣的色情影片：《芙蓉镇》用大量镜头表现胡玉音和秦书田间的苟且之事，其中一幕时长甚至超过四分半钟；《阳光》的故事主线，正是马小军和刘忆苦对米兰的勾引与争夺，影片中出现了大量裸露、淫乱的反动场景，甚至以第一视角使观众“代入”马小军，与他一同实施入室偷窥的变态行径；《太阳照常升起》和“民国三部曲”，不仅动辄将露骨的猥亵、性交画面搬上荧幕，还将几乎所有女角色——不只是林大夫（《太阳》）、县长夫人（《让子弹飞》）、唐凤仪（《邪不压正》）等地主资产阶级女性（她们本身作为剥削阶级具有腐朽、淫靡的两性观是一回事，姜文极力用她们代表和污蔑全

了姜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



反共色情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阳光》后不久，姜文又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拍摄期间（1998—1999 年），正值中国爆发第一次普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早在 1995 年就已初现端倪。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当年全国 82%的产品生产利用率低于 75%，半数产品生产利用率在 60%以下。1997 年，危机正式爆发。1998 年，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闲置 51%，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 87%。1999 年，在 605 种主要商品中，共有 437 种供过于求，相比 1998 年下半年增加 38%。[①]危机的爆发，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便证明了所谓“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江泽民在 1992 年中修十四大上提出）的破产，证明了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缩小。为了渡过危机，中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 1997 年提出所谓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将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职工“大下岗”推向了高潮。据统计，仅 1995 年至 2002 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精简”的职工数量便超过六千万名。1998 年至 2000 年间，每年都有七百万至九百万名职工下岗。[②]被抛出工厂的工人们两手空空、衣食无着，他们愤怒地发动了一系列示威。其中，以 2002 年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人和辽宁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抗议声势最为浩大，两次发动规模均达数万人。《鬼子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电影的情节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民马大三被游击队要求看守被俘的日军士兵花屋小三郎和翻译董汉臣。在战战兢兢的看守数日后，马大三被董汉臣说服，将二人送到日军宪兵队驻地。日寇假意酬谢马大三一村村民，却在所谓“联欢”中丧心病狂地将全村屠戮殆尽。马大三终于因此决心反抗，但最终却依然被日寇斩首，人头落地。[③]《鬼子来了》不仅极力将中国人民描写为胆怯麻木、奴性深固的众愚群氓，还杀气腾腾地向他们宣布：老老实实地屈服于“日寇”

体女性又是另一回事），甚至还是食堂女工都塑造为毫不自尊自爱、满脑子只有追求性刺激的所谓“荡妇”。至于姜文本人，则更是一个色情狂：在《芙蓉镇》上映前后，他与其时已婚的刘晓庆同居数年；在与前妻桑德琳尚保持婚姻关系时，他出轨周韵并与其生下一子。“在爱情、婚姻等问题上，最能反映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面貌。”（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姜文既然是一个极端厌恶、仇视女性特别是劳动妇女的男权分子，那么他对广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难道能有半点同情吗？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姜文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进步文艺工作者”。

①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编写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2019 年。

② 赵蕴娴：《【重返 90 年代之下岗潮】“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https://m.jiemian.com/article/6485827.html。

③ 对于这一情节，姜文还有意安排了一段极为血腥暴力的特写，其目的正在于恐吓群众。最为反动的是，马大三被砍下的头颅竟然面带微笑，意即“含笑九泉”。这与电影中段的情节是遥相呼应的——在澡堂里，四表姐夫对马大三说：被斩首的人不仅不应该记恨刽子手，反而还应该“感恩”他！在姜文的镜头下，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竟成了不仅是安于、甚至还是乐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屠杀的羔羊，可见其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汉奸实质！

尚可偷生；若是起来反抗，只能成为下一个“马大三”！由于《鬼子来了》对群众的抹黑和恐吓过于露骨，就连中修也不得不将其封禁①——如前所述，下岗工人的数量是庞大的。并且，他们还是一支集中在各大城市或工业区的、受到机器大工业训练的、较能团结和有纪律性的队伍。因此，中修还不敢于使用纯粹暴力的方法，而是玩弄“胡萝卜加大棒”的反革命两手，一面派出军警镇压抗议、抓捕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者，一面承诺满足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在思想文化方面，中修所采取的策略也是相似的，因而此时流行和受到官方支持的主要是宣扬国家主义的歌曲《从头再来》和小品《打气》②等。然而，中修的所谓“封禁”实际上是封而不禁，《鬼子来了》仍获得各种国际奖项，并于 2015 年在央视网、优酷等国内网络平台上线。并且，因此被禁止导演五年的姜文也还在多部电影中饰演角色。

姜文演绎生涯的前半期是直接暴露他的反动实质的时期，而其生涯以《太阳照常升起》和所谓“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为代表的后半期，则是他更具有欺骗性的时期。《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姜文第一部以“左派”面目出现的电影，影片中的情节往往被加以各种牵强附会的解读：疯妈寻找丈夫——解放军军官“阿廖沙”的下落被认为是“对革命传统的追寻”，疯妈向儿子李东方讲述其父亲的往事被认为是“革命火种的传承”，疯妈在 1976 年秋天反复吟诵《登黄鹤楼》被认为是“对毛主席逝世的缅怀”，疯妈与唐妻在沙漠中的分道扬镳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然而，姜文拍摄《太阳》的目的根本不是所谓“反思改革开放”或“批评资本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腾飞”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同时继续抹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宣扬那一套认为革命必然失败的黑货。

《太阳》于 2007 年上映，此时正值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新一轮复苏和繁荣的顶点——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它在极其低下的水平上与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重新统一起来；同时，中修政府投资的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自 2001 年以来向中国开放的相对广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工业起到了刺激作用。2007 年，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1%、工业增加值增长 27.2%、出口额增长 20.4%③。不断增长的利润使资产阶级陶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永久繁荣”的幻梦当中，上世纪末爆发的危机已经被他们当作“改革的阵痛”而彻底遗忘了。然而，资本主义造成了自身的对立物——无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着，特别是大量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镇——2003 年至 2013 年，每年约有 760 万农民工进城④。工人们的不满情绪与他们的生活贫困成比例地发展起来。中修政府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2001 年至 2008 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增速达到 17.1%，远超 GDP 增速。2007 年、2008 年，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超过 3%，食品类 CPI 更是突破 12%。2007 年 11 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 6.9%，创十一年来新高。⑤同时，由于中修对房地产投机的大力支持，房价也不断上涨。2001 年至 2007 年，全国平均商品房价格由 2,170 元每平方米上升至 3,864 元每平方米，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10.1%⑥。“经济腾飞”不仅没有为劳动者带来“物质富裕”，反而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据估计，2012 年，全国财产基尼系数达到 0.73，相比十年

①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
② 《从头再来》于 1998 年随作为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的配乐而首次面世，其中的一段歌词——“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引发了广大无产阶级的怒火。登上 199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打气》中也有一段令人作呕的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8》。
④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编写组：《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2019 年。
⑤ 同上。
⑥ 居一间：《中国房地产周期及四十年房价变化（1980-20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800561269214917。

前上升 0.18。前 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后 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仅为全国总量的约 1%。①因此，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未曾中断，如 2003 年的四川南充棉纺织厂罢工（规模约五千人）、2005 年的辽宁鞍山钢铁集团下岗职工示威游行（规模上万人）、2008 年的广东广州卡西欧电子厂罢工（规模约数千人）。

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精神遗产的国家，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所造成的后果，此时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新与马克思主义接近。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工人运动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材料，但是这一趋势从零零年代以来“毛泽东旗帜网”（2003 年）、“乌有之乡”（2003 年）等一系列“左派”网站的建立中也可略知一二。然而，这时活动的所谓“老左派”，如魏巍（原北京军区文化部长）、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等人，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②，不过是希望通过“马列毛主义”的叫喊利用无产阶级的力量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姜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实行所谓“左转”，以便更加狡猾、更加巧妙地欺骗人民。只有一点与“老左派”不同的是，他的《太阳》是直接为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当权派服务的。

影片中，女主角疯妈以农民的形象出现，而她的丈夫“阿廖沙”（或李不空）则是解放军军官。据说，二者分别象征着中国和苏联。总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二人生下的儿子李东方都可算是“革命的后代”。然而，对于“革命后代”李东方，姜文是怎样安排他的结局的呢？——与作为南洋资本家女儿的唐妻偷情，最终被唐雨林枪杀。换言之，与“资本主义”苟合，终于灭亡，意即革命者必然腐化变质、革命必然失败、资本主义必然重新战胜社会主义。《太阳》中宣扬失败主义的情节并不只此一处。例如，在 1958 年（姜文有意选择这个大跃进开始的年份）怀孕的疯妈追查失踪丈夫的下落时，她遇上了寻找情人的唐妻。在一处分岔路口前，二人分道扬镳，前者向标有“尽头”的左面走去，而后者则走向标有“非尽头”的右面。向左的疯妈并没有找到丈夫，只是得知丈夫已经死去或将她抛弃。而向右的唐妻却遇到了早已等候她多时的唐雨林，二人结婚，婚礼变为了一场众人淫乱的狂欢。此处，姜文以性欲借代人们的全部物质欲望——向右、与资产阶级结合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便能使人们得到物质富足。这是他的所谓“非尽头”，那么“尽头”又是什么呢？1976 年（姜文同样也有意选择了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年份），疯妈“疯”了，把儿子从学校接回家，经常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并且经常掌掴儿子。然而，在不断吟诵“昔人已乘黄鹤去……”不久后，疯妈又“好”了——不让儿子上学、虐待殴打儿子，姜文用二者隐喻停课和武斗，进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作“精神失常”。而至于疯妈的“好”，则更是姜文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在毛主席逝世后，华、叶反革命



酒池肉林、荒淫无耻、象征和美化资本主义的所谓“婚礼”

①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

集团发动怀仁堂政变，王、张、江、姚四人被捕，文化大革命在事实上结束。而姜文对此却拍手称快，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叫好，认为这是“恢复理智”、是自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极左”思潮走到“尽头”。此外，姜文还安排了一整段情节（电影的第二部分——“恋”）污蔑文化大革命“迫害”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小梁被污蔑实行猥亵并遭到殴打，最终自杀。可见，姜文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太阳》的内里依然不外乎对文化大革命的无耻攻击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唱衰，只不过是在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大唱赞歌之外，再披上了一层拙劣的“左派”伪装而已。①

2012 年习近平集团的上台，标志着中国彻底完成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转变。2010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8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②。2013 年，习近平提出旨在扩大中国势力范围、逐步夺取世界霸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此，争夺原料产地、产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使新兴的中帝国主义与老牌的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急剧地激化了，二者的矛盾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 2019 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姜文的又一电影《邪不压正》，正是在如此帝国主义争霸的背景下产生的。影片乍看起来似乎是在讲“国家独立”——男主角（李天然）的师父为被日本人收买的大师兄（朱潜龙）所杀，他本人也险些被大师兄杀人灭口，幸而被一名美国医生（亨得勒）所救，后来被送到美国接受特工训练，直到 1937 年受命回国执行间谍任务，最终杀死大师兄为师父报仇。影片中，男主角先是称美国医生为爸爸，后又称与其一起救了自己的前朝武人（蓝青峰）为爸爸，直到后者在死前对他说：“我不是你爸爸了”。很明显地，姜文在这里是用父子关系比喻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大师兄认贼作父——充当日本的代理人，而男主角在一开始也做了美国的傀儡。直到这里，似乎《邪不压正》讲的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故事。然而，姜文饰演的蓝青峰马上又说了下一句台词——“你该找个自个儿的儿子了”。中国既然独立了、强大了，那么就该开始侵略其他国家了——这就是姜文希望通过《邪不压正》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逻辑！

总之，通过以上对姜文阶级地位和演艺生涯的分析，我们知道：姜文绝不是什么“左翼艺术家”、也不是什么“主观社会主义者”，而是阴险狡诈的资产阶级文化流氓和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的文艺作品，尽管可能变换不同形式，然而始终为着维护中修的反动统治服务。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仅有的一些所谓“左派”对于姜文的“批判”，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得阶级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也根本不能揭露其作品的反动实质，有的抓小放大——只说姜文电影流于“空想”和“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有的还主张“继承”姜文电影中的“积极内容”，它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小骂大帮忙”罢了。

结语

至此，《让子弹飞》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它不是一株香花，而是一棵毒草；它是反动资产阶级导演姜文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期间为使群众**“放**

① 在《太阳》中，姜文还特意使用了乱序进行叙事。影片的最后一幕，是疯妈抱着新生的李东方站在火车上大喊：“阿廖沙，别害怕，火车在上面停下了，他一笑天就亮了！”而在远处，太阳也缓缓从地平线上升起。这一场景，特别是“他一笑天就亮了”一句台词，似乎颇有“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内涵，好像是很给人以“革命乐观主义”的希望的。然而，按照时间顺序，电影情节的真正结束却是在 1976 年。此时，虽然疯妈依旧重复着这一段台词，然而其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她说的是“天一亮他就笑了”。为什么明明是资本主义复辟，而疯妈却说是“天亮”呢？很简单，只是因为她所谓的“天亮”，只是一小撮党内外资产阶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天亮”。而对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这却意味着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暗无天日的深渊！在此，片名“太阳照常升起”也终于得到了解答——不论“泥腿子”们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到头来这世间仍然是我们剥削者的天下！

② 中国政府网：《三部门发布 201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9/c70731-22857372.html。

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①]而射出的一颗子弹。它在各种精心的伪装下向广大群众灌输“人民无用、英雄万能”和革命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流毒深远、贻害至今。然而，对于《让子弹飞》一类反动作品及其解读，无论它多么具有迷惑性，我们“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真思考，就一定能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②]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革命还是反动？——什么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编辑部
Editorial Board of 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自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成了统治阶级的“掌上明珠”。中国社会宣扬“传统文化”的风气之盛自不必说——从官方的红头文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本没有哪一个角落看不见相关的宣传。习近平本人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尽吹嘘之能事，他叫嚷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把它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

根据中修叛徒集团的定义，所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其在内容上“兼容并蓄”，囊括了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儒、道、墨、法无所不包。可是，在中修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却多是君臣父子、仁义礼智，少有兼爱非攻、贵贱无种。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更加贴近儒家教条：学校鼓吹“师道尊严”，要求学生完全听命于教师，同时向他们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读书做官”论，简直像封建社会教授孔孟之道的私塾；子女在家要孝敬长辈，不可有半点违抗，就算穷困潦倒，也要尽全力赡养父母，忍受长辈的责骂虐待，中修法律中甚至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职场里实行着森严的等级制，下属不能顶撞上司，只能默默忍受其提出的各种不合理要求；社会上工人和农民被视为“困而不学”的“下贱之人”，饱受歧视和污蔑。重男轻女也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事，女性从小就被当作家庭奴隶培养，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

虽然中修用尽了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溢美之词来包装所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兼收并蓄”、又是“创新性发扬”。但是，“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①。在光鲜亮丽的皮囊之下，隐藏的仍是孔孟之道的反动糟粕。事实上，就连中修官方也毫不掩饰其对孔孟之道的偏爱，直言：“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修甚至要实现封建地主阶级尊孔读经数千年都未能完成的夙愿，堂而皇之地提出要效仿《佛藏》、《道藏》，收罗历史上散播到各地的孔孟遗毒，编纂出一部反动儒经大全——《儒藏》。中修头子习近平露出的狐狸尾巴更是绝妙的证明，他凡谈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言必称孔孟，甚至特意聚集群丑举办了所谓纪念孔丘诞辰 2565 年的“研讨会”，亲自出马祭孔祀孔，在会上将其奉若神明，狂叫什么“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修上演祭孔丑剧，习近平厚颜无耻地宣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矛盾”。

为什么法西斯中国要这样狂呼复兴实质上是孔孟之道的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由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习近平反动集团的上台，宣告中国彻底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如今的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计民生、社会财富都掌控在极小一

① 鲁迅：《范爱农》，《朝花夕拾》，《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攫寄生虫手中。与经济上的高度垄断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极端腐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中国确立起了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如今的中国社会，**“在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个极端是贫困、奴役、劳动折磨等等的积累。”**[①]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大量农民、小资产阶级破产，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全体劳动人民生活愈发窘迫，社会阶级矛盾极端尖锐。中修在政治上的日趋腐朽反动必然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极端愤怒，为了扼杀人民群众的反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除了要直接实行暴力镇压之外，还需要使出软的一手，从精神上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而孔孟之道正是当今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梦寐以求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反动政治、哲学观点的拼凑，孔孟之道早就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宗教——儒教。**“它的核心教义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也即要求社会中统治阶级拥有对被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力，家庭、家族中家长对于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丈夫对于妻子的绝对权力。”**[②]儒教这一要求在社会上实行森严的等级制的宗教，是历代反动派奴役、分化人民的得力工具。同时，儒教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大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它宣扬“中庸”、“乐天知命”等反动观点，妄图使劳动人民安于被压迫的现状。这正符合了现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它们就是想让劳动人民成为匍匐于脚下的温顺奴才，不去反抗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因此，儒教在当今的法西斯中国受到如此狂热的吹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供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他们自己就无耻地坦白了其法西斯制度正是建立在儒教反动思想对人民的统治之上的。



中修以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名大肆兴办所谓“国学”教育，向年青一代灌输反动儒教思想。

“君子中庸”

在社会主义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孔孟之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儒教被彻底批烂批臭。即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也不能、不敢再像历史上的反动派那样公开地叫嚣要“克己复礼”、尊孔读经，赤裸裸地用三纲五常束缚劳动人民。它们必须将儒教打扮得更有欺骗性，不去公开宣扬那些早已臭名昭著的反动糟粕，而是捧出其中看似无害的东西为其涂脂抹粉，熬成新的迷魂汤用以毒害劳动人民。当今儒教用以镇压人民反抗、麻痹人民意志的一个核心的哲学观点便是“中庸之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视其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理论”，对其推崇备至，甚至称其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将其说成某种先验的、人们与生俱来的观念。概而言之，“中庸之道”就是鼓吹“过犹不及”，要“执其两端，用其中”，而要把握“中”，就必须“合二为一”，即把对立的两端调和起来。这无非是说处理任何矛盾都不能通过斗争的方法，使得矛盾的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应该在二者之间“找出一个共同点的东西”，“求同存异”。

列宁指出：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即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③]。儒教的“中庸之道”将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既“同意”这一方面，又“同

① 徐禾：《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
② 烽火 Flame：《中国未来革命的道路》。
③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意”另一方面，表面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貌似很公正、全面，实际上是取消了矛盾，将事物说成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完全是剥削阶级骗人的鬼话，而它所鼓吹的折衷主义也是根本荒谬的：**“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①]在像法西斯中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也绝对谈不上什么调和。事实上，哲学不过是它所属阶级政策的特殊形态，当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极力鼓吹“中庸之道”，也正像他们腐朽没落的前辈一样，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人民的反抗，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完全否认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胡说什么“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已经被消灭”。可是现实中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却不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迫使它们必须要主张“仇必和而解”的阶级调和论，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斗争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进而通过种种调和手段，企图使矛盾双方永远共处于法西斯中国这个统一体之中，使劳动人民永远屈从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中修自己也供认道：中庸之道“有助于去除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偏激和极端”。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法西斯中国虽然无法公开宣扬三纲五常，但它却以鼓吹所谓“和”的方式，巧妙地将儒教的等级制用看似完全相反的词句掩藏起来。它首先创造出一套看似超阶级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和谐”写入“国家层面”的要求中，而“社会层面”的所谓“公正”、“法治”是用于维护“和谐”的工具，所谓“公民层面”更是每一条都在直白地要求劳动人民自觉维持“和谐社会”。但这样的“和”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和”，实际上是“中庸之道”的衍生物，它力图使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和”起来，让被压迫者永远做压迫者的奴隶。在社会上，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被要求与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和谐相处”。但是，资产阶级从来不会为了“和”而减轻对工人的剥削，无产阶级却必须顺从资产阶级的一切无礼要求、卑躬屈膝地侍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以随意克扣拖欠工人工资，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肆意玩弄、为难工人，甚至可以随意解雇工人。可工人一旦逾越了那只是一纸具文的《劳动法》的框框半步，就要被套上“漠视法律”、“恶意讨薪”的罪名。在家庭中，“家和万事兴”的说教被奉为圭臬。但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抹杀不了儒教等级制下的家庭关系实质上的不平等，表面上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实际上却是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可以不忠、妻不可以不敬。子女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作为父母的财产和“股票”，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思想；妇女必须作为丈夫的附庸，一心一意为丈夫的家庭服务，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经常遭到丈夫的辱骂和殴打。受到压迫的子女和妇女一旦反抗，就要被加上“破坏家庭和睦”的罪名。所谓“家庭和睦”，实际上不过是家长——父母、丈夫统治的代名词，他们是封建家庭中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想要破坏这种“和睦”，而他们对子女或妻子的虐待，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可见，“中庸之道”也丝毫不是“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

除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中庸之道”同样也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维持压迫制度的遮羞布。为了调和社会矛盾，它们鼓吹孔孟的“君子无所争”，进而无耻地篡改了浙江枫桥人民对反动阶级分子进行专政和改造的经验。中修头子习近平混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

淆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正确政策下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反动阶级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下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虚构出了一个自己的“枫桥经验”来，并以此为依据要求通过所谓“调节”来解决一切矛盾。**“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①]。当今中修的政策与法律处处浸透了儒教的毒汁：处理社会矛盾，有欠薪线索反映、劳动仲裁等看似公正、实则调和的政策制度。这一类政策表面上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却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收集大量的“证据”、走繁琐的程序，还要耗费使他们望而却步的漫长时间等待劳动仲裁。处理家庭矛盾，则更是荒谬和反动，有所谓“调解员”横插一脚，要求被压迫的一方隐忍退让。为了维护家长、丈夫和他们的“活财产”，中修还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为名给广大妇女加上了“离婚冷静期”的沉重枷锁。妇女们本就在家庭中饱受家暴、性侵等各种虐待，而当她们希望通过离婚逃离丈夫的压迫时，不仅要受到各种“调解”的阻碍，甚至其提交的离婚申请都可以被丈夫（所谓婚姻关系的“任何一方”！）随意撤回。在“离婚冷静期”的反动制度下，无数妇女被一生囚禁在名为“家庭”的牢笼中，许多人受到丈夫的殴打报复甚至残酷杀害——这便是“和”的结果和实质！在法西斯中国“以和为贵”的面纱下，是肆意压迫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丑恶面孔。



“父杀子，几年有期徒刑；子杀父，死刑立即执行”——在中修看似“不偏不倚”的法律制度下，存在的只有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无条件的服从。

宣扬矛盾调和论和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实际上一点也不“和”、一点也不“中”。它是涂上保护色的害人之道、杀人之道，是反动派反对革命的虚伪而毒辣的武器。我们知道，是承认矛盾的同一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还是把矛盾的同一性凝固化、绝对化，这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水岭。儒教的“中庸之道”鼓吹的是“过犹不及”，它将矛盾的同一性夸大为凝固不变、不可撼动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谬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②]“中庸之道”宣扬僵死不动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政治上就必然为反动阶级宣扬旧事物、旧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服务，作为他们复辟倒退，玩弄“宽猛相济”、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的理论依据。这也就是当代中国垄断资产阶级如此卖力地宣传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的真正原因。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要求我们彻底揭穿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面目，将以“中庸之道”为代表的儒教思想批倒批臭

造反有理——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法西斯中国所鼓吹的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儒教的反动糟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粕。反动派利用其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大肆宣扬剥削制度万古长存，用以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谁妄图用“中庸之道”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搞复辟倒退，谁就一定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反动派从孔丘开始就已经开始宣扬“中庸之道”了，但是结果怎样呢？奴隶制度毁灭了，封建制度死亡了，如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亲手埋葬如此之多的复辟倒退活动的，正是敢于斗争、勇于反抗的劳动人民，他们根本不信什么“中庸之道”，而是将“革命造反”作为自己思想的旗帜，埋葬了一代又一代剥削阶级，不断冲击着压迫制度。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①，毛主席的指示科学地阐明了人类一切文化知识的真正来源。古往今来一切反动派都否认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哲学。奴隶社会以来的反动儒生一贯污蔑广大劳动人民都是些“困而不学”的“下愚”、“群氓”，如今的资产阶级教授、学者们也继承了这一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胡诌什么劳动人民是“没文化”的“芸芸众生”。但与他们所宣称的正好相反，广大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②物质决定精神、知识源于实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主体，他们用双手改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然也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宝贵而丰富的认识。劳动人民将其提炼、升华，就形成了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创造了真正宝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小人反中庸”

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就是从他们的敌人那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历史上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一向引起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极端仇视和恐慌。在奴隶社会末期，孔丘本人就一再惊呼：“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反中庸”“而无忌惮”。这从反面表明，奴隶们早已拿起了反天命、反中庸的批判武器，并使奴隶主们胆战心惊。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卫道士们，更是全都把围剿农民的革命哲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们总结出的反革命经验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们一向大声疾呼要“破心中贼”——用“天理”去征服“人欲”、用“道心”去钳制“人心”。这正好说明，劳动人民心中自有一套与他们吃人的“天理”、“道心”针锋相对的革命道理，自有一套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哲学。与剥削阶级哲学的烦琐、僵化的体系完全相反，历史上劳动人民革命哲学所采取的形式十分灵活。写在起义旗帜上的口号、纲领，进行鼓动的歌谣、寓言，揭露反动势力的革命檄文，利用宗教外衣的神学“异端”等等，都成为了革命人民用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生动形式。**“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③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正是完全服务于本阶级的政治需要的，它最大的优点正是将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这样，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才能够不胫而走、遍地开花，发挥出使“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④的巨大动员、组织作用。

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鲜明特点就是完全突破了统治阶级“中庸之道”的束缚。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矛盾和斗争是永恒的，劳动人民在三大实践的过程中便朴素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阶级斗争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革命人民，让他们意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过犹不及”，一旦开始起义就决不能半途而废，动摇、妥协和投降只会带来阶级敌人加倍的反攻倒算。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形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④ 郑廉：《豫变纪略》。

成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自发地遵循着**“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①]的革命道理，深知矛盾的斗争一定要突破旧的框框，才能造成革命的变革，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

自西汉董仲舒以来的历代反动派总爱宣扬“天道”，胡说什么“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将三纲五常说成是“顺天”、“合理”的永恒和绝对，把贫富不均和等级压迫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古今通义”——它们像永世不变的苍天一样，也是不会改变的。改朝换代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固然存在，但不论农民群众怎样反抗，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总是不会改变。当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喉舌也继承了他们的反动衣钵，疯狂地污蔑农民起义，叫嚷什么“农民起义都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因而“只能实现改朝换代”、“不能突破封建社会”， 否定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在历史领域宣扬“中庸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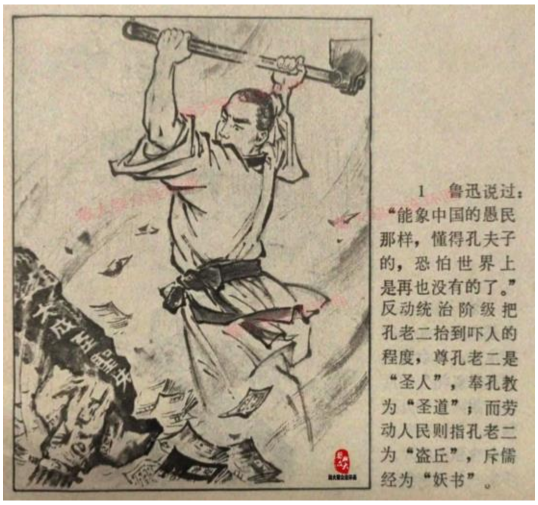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从来不局限于破坏旧世界，而是不断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

农民起义是否真的只是为了“改朝换代”？当然不是如此。早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革命人民就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出“阳”和“阴”的地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地位并非固定，指出“阳极者将反阴，阴极者将反阳”，进而发展出了“极于下者必反上”的战斗哲学，表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必将翻身做主。这与所谓“皇帝轮流做”是完全不同的，黄巾军旗帜鲜明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在政治上要求推翻“苍天”即腐朽、反动的东汉大地主阶级专政，而以“黄天”即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从东汉末的“黄天”到唐末的“冲天”，再到北宋末年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每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中，都根本不是要求“换一批压迫者”，而是要彻底突破剥削阶级物质上、思想上的桎梏，建立起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这正是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政治灵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的“太平”世界。尽管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这种空想的、非科学的、从平均主义出发的剥削压迫乃至私有制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却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超越了任何剥削阶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毛主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一句，最科学地概括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意义，也是我们理解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历史作用的一个立足点。正是在这些“反中庸”的革命哲学的指引下，中国的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天”，不断破坏和排除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因素，为生产力的发展与政治革新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粉碎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阴谋；王薄“提刀向前”杀昏君、黄巢“起兵问罪”唐天子，冲破了士族大地主的“天”，为唐朝和后周实行法家路线、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李自成大手一挥“除暴”、“均田”，以“射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天”的革命豪情冲击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清初劳动人民延绵不绝的反剥削、反压的起义斗争，促使明代“一条鞭法”未能彻底实现的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最终在清朝通过“摊丁入亩”的形式得以实现。近代以来，当反动派为保全封建制度以“中庸之道”求和卖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时，也正是洪秀全等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提出“革故鼎新”、“共享太平”，要求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天地，率领广大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英勇战斗。**“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劳动人民数千年来的革命实践以及他们的革命哲学思想，真正维护了中国的统一，推动着中国的历史向前发展，使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千百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劳动人民始终与“中庸之道”进行着不死不休的斗争。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源于三大实践、体现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劳动人民革命哲学还有很多，它们的特点正是“反中庸”——赞同斗争一定要“过”其“度”、赞同飞跃、赞同革命。也正是在它们的指导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诸多“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的动人景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②]历史上劳动人民这些革命哲学和斗争成果，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领域彻底批驳了反动阶级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矛盾的斗争一定能够突破旧事物的质的界限，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③]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不断发展的革命思想，是革命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曾经武装广大群众、唤起革命风雷，发挥过“一呼而天下鼎沸”的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以特有的战斗锋芒，对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炮制的各种反动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横扫牛鬼蛇神、砸碎精神枷锁，使广大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至今，这些宝贵的哲学遗产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劳动人民的革命思想，**“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④]伟大领袖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总结了我们民族的哲学遗产，认真研究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劳动人民革命哲学，将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劳动人民终于实现了数千年以来的夙愿，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自由与解放，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的最珍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武器，引领着他们“昂首阔步，奔向共产主义胜利前方”[⑤]。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⑥]什么是真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③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④ 毛泽东，转引自 1966 年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
⑤ 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大实践中创造出革命哲学，更是这些宝贵思想在当代的批判性总结——毛泽东思想。革命人民所创造出的宝贵思想成果，其**“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1]，这才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如今窃取了这个称号的儒教不过是终将被毫不留情的历史之风刮走的破烂货色。在法西斯中国疯狂宣扬儒教、用其中的“中庸之道”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反中庸”的革命传统，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革命实践最终推翻法西斯政权，让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放光芒。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论坛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论坛，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直接领导的，按照列宁《怎么办？》一文的精神的指示，在中国这个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中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并传达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呼声，以使无产阶级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的“讲坛”。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由正在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并力图唤醒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利用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论坛发表政治揭露文章和进行大辩论为手段进行思想斗争，通过政治揭露和宣传工作来进行组织、干部、思想准备，以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并维持的革命组织，准备通过公开的论坛活动来击败中国所有的机会主义流派，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因为中国法西斯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目前协会以秘密活动为核心，以公开活动为辅助，在展开政治宣传工作的同时通过秘密的方式吸收成员、发展组织、领导运动。

中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里不存在封建主义经济，因此没有武装割据的土壤；也没有民主制度，所以无法依靠合法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在当前中国迫切的要求，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长期的“和平”斗争，利用秘密的“讲坛”，组织经济和政治的罢工，**“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①武装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②在此之前，为了能够教育工人、准备力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向人民说话的讲坛，并且把我们自己组织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再由我们的革命党来领导革命武装，来推翻反动的中修帝国主义政权，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③《怎么办？》不仅是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的教科书，还是建立具有革命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教科书。协会建立论坛，并利用这个讲台来向群众进行揭露，唤醒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展和扩大革命组织，以完成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筹备工作，是完全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中的指示进行的。

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党。毛主席说：**“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④列宁曾经告诉过我们，要想使别人承认自己是先锋队，那只是在后卫队的前面挂上一个先锋队的招牌是不行的。作为先锋队，必须要确保其中的成员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与精练能干的组织活动能力。

---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② 同上。
③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④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 年。

过去，有很多同志读过列宁的《怎么办？》，也有很多同志按照《怎么办？》的指导，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过去《火星报》那样的全国政治报纸的报刊杂志或是论坛，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大多归于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不知道列宁创办一个秘密政治报纸，不仅是为了进行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工作，唤醒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而且是为了进行筹备建立政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列宁之所以要创办这个秘密政治报纸，是为了改变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手工业方式——顺从自发性，让知识分子和群众各干各的（密谋主义和经济主义），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组织。而要使得这个建立革命家组织的筹备工作能够开展，就必须要击败当时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就必须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就必须要强调思想斗争的作用并充分展开思想斗争。从反对机会主义，到反对自发性，到反对改良主义的政治，再到建立革命家组织，最后是得出创办全俄政治报纸的结论——这才是《怎么办？》一文的逻辑。而贯穿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坚持思想斗争。**“布尔什维主义是 1903 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①]正是《怎么办？》的出版指导了党的思想建设，使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免遭机会主义的侵蚀。

“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统一是没有意义的”[②]。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纪律，不谈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懂马列主义和思想斗争，各色各样的分子都能参加，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都能流行，这样的政党根本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我们并不急急忙忙地宣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不自命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始终认为要像列宁教导的一样，要在斗争中建立一个纯洁的党、革命的党。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每一次马克思主义大的发展，都必定伴随着大的斗争。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它领导的一切组织，和中国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组织（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最重视并且彻底坚持思想斗争。对内的思想斗争将使我们日益团结起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对外的思想斗争将使我们日益强大起来，清除机会主义的反动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④]。

这个论坛正是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斗争的场所。在这里，通过思想斗争，为建党打下思想基础；通过协会和论坛建设的活动，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团结起来，为建党打下组织基础。有了中国的真正的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离我们夺取最后的胜利就不远了。

“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⑤]！

---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③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⑤ 列宁，转引自斯大林：《论列宁》。

联系我们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官方邮箱：lsep20190528@tuta.com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论坛：www.lsepcn.com
《曙光》网刊：sg.lsepcn.com
YouTube 频道：@共产主义通讯社